并肩风雨行

友谊丛书之十三

目录

序一		2 - 3
序二		4
自序		5 - 6
第一章：	成长之路	7 - 9
第二章：	武装斗争之路	9 -14
第三章：	1970 年第四军分区的组织结构	14 - 17
第四章：	“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17 - 22
第五章：	武装斗争战歌	23 -29
第六章：	文化战线赞歌	29 - 32
第七章：	风雨沧桑，革命家属、群众奉献	32 - 37
第八章：	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37 - 66
第九章：	统一战线	67 - 72
第十章：	1971 年-1972 年革命高潮期	72 - 76
第十一章：	1973 年敌我斗争日益尖锐	77 - 78
第十二章：	斯里阿曼行动前前后后	79 -81
第十三章：	整顿步划 继续前进	82 - 83
第十四章：	低潮生活(1974 年-1976 年)	83 -89
第十五章：	烈士魂	89 - 105
第十六章：	转战大江南北	106 - 109
第十七章：	1982 年记边区行	109 - 117
第十八章：	难忘的低潮斗争点滴(1980 年-1987 年)	118 - 126
第十九章：	1985 年砂沙政局新动向	127
第廿章：	武装斗争继续走向低潮	128 - 130
第廿一章：	1985 年 Sg 亚央之行	130 - 132
第廿二章：	在逆境中寻找光明	133
第廿三章：	我的太太——民辉同志	133 - 135
第廿四章：	我在武装斗争战线上的最后时光	135 - 136
第廿五章：	非常时期 特殊生活	136 - 137
第廿六章：	向新生活挑战	137 - 144
第廿七章：	后语	145 - 148

CENTRAL SARAWAK FRIENDSHIP ASSOCIATION
中區友誼協會
PERSATUAN PERSAHABATAN
SARAWAK TENGAH

序一　　风雨同路 18 年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有更多的当年斗争的参与者拿起了笔杆子，写文章，写历史回忆录，有的还出书。赖子铨友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努力，终于写成了《并肩风雨行》。在此，热烈祝贺他成功与朋友与读者见面。

赖子铨是在北加里曼丹共产党领导与先进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位群众工作者。18 年来，他深入在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与其他群众区，勤勤恳恳的工作，跟群众打成一片。他深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和革命最深厚的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当中。他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地动员和紧密依靠群众，为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运动贡献力量。群众也把他当成“知心人”，给他尽可能的支持与帮助。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并肩风雨行”，确实是当年军民团结鱼水情的真实写照。

在革命旗帜下，我们战斗在同一条战壕里，同吃一锅饭，同睡在一张雨布下，在这样同生共死战斗所结成的友谊是最伟大、最纯洁、最值得珍惜，也是最牢不可破的。尤有进者，我们得以在战斗中幸存，更是烈士用鲜血来换取的。他们高大的形象，我们怎能忘记他们！的确，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牺牲的烈士，特别是“并肩风雨行”、舍己为人的牺牲烈士！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让他们永留在我们心里。

一个革命者应当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集体利益为重，赖子铨在部队里时就是这样一位同志。遇到问题时，他首先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在组织面前，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内心世界、缺点与错误。一个献身于革命事业的革命者，就应当主动让组织上了解自己，以便正确的使用自己。这是向革命、向人民负责应当必备的条件。坚持到后期看不到胜利的曙光，甚至爱人也已离队出走了，那时他内心世界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斗争的结果，他还是选择留下来，为了信念与理想，能坚持就尽量坚持久一点。他表示“即使不幸牺牲了，我还是个彻底的革命者。”赖子铨这种襟怀与表现确属不多见。

本书表现形式平叙无华，但作者在写真、讲真话，表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写历史，不是写小说，不能采用虚无誇张的文艺手法，也不必强调要有高的文学水平，我们只要忠于事实，按历史事实来写就好了。同时，写历史要写的具体详细些，对历史事件经过、地点、人物、因由等写得越具体详细越好，让读者读的明白清楚。

这就是作者撰写历史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作为作者必须向历史负责，向广大读者负责。

本书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载，作者把自己18年亲身的不平凡经历，层次分明地写下来，多少尘封的古昔往事被掀开，都是很有价值的内容，也是很好的历史研究资料，值得朋友与读者去阅读。

在这个基础上，希望赖子铨能再接再厉，为历史工作，为人民利益与社会公义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跟赖子铨曾有一段同甘苦、共患难的战斗日子，他邀我写序言，我觉得不好推诿，也希望从中抒发一些感想。

扬帆

01-11-2011

序二　　往事并不如烟

在火红年代，众多有血气的年青人，怀着一个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投入一个不能“预知”的未来，奋斗，再奋斗！斗争失败了，理想扑灭了；但，勇气与志气未失，抬起头来，梳理了情绪，迈向新的征途！

赖子铨老友，就是许许多多时代儿女中之一。

勇者敢于面对失败，智者敢于承认错误。发生在廿世纪中叶的砂拉越革命运动，已宣告失败，二十多年（近三十年）了，现在应该是勇者和智者们好好梳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深入探究和反思的时候了。

很高兴，今收到子铨老友传来的书稿，他多年的努力，终于有成果。《并肩风雨行》即将付梓出版，邀我为之作序，我做为他的前战友，义不容辞，欣然命笔。

《并肩风雨行》，原想要编入去年(2011 年 9 月)出版的《历史痕迹》一书内，后由于某些因素，决定另行独立成册出版。我想，今此著作出版，可弥补《历史痕迹》一书的缺项，为前拉让江下游军区第四军分区的革命运动史画下较完整的句号。

写回忆录，是追述历史记录的一种载体和方式。尽管回忆录是属于个人的经历，但在那风雨年代里，个人经历往往是整个或某个阶段里运动的一个侧面和缩影。因而，对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来说，可以从中发觉 历史的另一面。

《并肩风雨行》是作者自身经历，所接触到和在当中所听到的人和事的结合载体。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在恭贺子铨老友这份成就之际，匆匆草此感言，是为序。

于东

10-01-2012

自序

我的前半生，是在那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斗争风暴中成长的。由于我的参军和积极在家乡活动，我的家人被政府拘捕，强行从诗巫的老家迫迁至古晋西连 22 哩的大富村，在重重围住的铁刺网内过着半监禁的生活。我感到欣慰，他们并无责怪、怨恨我，基本上还是同情和理解我的选择。为了重建家园，他们努力拼搏，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也不知走了多少的坎坷路，更不知流了多少的辛酸泪，终于立足大富村。

在我 18 年的武装斗争生涯中，我有幸结识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有志之士。我们风雨同行，我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结成了牢固友情。可是其中一些志士，却已“彻底为北加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是无私的奉献者，是祖国的优秀儿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革命虽然不能成功，但做为战友、幸存者，我有义务把他们的名字、英雄事迹记录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缅怀他们。这是我动笔写“烈士魂”的真诚用意。

18 年的武装斗争，我能有幸生存下来，这是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风雨并肩而行。我怎能忘记，在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缺粮挨饿时、病痛受伤时、面对生死关头，是这些保干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一一解决了。没有他们，就不能造就和燃烧当年轰轰烈烈的战火年代。今天虽然时过境迁，许多老群众也已相继逝世，可他们的支持奉献，将是永存的。

18 年后，我重返家园，白手起家，面对生活、面对家庭经济负担，我与老群众、老友再并肩努力拼搏。我非常感谢过去的老群众、老朋友在背后默默地帮助和关怀。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林志强友、高孔海友、吴仲城友、王春举友、范培尧老先生等，他们给了我实际的帮忙和精神鼓励，使我更勇于面对人生、挑战未来。

已经是酝酿很久很久了，我总有一股冲劲在激励自己要把亲身的经历写成回忆录什么的，以使“往事不留白”。但总是“空雷无雨”，懒得动笔。在几次诗巫中区友谊协会所举办的活动中，我们前第四军分区的战友，有幸相聚，大家畅谈着往事，你一言我一句，可真也勾起了许多记忆不清和淡忘了的往事。许多感人的往事，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呈现。近几年来，在友谊协会老友的催促下，特别是黄招发友、卢友爱友等的鼓励下，终于下决心把凌乱的往事记录进行整理、修改而勉强完稿。但因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因此差错难免，还望读者、老友多多指正。

这里我要感谢卢友爱老友和黄招发老友为本书出版作序；亦感激小女晓青不厌其烦地打字、修稿；以及感谢太太俞惠莲积极从旁协助和鼓励；我更要感谢诗巫中区友谊协会的编委会成员们为本书出版做了非常认真的校对。最后，也不忘对画家钟志华老同学为本书设计封面和封底表示感激。

笔者与太太俞惠莲合照

1996 年笔者合家照

从左至右：前排坐着为父亲 赖国信，长女 思玲，母亲 游花妹，小儿子 孙彬

中间是次媛 晓青，长子 孙东，后排站着为笔者与太太俞惠莲

第一章　成长之路

第一节　　家庭背景

我于 1952 年 4 月 22 日出生于砂拉越诗巫木杰而姑坡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祖籍中国福建省南平市田溪洋村。祖父 30 余岁时，离乡背井，与南平同乡一起到南洋拼搏。本想举家全部南来，无奈因二叔有病，无法同行，祖母只好与二叔留下。

父亲 8 岁随祖父一起来到诗巫做苦工赚钱。母亲于 12 岁下嫁父亲。妈当时是童养媳，还未曾与父亲见面，只凭着当时封建婚姻制，由双方父母做主而牵的情缘。当时恰逢中日战争爆发，日军随后侵占了福建，母亲只好留在中国，直至日军投降后，才来南洋找父亲，时年 18 岁。

我是长子，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五个弟弟。1958 年，我就读于木杰而姑坡的鼎新小学。当年交通不便，我们姐弟都是光着脚板，走着泥土路去上学的。

往往每日都必须在清晨 2,3 点起身，匆匆吃些早点（经常是冷饭冲热水加糖或咸鱼之类），便头戴“捕头灯”（一种土油灯，绑在头上，方便胶农晚间看路和割树胶），腰绑胶丝篓，手提胶刀，穿插胶林中，一株又一株的割。6 点多便去收集胶汁。8 点要赶到学校上课。那时念书是全日制，中午饭我们自备饭盒（饭加煎蛋或温菜等）。傍晚 5 点才放学。星期日或放假还要到芭里捡烧火柴，甚至要把十多“依甲”胶园的杂草和小杂树拔个精光。

年少无邪的我们生活虽清苦，但我们却会苦中取乐。如凌晨割胶时，我们会放开喉咙，大声歌唱，甚至与邻朋胶友疯狂呼叫。歌声、呼叫声，一浪又一浪。下大雨时，高脚屋楼下积水半尺高，我们也会赤裸裸的与鸭群一起戏水，冻得全身发抖，嘴唇发紫，在父母的责骂声中才依依不舍，溜回屋内。

贫困的生活，辛勤的劳动，锻炼我勇于向困难作斗争，更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在年幼的心田里，埋下了对现实社会极度不满的种子。

60 年代，随着砂拉越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的高涨，父亲也随着当时的潮流而加入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和农民协会。木杰而姑坡虽较为偏僻，民众思想较为落后，但很多民众也因当时的政治热潮而改变自己。我幼小的心灵，也在那激流中动荡着。

1963 年，我 11 岁，毕业于鼎新小学。在校方及教育部安排下，我本来是进诗巫市的卫理中学（津贴中学）就读，但在父亲的鼓励下，我毅然到光民中学（华文独中）升学。

第二节　　接受华文独中教育

光民中学位于诗巫顺溪美禄。创办于 1952 年。于 1958 年与小学分开，校舍迁入新建的新教育楼。

1961 年面对改制与反改制的剧烈斗争。最后在以林正文、俞贤凤、黄声侨等人为首的反改制派，取得胜利。

1962 年，光民中学在新董事部领导下，终于成功的捍卫母语教育，开拓了她独特的，自力更生的华文独立中学之路。

1964 年，我在母亲的陪同下，走进了光民中学的校门。当时我性格内向，不喜欢讲话。下课了，除了上厕所外，便经常呆在课室内读书写字。当时我最友好的同学是江採辉、黄天南等。下课后，我们经常带便当在课室里吃，有时还会对分菜肴，以享口福。念高中时，我们几个人都有参加地下工作和组织学习，但都不同组，由于遵守组织的机密准则，我们彼此都不点破。深深埋在心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

第三节　　小组学习

记得在念小学六年级时，有位同班的江同学无意中透露，在他家经常有人定时帮忙补习，讨论时势。在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慾推动下，并在江同学应允下，放学后我单独一人骑着自行车赶往他的家。基于机密原则，我只好失望而归，江同学还送至门口并向我挥手告别。

1965 年念初中二时的一天，谢同学来找我，邀我参加他们的补习班，我欣然答应。同组的有张永福同学、包同学。地点在福民路菜园芭的一个小茅屋里。那一天，正是我革命启蒙的开始。从此每一星期或每一个月学习一次。学习时间、地点、资料皆由谢同学负责指定或事先分发纲要。学习内容主要是认识人生观、世界观、时势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教唱革命歌曲，彼此谈心得体会，也看连环图和革命小说等等。

为了更好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我们都要在夜深人静时，才静悄悄的到外面把重要秘密文件拿回来，在土油灯下阅读，做笔记等。读完后，又

悄悄的藏在秘密的地点。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革命组织像一盏指路明灯，把我引向革命的康庄大道。

黎同学也曾经对我有短暂的联系。他的风趣幽默感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由于斗争日益尖锐，形势不断在变化，负责人在更换，组员也相继更换。我的组织学习也经常在半停顿中进行。

1968 年，由王伟忠同学联络我。1969 年由吴兰凤同学领导。此时我已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了革命斗争洪流中去。我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并积极参加由组织分派的张贴标语，夜间宣传群众等工作。我们也积极参与为光民中学卖彩票筹款等活动，我和熊山根同学等一起远到民丹莪去，很快便把彩票卖完，大家深受鼓舞。

从此以后，在盟与同志的领导下，我一边学习，一边参与了校内的学运工作。

第二章　走上武装斗争之路

第一节　　本地区革命萌芽阶段

1959 年 6 月 4 日，砂人联党成立，并高举反帝反殖反大马，争取砂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得到砂州各族群众的热烈支持。我革命组织利用这大好时机，派出大批学生干部走向农村，走向伊班区，逐步扩大了影响力。

1960 年前后，木桂兰、白花河和顺溪美禄坡青年学生在市区中学念书时，逐渐接受了革命真理，更在人联党反帝反殖运动鼓舞下，有的就逐步潜回家乡组织农会，秘密开展工作，组织发动群众，举办座谈会、组织劳动队，深入群众中去，取得显著成绩。

不久由人民联合党筹组的白花河分部，顺溪美禄联络所，英基罗联络所相继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和砂拉越农民协会也在农民群众中展现了高度的影响力。

1961 年 1 月卫中的反改制斗争，也深获四分区青年学生参与，许多农民也在道义上给予坚决支持，这场斗争虽不能成功，但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中坚革命干部，也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斗争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1961 年，顺溪美禄坡民在盟组织的林正文、俞贤凤，黄声侨等和光民中学的董事张廷昌、黄生利、江纯勤等共同努力抗争下，粉碎了改制派的阴谋，取得反改制斗争的胜利；地处拉让江下游右岸罗马安的开智中学，同样的在

陈绍民、陆盛同、陈德扬、杨祖华等人带领下，并配合董事部杨新海、黄良驰、郑家生等，再加上全体坡民的有力支持，也取得了反改制斗争的胜利。从此，我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的光民中学、开智中学才能坚持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捍卫了母语教育，并走上了自力更生办学方针之路。在斗争中，盟组织十分成功的把反改制斗争与反对英殖民地，与争取我国的自治独立斗争紧密的结合起来，因此，在这期间涌现出一批反帝反殖的积极分子，为党后来开展工、农、学运工作，开展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培养与造就了一批有潜能的干部人才。

1962 年 12 月 8 日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后，第一、二省先后有大批同志越界到印尼参加军事训练。砂盟于 1963 年 2 月 12 日决定筹备开展武装斗争，并提出第三个革命总方针，“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和适当开展武装斗争。”为了筹备和开展武装斗争，我分区同志在顺溪美禄等地区进行干部大组学习。学习内容包括革命理论，军事理论，政策性文件等，持续约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分区，特别是顺溪美禄的油菜岛，福民路、王士来、下坡、百花河等有志青年，积极参与活动。许多成年人、学生、小孩等日夜分批轮流负责站岗、巡逻、收集情报、鸣笛示警等以策安全。由于各种原因，后来斗争走向低潮，但这些活动，却为酝酿武装斗争和三省开展的拥军运动，具备了有利的先决条件。

1968 年，边区武装部队和国内革命力量胜利会师，砂盟立刻向省内开展了拥军运动，以便更有力推动国内革命斗争。

1968 年 10 月间，北加人民军在印尼马罗河的边区总部面对印军陆、空的围剿。总部决定留下一批同志，坚持边区基地斗争；黄纪作带一批人员向第二省边界转移；洪楚庭带部分同志回第三省国内，开展武装斗争。

1968 年底，洪楚廷等一回国内，便相继成立了三支武工队。即拉让江中游武工队，OMT 武工队和拉让江下游武工队。

拉让江下游武工队因地形较为广阔，而且大多数是华族群众，基础好。因此又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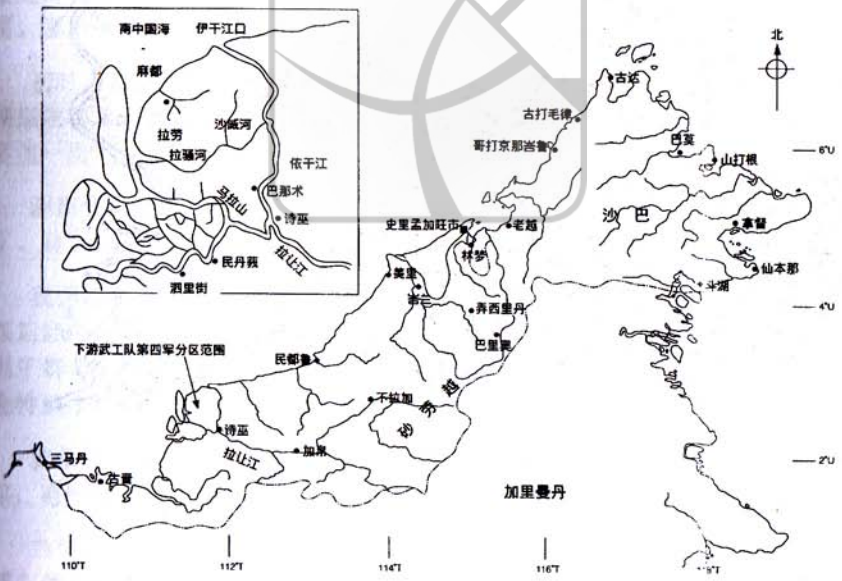
1970 年 5 月，拉让江下游领导人黄理生宣委来到顺溪美禄，主持成立党支部和军分区，相继成立了特工队、民运组。从此，第四军分区开始以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

第二节　　第四军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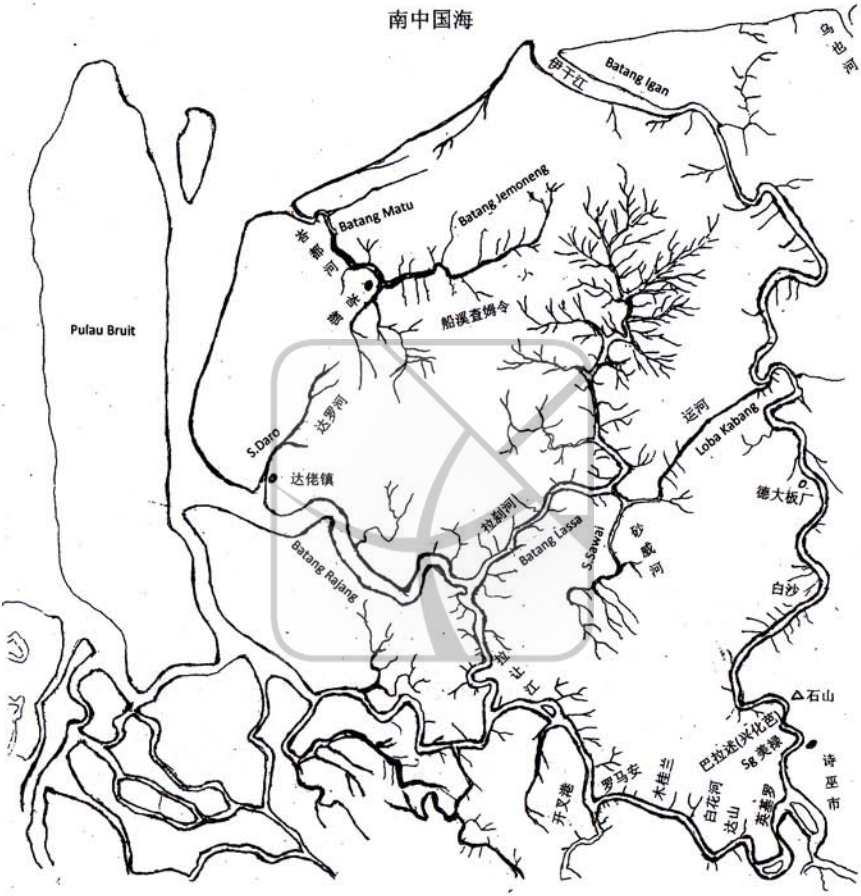
我的工作地区，所属单位便是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第四军分区。

第四军分区，四面环水，东边是伊干江，西边是拉让江，南边是伊干江与拉让江相接，北方是波澜壮阔的南中国海。全区总面积约占 900 平方公里。据统计，华族聚居的地方仅占 50 平方公里左右。它们是伊干江方向有顺溪美禄、木杰而姑、德洛邦河、巴拉术；拉让江方向有英基罗、顺溪达山、顺溪沙碟（包括新路、南平厂、兰兰屋、上坡）、王士来、百花河、下坡、木桂兰、罗马安和廿四甲。

从马拉山和巴拉术往北至南中国海都属于民族区（伊班族和马兰诺族聚居地），其中包括巴拉术、拉卓邦江、德大区、都督、拉老、马都、拉骚、沙威、马拉山等区。它占约 8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一片广阔的低地沼泽森林地带。这确实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南中国海



——第四军分区图示

北

第三节　　我们的隐藏生活

1969 年，我就读光民中学高三班。俞惠莲同学为正班长，我为副班长。当时，我们虽为班的领头人，但我们已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8 月，我们的班长俞惠莲同学突然没有来上课，有些同学议论纷纷，但我们知道她已参加“隐藏”生活了。我只好暂代班长职，每天喊“起立、行礼”。10 月，我和同班的吴珍香同学、郑世增同学也同时放弃学业，响应革命组织的号召，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那时我刚满 17 岁。

记得当时，我隐藏生活的第一个住点是在福民路后山橡胶芭里。

那是一个月高风大的深夜，我随着领路同志，手提小型的手电筒，靠着微弱的灯光，一脚高一脚低在胶林中行走。这难不倒我，因我从小就在树胶芭里长大的。约莫一个时辰，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建在烂芭的单层“小独立屋”。屋顶用塑胶雨布盖的，必要时可以拆下。旁边便是几个卧室，床头还有个供自学用或写字用的小桌子，衣服等全部“家产”就平放在床头旁边。营寨中间是一个用四根拳头般大的橡胶树柱子，上横放一片小木板，那便是饭桌也是会议室了。前方摆放着几个厨具，那便是厨房了。晚间，除了微弱土油灯光在闪动和小昆虫小声鸣叫外，周围显得冷清清。那是一个十分隐蔽的地点，那便是我和战友们的新家。

初时，我有点不习惯。白天蚊子嗡嗡叫，一放松警惕就被袭螫。晚上睡觉时，屋顶层层雾水，四周寒气逼人，再加上晚风，那就是自动免费的冷气了。若是怕冷，就多盖一层“沙龙”被。为了驱蚊，我们有时用柴烟驱蚊，免费又实际。

距离住点约四呎左右的一棵树旁，挖了一个水井，那便是冲凉和煮饭饮水的地方了。再远一点，有一棵大树，在树头下挖个深见水的洞，那便是“卫生厕所”了。

我们吃的，用的东西，大多数是来自群众。在住点，我们的饮食非常简单。煮完饭后经常是开一罐罐头或煎炸几条咸鱼就解决一餐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保干群众家用餐。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有时老乡看到我们在他家吃饭，还会特地杀鸡杀鸭给我们补身体。

若条件允许，我们经常会帮保干群众劈柴、烧火、挑水、有时也下地帮忙拔草种菜，有时我们也会变成保姆，看顾家中小孩子。我们简直成为一家人。

当初，我们并无枪支配备，只有小刀防身。我们穿着就如平常人一般。只是进芭或在住点时不能穿红、白色鲜艳的衣服。

白天我们比较少到外面跑动。我们的重点任务是搞好学校的积极分子和群众中的骨干分子。一般是把他们组成小组，在安全地点学习，共同探索真理，研讨时势。只是到了晚上，我们才会在黑夜的掩护下，到外坡去工作。

第四节　　“铁军一八”诞生

五发北加来福枪，后来叫“铁军一八”，于 1968 年诞生在我四分区的达山坡的兵工厂里。

想当初，我们参加隐藏生活，住点内没有枪，只有长刀和木棍。试想如何面对具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政府军呢！当时在面对敌军搜捕和围剿时，我们非常被动，很多同志因而牺牲、被捕。

1964 年，三省盟组织为了突破武器这一环工作。在达山坡搞民运工作的俞贤团等人，已开始研制枪支。当时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同志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单发猎枪和来福枪为思路，用铁管、水龙管仿制，虽成功研制了单发的猎枪，但性能还较差。

1968 年末，领导上调来了亚强同志（严品干）。亚强同志是机械头手，搞机器是他的内行。经过他细致、耐心、坚韧不懈的收集资料、原料，进行了测量、设计和反复推敲，并在全组同志的努力配合下，第一支土制五发北加来福枪终于在达山坡一个小小的兵工厂里，研制成功，同志们欢呼雀跃。后来，组织上为了纪念蔡铁军（邱亚陶）同志于 1969 年 1 月 8 日英勇牺牲的日子，特把此种枪命名为“铁军一八”。

随着，亚强和同志们继续努力，在几个月内，完成了盟组织交待的生产了第一批十支铁军一八，支援了兄弟单位。从此，铁军一八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在质量上不断提高，并源源生产。这在北加革命武装斗争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69 年后，我们的达山兵工厂，因某些原因而搬迁其他单位。

第三章　1970 年第四军分区的组织结构

1970 年 5 月左右，黄理生宣委来到顺溪美禄，召集黄招发（向东、于东）、詹雪娇（葵花、武英）、吴莊贤（战明）、吴兰凤（新峰）等该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他传达了盟组织决定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以及在此成立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第四军分区和筹组成立特工队的决定。

当即对军分区工作进行了调整和布署。成立了以黄理生（怀东）为书记、向东为副书记的第四军分区党委会，委员有新峰、葵花和战明。特工队由向东任队长，全分区分三个单位，分别由葵花、新峰、战明负责。属下民运小组，组长有红兵、红英和芳。

这样当时第四军分区就有六个民运工作单位、一支特工队和黄理生宣委警卫组。总人数约有四十多人。

第一节　　民运单位

一、 德洛邦河民运组。组长是芳（朱玉莺），组员有向英、成希、成平、铁英、新兵，共六位；

二、 顺溪美禄民运组。组长是新峰，组员有成安、成亮、王美莉、新毅等共五位。新峰被捕后，成安任组长；

三、 英基罗达山民运组。组长是战明，组员有新华、向红、明红、老弟、细弟和黄增安共七位；

四、 王士来、下坡民运组。组长是詹雪娇，组员有忠东、铁兵、红灵、向党等共五位；

五、 白花河民运组。组长是红英，组员有吴珍香、黄华道、永革、先锋等共五位；

六、 木桂兰、罗马安民运组。组长是红兵，组员有李玉和、胡兰、求平、钢铁、坚兵等共六位。

民运组的武器配备都是五发的自制水龙管枪。猎枪子弹陈旧，加上保管不当，许多都打不响。

民运组女同志和新兵较多。即使是组长也仅是参军不过半年多。他们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临场对敌战斗的应变知识和经验。有的甚至连枪都不懂用或不曾试过开一枪。可以说，战斗力是很弱的。

长期以来，由于搞地下工作，工作讲究机密，各民运组只能在规定的地区内工作或活动，外来的组员还须用雨布隔离不准见面。我们不会使用指南针，不懂看地图，实际上，当时也没有地图好看。同志们只会在群众家四周走动或走大路，不善于跑芭，认路能力很差，一些组员连自己的住点都找不到，更不用说深入到森林区活动。

笔者当年参与军训镜头

第二节　　东方红特工队

1970 年 6 月，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成立了东方红特工队。特工队的任务是协助和加强各民运组开展工作，同时，对敌开展武装斗争。成立之初成员包括：于东（队长兼党代表）、战斗、立新、卫群（卫生员）、大胜、红海、民军、王 X 仁和我。特工队拥有一支 Sten 枪，其他都是自制五发水龙管枪。队员除卫生员是女的，其他都是男的，而且身强力壮。因此战斗力较强，在四分区走透透。从此，我们开始了武装民运工作和武装游击活动。我们“敢”字当头与马来西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有幸也参与了由来自边区阿刚同志主持的为期约一星期的集训。包括理论学习，军事基本功训练。地点在福民路后山一个山头上。那便是我参军后第一次“正规军事训练”了。

“结业”后，我随队伍先后在顺溪美禄、王士来、白花河、木桂兰、罗马安、参与十多场群众集会。我是小兵，只负责站岗放哨，开路之类的工作。。于东队长负责集会的主讲员，主要是讲形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革命前途等问题，也参杂

文娱节目助兴。队长能言善道，加上演员的认真演出，博得听众热烈掌声和喝彩声。出席群众相当积极，鼓舞很大，影响深远。

当年在拥军运动推动下，就已有许多先进、积极的农会会员把自己深藏已久的心爱金戒子、金项链、金手镯等捐赠给组织。今天目睹自己人民子弟兵的风采，他们对革命斗争胜利的信心更大。因此特工队每到一站演讲时，都取得很好成绩。群众都热情地杀鸡杀鸭招待我们，有的甚至在队伍刚抵达，就已准备好饭菜在等着。

从此，武装斗争红旗不仅在我革命队伍内飘扬，也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荡漾。

第三节　　黄理生警卫组

1970 年，黄理生宣委带着警卫员黄育开和阿刚，住在我分区统筹安排、领导下游工作兼与外界的联络。初时在顺溪美禄与当地民运组、特工队结合一起，戒严初期便转到罗马安，与当地民运组结合一起。

由于是领导机关所在处，所以时常会有通讯联络员或其他单位同志来过路的、医病修养的、学医的等等。

警卫组拥有一支来福枪、一支史登枪，但只是在搞警卫时使用。

第四章　“围剿”与“反围剿”斗争

第一节　　“围剿”、“反围剿”斗争序幕

1970 年 8 月，我返回顺溪美禄。所在单位为顺溪美禄民运组。新锋任组长。组员有成亮、王美莉、江採辉和我。工作重点仍是群众中年青的积极分子和成年群众干部。

当时，敌我形势，已逐渐尖锐化。由于特工队以武装形式的相对公开活动，已惊动了统治当局。再加上，我们于 7 月间为反对政府当局在拉让江流域所开展的“户口调查”斗争，也已激怒了敌人。这些都促使政府当局加强和加速对本地革命力量的镇压。

1970 年 8 月 9 日，新锋组长因胃病去市区医疗，回返至光民码头被捕。在敌人威迫利诱下便放弃革命。

13 日，刘华荣、新毅、王美莉、张宫女等同志住在油菜岛菜园边我们一个临时住点。清晨，华荣把背包留在住点到市区去办事，新毅和美莉到保干家拿早餐，

点内只留下张宫女同志一人。此时，一股敌兵恰好巡逻到该处，并发现了该住点。敌兵见人就猛烈扫射，张宫女同志虽在住点内安全脱险转移，但华荣和新毅等的背包被敌兵缴获，包裹内藏有黄理生宣委的重要信件和其他机密文件。

黄理生宣委当时是住在福民路后山的一个营寨里，当知道这详细情况后，知道事态严重，必须迅速转移。新毅奉命立即化装再出外，通知这事态，完成任务后，若无法回来可找地方先隐蔽起来，然后再联络。

当时我恰好与黄理生警卫队和特工队在一起，特工队、黄理生等转移后，我随留下人员转移到鼎新路后山胶芭里。在那里，我们开展了“声讨叛徒”会议，同志们都严厉谴责叛徒的罪行，并决心把革命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1970 年 8 月 20 日、21 日，敌军大批进驻顺溪美禄后山和周边地区。21 日傍晚敌人沿途用扩音机大声宣布戒严开始，群众只能留在家里，不可外出。

对当时形势的演变，我们估计到，一场反“围剿”斗争考验就要来临。领导机关（指黄理生宣委）和东方红特工队做了适时的转移和必要的备战工作。我获组织上的委托带领本组成员与德洛邦河民运组相结合，统一指挥，彼此共度难关，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二节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70 年 8 月 22 日上午七时开始，警方正式宣布，已在诗巫县下述地区，实施 24 小时戒严。其范围包括德洛邦河、巴那述、木杰而姑、顺溪美禄、英基罗、顺溪达山、上坡、南平厂、王士来、白花河、木桂兰。

8 月 24 日凌晨，我们抵达德洛邦河民运组住点，并得知 23 日，朱玉莺组长和向英去木杰而姑坡联系群众还未回来。24 日一早，成平和铁英到保干群众家了解敌情。约 8 时左右，一股敌兵进入我住点附近芭里搜查，发现了痕迹并跟踪而来。当时我与成亮尚在共商反“围剿”斗争对策。忽然成亮呐喊一声：“狗兵来了”。我抬头向住点前面一看，果真是敌兵人头在晃动。敌兵同时也发现我们，用机枪猛烈向我们扫射。由于没有战斗经验，队伍很乱，当大家安全撤出火线后，却丢失了许多军包、装备、物质等。

当时，成平和铁英在保干群众家听到枪声后，就向树林转移，他们还隐约看到敌兵影子，但却怕开枪而伤到自己人，所以不敢开枪，就转移到福民路菜园中隐藏。

成亮颈项被流弹所伤，弹片尚留在皮层内，撤出后与成希一起转移到福民路与成平等会合。

我在撤出包围圈后，便与袁锦香、张宫女、方红一起向木杰而姑坡转移。在危急中，我与四位同志共商退路。大家考虑在华区已驳火，肯定附近会增兵，不便久留，便决心向后山森林转移。因为那里有可供一个月之久的储备粮。若实在不能坚持时，也能向白花河方向转移。

主意已定，我们小心翼翼向后山转移。一路上我们发现有敌兵进山搜索的痕迹，并听见有“伊班人”的吆喝声。我们都机警回避，不与敌兵正面交锋。当晚我们和衣就地而睡，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25 日清晨，我们继续向后山进发。不久，来到“子青芭”，凤尾草很茂密，我在前面小心开路，袁锦香在后面灭迹。行至更深入时，前面是一大片“钩藤”芭，前进速度很慢。约于 9 时左右，后卫袁锦香发现敌人沿痕迹跟来。一场驳火终于发生了。由于地形十分不利，没有一棵大树可以隐蔽，在这紧要关头，后卫袁锦香和张宫女主动留下开枪反击，结果壮烈牺牲。我和方红终于成功分散撤退。

26 日，我撤回福民路，在保干群众帮助下，与成平等联络上。并得知大股敌兵继续涌向后山搜索，我们就乘机潜伏在菜园芭草丛中。

经过商量，决定分组转移到非戒严区。26 日深夜 11 时，成亮，成希和新兵到全丰岛伊干江边找到一艘小舟，划到对面接近刘钦候医院的江面上，被一艘顺流而来的敌艦发现，成亮和新兵跳江拒捕，成希由于不识水性，束手被捕。

成亮与新兵游上岸进入马来甘榜。成亮在黑暗中被马来人捉获，新兵成功突围到中华路，安全转移。

27 日深夜 12 时，我、成平、铁英等到全丰岛江边，同样找到一小舟，向哥乐多方向划去。于凌晨 4 时左右顺利抵达目的地。由于一时找不到当地的组织关系。成平，铁英决定到诗巫市亲戚家暂避。我决定转去民丹莪县，并在当地群众积极帮助下与民丹莪学运负责人取得联系。在他的建议下，我暂时隐藏在他的山芭住家里。一个星期后，民丹莪农村也相继进兵巡逻，为考虑安全，我必须转移。在民丹莪学运同志的积极帮助下，我与第三分区高乐多的地下同志取得联系。回到高乐多后，成功联络到成平和铁英，就参与了第三军分区的群众工作。

1970 年 9 月初，在第三军分区，见到当地民运组负责人黄幼钦同志。她和黄声光同志是我就读光民中学高中时的地理老师和历史老师。为了革命需要，他们隐蔽于光民中学教育界。他们学识渊博，工作热情，谆谆善诱，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并深深地鼓舞着我们前进。后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黄幼钦老师参与了第三军分区的工作，黄声光老师参与了诗巫市郊区的工作。

我、成平、铁英都很感动。因为她过去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今天又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积极地配合他们在哥乐多，下新芭一带的农運工作。当时同组的还有坚、力改、刘华钦。

武装斗争烈火已在祖国大地燃烧。第三军分区的哥乐多，下新芭等地也同样面对“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当时我们在下新芭胶园中的一个住点也遭敌兵发现而驳火。我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和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挫败了敌人多次军事进攻，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当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第四军分区的状况，关心着战友们的安危和群众的状况。我们向领导上反映了自己内心的思想状况，愿意早日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

1970 年 11 月 4 日晨，砂州首席部长耶谷在光华中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放宽戒严令，改为夜间宵禁，这样从 8 月 22 日——11 月 3 日的长达 74 天 24 小时戒严令终于全部结束。

在整个反“围剿”斗争期间，第四军分区其他民运工作小组同样面对严重敌情和随时面对牺牲的考验。

英基罗、顺溪达山民运组，在戒严后期，不幸在王士来坡与敌人驳火，造成黄增安同志英勇牺牲。但在战明组长的带领下，和全体同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怕苦，不怕死，在面对敌情紧，粮食不足情况下，终于突破敌军层层包围，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同时，白花河民运组和王士来民运组，在面对戒严时，大家都保持高度警惕性和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在危急关头都安全转到罗马安与特工队会合。

特工队是我军分区的机动部队，战斗力较强。在戒严初期，曾多次进入险区与其他民运组联络，无奈当时敌情紧，通讯联络较难，除了很快联络上白花河民运组，其他组则杳无音讯。随着时间推移，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搜查范围不断扩大深入，对胶园和丛林横穿直插，不漏掉一片土地，摆出一副不消灭共军决不罢休的架势。特工队为避敌锋芒，就转到下木桂兰后山“老爸”住点扎营，静观其变。不久“24甲”警卫队兼民运组，下坡王士来民运组也相继来到此地结合。

罗马安和木桂兰下段，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是砂华党林鹏祥兄弟的地盘，他对敌宣布这是“白区”，“人民是不会支持共军的”。因此，戒严期间，当地并无敌兵活动，人民日夜照常出入工作。

政府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对共军布下了天罗地网，戒严时间之长，对民众镇压之残酷，军力财力耗资之钜，是举世瞩目的、历史罕见的。然而木桂兰下段和罗马安却成了“漏网之鱼”，成为共军的避风港。而当地民运组和黄理生宣委也利用了这一独特的环境，一方面关注“戒严区”状况，另一方面通过群众关系，建立了新交通线，继续主持日常工作，且恢复了与中央二局的联络。当地同志也乘机团结群众，并吸收多位新兵派往他区，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详细情况，请参考友谊丛书第四期《黑暗的 74 天》。）

12 月，我、成平、铁英三位，终于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道巴拉当至丹章公集江边，划船返回第四军分区，并在“老爸”住点与同志们汇合。

第三节　　1970 年 12 月我重返工作岗位

在经历了 74 天“围剿”与反“围剿”斗争后，我们作了研讨和总结工作。党领导对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全体同志全面积极投入了工作。

在总结此次反围剿斗争经验后认为，增强民运组的活动和战斗能力是要打破过去坡与坡，组与组的太多传统严密限制。要把整个四分区成为一个革命大家庭，伸能展，缩能收，活动自如。特工队要成为机动单位，要更好地协调配合各民运组工作。

基于此，在党的领导下，第四军分区工作做了适当的调整。调整后，我为顺溪美禄、德洛邦河、巴拉术区的组长，葵花同志为英基罗、顺溪达山区的组长，红英同志为王士来、白花河区的组长，红兵仍是木桂兰、罗马安区的组长。战明同志调往东方红特工队任队长。于东同志为第四军分区领导，统筹全局工作。

为了能较机动灵活对敌斗争和保存自己，对各组都安插有熟悉当地的同志，创设更有利的迴旋余地。

第四军分区经历 74 天戒严后，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已十分明显的产生变化，归纳起来有三种。

第一种是忠实于革命的群众。他们如顺溪美禄的“表嫂”、英基罗的“阿婶”、白花河的“二哥二嫂”、罗马安的“亚由哥”、木桂兰的“亚兰哥”等。这是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精英。他们在敌人的镇压下，却更加成熟，老练。他们相信党，相信同志，相信革命终将会胜利。当时我们就是靠这样的群众，做我们的坚强后盾，一步一步重新做起来。

第二种是害怕。他们会同情、支持革命，也佩服我军的革命意志，但对敌人阴险残酷手段感到害怕。戒严期间曾有几位青年群众被捕，在狱中饱受拳打脚踢，以致内伤，受尽凌辱。有部分群众怕我军活动暴露而受到对付，因此一方面支持我们，一方面却要向敌人坦白（要求我方离开后，他们可以去报案）交代。但更多的人是采取冷淡态度，只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闻不问，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第三种是积极反革命，到处窃取我军活动情报，甘当特务走狗，这只是少部分，但这些给我们活动带来很大威胁和不便。

当时我们的斗争策略是，积极依靠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努力争取和团结群众中的动摇派，坚决镇压群众中的反动派。对于较落后和动摇分子，我们尽量避而不接触。

1970 年 11 月初，政府在顺溪美禄，德洛邦河和木杰而姑成立了第四区维治协防理事会，随后相继在英基罗、顺溪沙迪、顺溪达山、下坡、白花河和木桂兰成立第五、六、七、八区维治协防理事会。理事会负责所属范围的各坡负责人，各坡约每十家一组，由组长负责。一家出事，全组负责，一组出事，其他组也有责任，彼此连成一片。

敌人这一策略，初时显有成效。就以第四区的福民路有 14 组，鼎新路有 10 组，光民路有 5 组，荣光路 8 组，油菜岛 7 组。组长都是坡中较有声望者，很多过去是我们的积极支持者，骨干分子。这在当时，确实给我们恢复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有的群众直接表示，“我个人一定支持你，但不知他人的心，为了个人家庭利益着想，我必须在你们离开后（约三天）去报案。”证据显示，有的确实有去报案。这无形中增加了敌人的耳目，给我们工作增添了不少困难。为了搞好工作，我们除了更深入对群众做思想教育外，只好活动更加秘密，力求谨慎灵活，对罪大恶极的坏蛋采取坚决的斗争。

顺溪美禄协理会长是家住福民路的江某。我们前后给他寄了数封最严厉的警告信。1971 年，我们在顺溪美禄和英基罗先后处决了两名特务。接着，我们也对一些反动分子和敌特嫌疑分子，直接用武装登门教育、警告。有的给予罚款或迁离的处分。随着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们于 1971 年下旬在第四军分区吸收了一批新兵，我们乘机用武装形式扩大了群众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其他民运组和特工队都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非常出色的恢复了群众工作，特别是成功吸收和发展一批青少年，吸收了一批新的北盟盟员和农会会员，为促进另一轮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五章　武装斗争赞歌

第一节　　第四军分区 1970 年到 1976 年的战斗简报

北加人民军总部于 1969 年提出要“边打边搞，杀敌夺武”政策，以推动武装斗争发展，以实现建立“鲁让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到 1971 年又提出了开展“地雷战，麻雀战和骚扰战”的战术，这对第四军分区人少战斗力弱，没有打战经验的我们，却是一大喜讯。

兹将 1970 年到 1976 年我第四军分区的战斗简报叙述于下：

1）1970 年

10 月 17 日，王士来民运组的临时住点被政府巡逻兵发现，黄增安同志先发制人，击毙一名敌军官，后在敌密集枪炮扫射下，英勇牺牲。

2）1971 年

2 月 10 日，在顺溪美禄处决一女特务江某。

5 月 1 日，在英基罗处决一特务陈某。

6 月 7 日，烧毁停泊在英基罗远东船坞待修的两艘敌巡逻舰。

3）1972 年

2 月 1 日，在诗巫巴拉术地方警告一马来特务，没收一支猎枪。

2 月 12 日，在木杰而姑处决一特务黄某。

3 月 5 日，在顺溪美禄福民路地区，一民运组在执行任务时，主动灵活开展麻雀战，打死打伤敌人各一名。

6 月 30 日，在罗马安坡缴一电报机。

9 月 17 日，在顺溪美禄坡鼎新小学后山缴一支卡宾枪，15 发子弹。打死一敌兵。

10 月 17 日，麻雀组同志同时两面进攻顺溪美禄敌军基地，大轰土炮，敌方至少死伤三个。

11 月 15 日、19 日，先后两次火烧位于鼎新小学后山正在兴建中的两座兵营。

11 月 13 日，在峇都，我军一位同志在与敌兵驳火后，撤退时与大队走散，独自一人在一火车路（木山用）旁伏击敌兵，打伤一个，跌伤 4 个。

4）1973 年

1 月 18 日，在巴拉术没收自卫团枪支猎枪 3 把。

5 月 6 日，木桂兰烧毁正在兴建的兵营。

7 月 26 日，一麻雀组在木杰而姑坡鼎新路伏击敌人，打死二巡一个。

5）1975 年

9 月 11 日，我一工作小组在木杰而姑坡后山的临时住点被敌兵民防队发现，我方立刻埋下自动地雷，当敌兵来住点进“剿”时，触雷至少死伤两个。

6）1976 年

11 月 30 日，我军下游四分区，为保存自己反对外来伊班人打猎而展开张贴标语活动。其中一组同志在白花河张贴标语，途中与化白敌人相遇，造成黄华道牺牲，一名敌兵受伤。

第二节　　略述几场战斗

北加人民军总部分别于 1970 年末和 1971 年初颁布了“边打边搞”，“杀敌杀武”政策，以及后来开展的地雷战、麻雀战、骚扰战。把武装斗争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我感到自豪和荣耀，能在党的领导下，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身穿绿军装，手持自制的北加来福枪、肩背军包、赤着双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战斗在祖国的第一线。

以下略述本人参与的几场战斗。虽然事隔数十年，有许多细节已经淡忘。但当时同志们的战斗激情和自愿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是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终身难忘。

一、1971 年 6 月 16 日英基罗炸军舰

在第一、二、三省各地兄弟单位武装斗争枪炮声“隆隆”的激励下，我们得知英基罗远东船坞有两艘敌舰在维修。

消息传来，特工队与当地民运组同志都喜出望外，大家摩拳擦掌，都要参加战斗。经过群众联络员几天的连续侦探，得知，岸架上的敌舰正在烧焊中，并无敌兵看守，而码头待修的敌艦，防备很松懈，时有时无，即使有，也只有 3，4 人看守。于是我们开始拟定战斗计划。

1971 年 6 月 16 日，我们决定分水陆两组向远东船坞靠近。当黑夜降临，水路由成平带领并配合群众，划船而下，考虑到自制大地雷太重，不便陆上搬运，就由小船代劳。陆路由特工队队长战明和我带领，当地积极分子在前面引路，约十余人，浩浩荡荡，沿江抄捷径轻装前进。

晚上 8 点许，水陆两组准时在约定地点结合。队长分配了对敌战斗的部署和每个同志的任务和位置。九点正，第一组冲进船厂内，负责同志向工人说明来意，并作了简要宣传，其他同志立即卸下厂内电话机，不准与外界联系。第二组持枪冲上岸边敌舰，发现有 4 位穿便衣者（后来证实是敌兵），立即命令他们举手下船，并由几位战士押上岸。经过搜查后并无发现枪械。当下立即将三粒大地雷置放于二艘军舰的机械房内，并按计划把“卡达水”倒进军舰的机械内，顺手把机油等倒入船仓内，然后把电线拉到安全地带。一切准备妥当，指挥员一声令下：“炸”。登时“轰隆”“轰隆”，两艘军舰的地雷同时爆炸，只见火光冲天，数里内群众住家感觉震动，据说有些住家厨房的茶杯等从桌面上被震跌到地上。这一仗虽无缴获枪支弹药，但炸毁两艘军舰，也炸响了我军的声望。

我们带着胜利与喜悦的心情安全撤离。

二、1971 年 9 月 17 日麻雀战

9 月 15 日，我们四位同志潜伏到鼎新路一个保干群众住家后面。当地一位积极分子提供了这样的情报：即在鼎新路后山黄仁贵旧屋附近经常有驻兵，附近有条河，河边常有一个或两个或小股敌兵在冲凉、戏水、洗衣服等，很是麻痹。

获悉这个消息，我们认为，是个很好的战机，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研究，献谋出策，一个杀敌夺武的伏击战的具体方案终于产生了。

9 月 16 日，我们叫这位积极分子再去侦察，确实附近尚未驻兵。于是我们于当晚午夜时分，大家轮流背着一粒大地雷（约 20 多公斤），从住点直插到大路。一路小心翼翼来到了黄仁贵旧屋的小河边。那里有一个破旧的码头（冲凉等用的），码头的木板青苔已经枯死，沿河尚有数处粪便堆。从痕迹上看，敌兵确实经常来此逗留。

按计划，我们立刻分工把大地雷埋在路旁。由于附近泥土处处都有被松动过，所以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将地雷埋置好。小路通往河边码头刚好有两棵橡胶树与小路仅有一丈距离并排而立。我和毅坚共用一棵，刚成和长风共用另一棵。四周密麻麻的胡毛草给了我们很好的隐蔽。为了更有效杀敌夺武，大家都在前方插上一根木架托着枪桿。凌晨 5 点多，一切安排妥当，大家都进入伏击点，各守职位。虽然一夜没睡，想到天亮后能出现的战斗，大家都精神振奋，严阵以待。

我们当时战斗分工是：我是组长兼指挥，刚成同志负责缴械，毅坚同志负责炸雷并接应刚成，长风同志任警卫狙击。

事有凑巧。敌民防队，约十几人，于 9 月 17 日晨 6 点多，进驻黄仁贵荒屋。锅桶和木板的敲击声，清楚地告诉我们，“敌人来了”。

果然，约 6 点半，一个敌兵往河边码头走来，紧接着两个，三个，四个……哗！河边已有十来个敌兵，上上下下，有的在刷牙，洗脸，有的在洗碗，冲凉，洗衣等。叮叮当当，确实麻痹。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心想万一曝露，我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但大家都能沉着气，在等待战机。我们瞪着双眼，眼看一个接一个的敌兵回去了，河边都静了。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我们又看到一个敌兵，吊着枪，赤着上身，提着水桶，摇摇晃晃走到河边。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机不可失，失不易来。于是，我们一等到他从河边上来，走到伏击圈时。指挥员立即下令：“打”！“砰！砰！砰！砰！”四支枪同时朝他射去。敌兵应声倒下。毅坚同志立刻压响大地雷，“轰隆隆”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刚成同志迎着烟雾立刻冲出去夺枪。无奈敌兵枪带卷曲在手肘里，刚成只好连枪带人一起拖进阵地解下枪支和敌人手上一只手表。我们带着胜利喜悦的心情，越过鼎新河，安全转移。

这一仗，我们打死一名敌人，缴获一支卡宾枪，十五发子弹，一支手表。

从战斗打响到我们缴械转移，离我方仅 30 余丈远的敌兵乱作一团，没来得及向我们放一枪。约十五分钟左右，我们才听到敌人猛烈的枪声。“十五分钟”，我们已走得很远了，谢谢敌兵“礼炮”欢送。

三、1972 年 10.17 骚扰战

麻雀战和骚扰战是当时处于敌强我弱情况下，一种特殊的战斗形式，也是给新兵实战锻炼的最好机会。我们可以用 2 个，3 个战士，在没多大的压力下，灵活机动，大胆深入敌区，随时可对强大的敌人予以攻击，在敌方尚未弄清情况下，我们已安全迅速转移。

一股敌兵长驻在顺溪美禄黄仁贵荒屋，白天四处活动，对我十分不利，我军决定予以惩罚。

1972 年 10 月 17 日晚，我和毅坚一组，成平和刚成一组，分成两边，各自在夜色的掩护下，摸到敌军营附近，架起炮筒，对准敌军经常出没的门口，等待最好的时机，彼此灵活对敌开炮。

当时，成平他们一组，炮筒刚好对准大门，不久几个敌兵站在大门口聊天。成平等捉住时机，轻轻一按机关，炮筒轰隆射向大厅，敌兵不死即伤，哇哇乱叫。其他敌兵迅速对事发地点猛烈开枪。

待敌兵枪声一停，我和毅坚的土炮筒也响了，敌兵又胡乱向我方开枪。

这一场，敌兵至少死伤三个。

第三节　　乌龙仗

我们虽在除奸反特，在打骚扰战、地雷战、麻雀战中逐步学习，但我们也打过很多的乌龙战和失败的仗。我们只有在打败仗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打小仗中逐步锻炼，提高自己。

乌龙仗一

福民路伏击战

在频繁的与敌战斗中，有几仗是很乌龙的。第一仗是在 1972 年初吧！地点是在顺溪美禄福民路后山橡胶园地带。当时得悉每天有两、三个敌兵去后山农场买母鸡或鸡蛋。特工队同志便与当地民运组结合组成了临时战斗队，人数约有 15 位左右，接受了这一任务。

我们实地侦察了地形，在敌人必经的路途中，设下埋伏。埋伏点对面是顺溪美禄河，就在河岸（路边）埋下了十多粒土雷，指令一旦战斗打响，就由对岸的女同志负责引爆、呐喊助威。

天刚蒙蒙亮，我们一切准备妥当，就分别进入埋伏圈各自的岗位，并稍微整理工事和加强隐蔽物。约于早上九点左右，负责侦察联络的积极分子发出讯号，通知我们，“敌人来了”。我们打起精神，准备打缴获仗。在隐隐约约中，我们已听到来路方向有马来语的对话声。就在这紧急时刻，后卫的一个同志，因不小心却“砰”的一声，枪支走火了。我心里一惊，糟了，敌人一定开枪还击了。可是一切静得出奇，连唧唧喳喳昆虫叫声也没有了。我挨近战明队长，问怎么办，他叫我去路旁查

看。我小心摸出大路边，一条阔阔的道路，一个人影也没有，还是静悄悄的。队长只好下令撤离。对岸的女同志也没炸响地雷（事先只讲战斗打响后才炸，可没说战斗没打响怎么办）也撤走了。

据事后了解，当时有两个敌兵，提着两只老母鸡，只差毫米就来到埋伏圈了。一听到枪声都惊跳到对面的树丛中伏在地上不敢开枪。等我们撤退后，才与路尾另一股敌兵结合。唉！真可惜！一块就要到口的大肥肉，就这样没了。

乌龙战二

乌龙地雷战

那是 1972 年尾的事了。我和刚成、毅坚、长风到福民路后山的一条支路埋雷。这是一条荒芜已久，无人敢跑的小土路。根据当时的痕迹显示，敌兵经常在此小路巡逻。我们决定在此设一“拌雷”欢迎敌人。其他三位同志分头站岗放哨。我把二粒自制大地雷埋好，拉了一条活草做引线，只要敌人的脚，一拌这根草，地雷就立刻爆炸，是为“拌雷”。这是十分把握炸到敌人的，但问题就出在一切工作就绪后，我把电线驳接错误。“轰隆隆”巨响，两粒地雷同时在我眼前爆炸。我只感觉天旋地转，半边身体被震炸麻痹，听不见声音。原来我头部（耳边）和一边手被炸伤了，流了许多血，本能的告诉自己要清醒，不要倒下去。我看到自己放在树头的枪支已经被地雷炸毁了。此时三位同志大惊失色，立刻跑过来，扶着我立刻转移。真倒霉！敌人打不着，却炸到自己！

乌龙战三

“红毛头”战斗

这件事是发生在木桂兰的一所英国人的住家，那里设有一个英国人的教会和教会的医疗所。当地居民若有疾病，都会上那儿看病取药。这所建筑物建在离江边不远的一个山头上，一面可眺望拉让江景色，三面是广阔的平原地，风景优美，也是一个很好的军事据点。由于是英国籍红毛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人们都叫“红毛头”。

当时，英国人已很少在那里了，但还有工人在看守，并还养着一些猪和鸡鸭等。敌兵也看中那里的地势，经常驻扎在该山头上。

大约是 1973 年初的事吧。我们得知“红毛头”又有驻兵。由于敌人居高临下，我们是不便近攻的，而只能是打骚扰战。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带上炮筒，然后把电线拉长，神不知鬼不觉，待机压响炮筒。

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员有我、红军、李玉和、向党、坚等。半夜了，我们一路小心来到离“红毛头”不远的后面，那是一片很阔的稻芭地，草又长，泥土又烂，但凭着几位在木桂兰长大的小伙子，我们很顺利就抵达山脚。

为了能更有效地射杀敌人，我们决定把装炮筒的位置尽量靠近山顶。于是，我们在山脚下，把炮筒、电线、电土等装好。然后一个同志在前方侦察，慢慢前进，一个手持炮筒，随时准备安装，一个负责拉放电线，一个手持电池紧跟在后，负责压雷。

初时一切顺利，可是到后来可能是因电线拉太长，又是黑夜，心情也紧张，拉着拉着，电线却打结了，一个同志赶紧帮忙解电线，也许是时间呆太长吧，也或许是声音太大或许是身上的汗味太浓了，惊动了猪栏的猪乱跑，狗也“闻讯”赶来汪汪叫。黑暗中看到一个黑影手持手电筒跑过来照。侦察的同志马上退回来说：“曝露了，快炸”。说时迟，那时快，那个负责压雷的同志，真的听“指挥”，就压响了炮筒，只听轰隆隆巨响，震耳欲聋，只见泥土铺天盖地压下来，满身污泥。一个同志感觉有股极强的冲力把他推滚下山脚，而不是一步一步撤下来。

这一战，实在危险，据后来总结才知道，喷雷还没安装好，而其他同志都还没撤退到安全地点，组长也未下令炸雷，负责压雷的同志，在紧张中听到前面有人喊“快炸”，他就炸了。幸好大家都有惊无险，敌兵也没有开枪射击，我们平安撤退。

第六章　文化战线赞歌

第一节　　1971 年 3 月——6 月的“反黄”运动

1971 年 3 月 30 日，诗巫市区学生单位开展“大力反对反动色情的殖民地文化”运动。

诗巫市区学生单位开展的反黄运动非常成功，它带动并鼓舞了各地革命者的斗志。由于第四军分区接近市区，各种讯息不断传来，群众革命情绪在高涨。我们也在农村适时开展了反黄运动。我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突击到学校宣传教育，开展健康文娱演出，大力号召群众自动自发烧毁色情书刊，不听不唱黄色歌曲，不穿喇叭裤等。我们也在重要十字路口或大路旁烧毁大批色情书刊，唱片等。

在执行的过程中，有过左的倾向，造成一部分群众的不满，如把古装爱情片，黄梅调也当成黄色唱片，一律打碎；在内部男女同志之间的正常爱情和思念都打成

黄色思想，狠批狠斗，造成不良影响，这种过左的行动，也会破坏了内部团结和群众的关系。

我们也不失时机地突击到光民中学，光华私立英校，光华中学和开智中学召集全体师生大会，发表演说，文娱演出等。

光华私立英校的演出是比较成功的，这是我们精心策划的一次演说会，集三校师生及附近群众，约有上千人。它给我们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也对当地平静的生活，增添无限光辉和惊喜的色彩，影响深远，在此略述一二。

光华私立英校地处光华中学与光华小学的中间地带，因校内有我们的骨干分子为内应，所以调动和配合较为容易。那是 1971 年 5 月天，太阳起得早，显得特别有朝气。我们这项行动是由特工队和顺溪美禄民运组，英基罗民运组共同联合组成。约有廿余人的武装队伍于早晨 8 点许，迎着阳光，浩浩荡荡抵达目的地，沿途群众用好奇、钦佩的眼光看着我们。与此同时，依计划，江边，十字路口等处都有武装人员把关守卫，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踏着脚车到处巡逻。

我们仅用半个钟头时间，就把光华津贴中学和光华小学的全体师生全部集中到光华私立英校的草场上。校方舞台刚好面向草场，只做少许调整，一场大型演唱会便开始了。武英同志和我在大会上讲了话，加上同志们精彩的歌舞和短剧，获得热烈掌声和欢呼声。约于十一点，艳阳高照，我们的集会在高呼口号声中结束，迅速安全转移。

我们在开智中学和光民中学的演说和演出也非常成功。

通过公开的，全副武装的大型演说会，的确容易掀起政治热潮。革命激素也易在群众细胞中扩散。这些群众集会，对当时武装斗争的确起着推波助浪的作用。

第二节　　光民中学，我的母校—忆当年，动荡的时光

光民中学，是我的母校，数十年风雨路中，她历经沧桑、饱尝战争洗礼，却仍巍然屹立在诗巫顺溪美禄坡。此乃全砂爱护华文教育志士之荣耀，亦是我顺溪美禄民众的光荣。

1964 年，我走进光民中学的校门。当时正逢校董部、师生、坡众如火如荼的兴建新教育楼。身为校园学生的一份子，我被这情景感动了。我们利用放学时间、周末、假期与大人们一起拿着锄头、畚箕、麻袋，推着脚车，帮忙干活。我们人小力气弱，但粒土成堆，粒石成山。我们组成几个小组，自费远至民丹莪等地卖票筹款。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汗水，为光中谱写了一曲曲团结胜利的凯歌。

1965 年，光民中学开办高中部，立即得到建兴中学、开智中学、公民中学和其他各地青年学生远道而来就读。当时学校的师资是很强的，有从南大毕业的孙春富校长、吴恒惠校长、黄金兴老师、陈爱儿老师、张乐熙老师；有厦门大学文学士黄声光老师；有护校功臣苏启耀校长；还有李孔森老师、黄幼钦老师、黄冠秀老师、辛泽泓老师、宋志义老师、林友炎老师，等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老师大多数是热血青年，不计较薪金报酬、生活艰苦、路途遥远，大家都抱着一颗愿为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教育、华教薪火继续传承、鞠躬尽瘁，奉献无私精神。因此，光中就像一盏高高挂起的灯塔，吸引四面八方的青年学生来求学。人数最高峰达 386 人。

对我来说，光民中学（简称光中）是我求知、探索真理的启蒙地，更是我往后人生的指南。

想当初，处于 60 年代、70 年代国际民族主义运动、亚非拉各族人民的掀起了反帝反殖、争取民主独立自主、自治的斗争。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光中学生）在砂革命组织推动下，掀起了反帝反殖的浪潮。校内秘密学习小组不断增多，学生青年反帝反殖激情日渐强大，培养了大批学生领袖干部和革命中坚骨干。其中相继直接参加了武装斗争的共有 43 位。他们是黄招发、林友基、俞贤团、王伟忠、吴兰凤、林秋云、黄和泰、白益忠、陈世明、赖子铨、俞惠莲、郑世增、吴珍香、张宫女、熊山根、江丽妃、潘启美、张登昌、陆盛协、王丽珍、邱顺真、江采辉、俞贤仲、柯万安、辛择儒、池长德、赖子法、黄乃存、江绍桂、刘世叶、叶春利、江先明、谢育明、许景平、罗泰星、李家铿、卢永发、黄聿开、吴万钦、张锦兴、江惠坚、叶雅莲、许保业等。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光中学生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代价。其中为理想而捐躯的共 15 位。他们是：俞贤团、林友基、张宫女、林秋云、卢永发、黄聿开、陈世明、吴珍香、陆盛协、张登昌、黄和泰、白益忠、潘启美、邱顺真、王丽珍等等。如今人已逝，我们只能深深地怀念他们。

光中的老师也面临很大的冲击，共 8 位老师受牵连。其中 3 位参军但牺牲了 2 位，而另外 5 位没有参军的老师亦受波及被捕坐牢。他们是：1968 年，黄幼钦老师毅然离校参加了拉让江下游第三分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969 年中，林友炎老师、宋志义老师和辛泽泓老师在内安法令下被捕；1970 年初，陈爱儿老师回古晋后被捕入狱；1970 年 4 月，黄声光老师参加了诗巫市郊区，不幸于同年 9 月 30 日在乌也路一次军事行动中，为理想而捐躯；1970 年 10 月，我们尊敬的吴恒惠校长在校园内被捕入狱。在这风声鹤唳中，不少老师只能纷纷离职，远走他乡。到了 1975 年 4 月

6 日，我们的朱宋盘老师（学恩）在重伤的情况下击毙代理警监牺牲于诗巫发富港，后被追认为战斗英雄。

光中董事，在人命安危威胁下，有的离职，有的不敢再问校事，有的搬离他乡。光中面临创校以来最黑暗、最艰苦的岁月。学校随时面临被关闭的厄运。此时，令我等不能不想起苏启耀老师。在这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挺身主持大局，抱病坚持开学并鼓励夫人包望珍等老师一起执教。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捍卫中华民族教育的崇高精神，深深值得后人敬仰的。

回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如今校园已是两栋二层楼钢骨水泥校舍和一座宏伟壮观的大礼堂；校园四周翠绿幽美；校内软硬体设备齐全。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们已在那狂风暴雨中走过来了，我们已在冰山雪地里站起来了。"

当然，我们知道，独中发展的路，还是非常艰难的。在我们的前面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还有很多崎岖不平的路要继续坚强地走下去。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光中一定能继承先辈开拓和走过的光辉路程，在历届光中董事部领导下，在全体华社的关怀下，是一定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教育的堡垒，一定能始终坚持传承民族文化的火炬，也一定能继续为民族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七章　风雨沧桑，革命家属、无辜群众受累

由于革命武装力量蓬勃发展，工作范围扩大，斗争更加尖锐化，我们在第四军分区的几家革命家属和骨干群众的暴露是无可避免的。

敌人为镇压革命力量，采用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加强对坡中的革命群众，革命家属进行威吓迫害，甚至无辜群众也惨遭其害。

为了表扬和追忆他们对北加革命事业作出牺牲和贡献，也表示我对他们的无限怀念和感恩。在此，我对他们的有关事跡，略述一二。

第一节　　江若勤家

江若勤先生在 60 年代动荡时期，白手起家，历经沧桑。少年时勤俭节约，敢作敢为。婚后居住在顺溪美禄福民路，自创蛋鸡行业，在他经营下，农场越做越大，生活水准大大提高，是个小康之家。

60 年代初，英政府当局积极推行“华文中学十年改制计划”。在该计划下，诗巫市多间中学都在变相中接受改制，成为英校。光民中学是座落在本地区的一所中学，为使这间中学不被改制和沦为奴化教育的牺牲品，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他敢于斗争，敢于向恶势力抗争。在 1961 年 11 月底的一次改制与反改制会议上，他与洪桂生、陈同发、江福光等青年因见当年的光中董事长为个人私利不敢反对“改制”来讨好英国人，在气愤之下，把对方狠揍了一顿，以示教训。为这事，他们四人被控上法庭。他们也请王启同律师帮忙辩护，唯法官判他们打人（因对方有人在打架中挂了彩）就不对，因此四人被罚款 600 元而获释放。他为光中，为捍卫母语教育，出钱出力；他积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进独中。因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为维护华文教育的积极捍卫者。

他是人联党的老党员。年轻时积极参加人联党的党务工作。他积极参与人联党所发起的反大马，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当 1963 年，所谓的联合国调查团来诗巫省调查民意时，遇到了三万多人的反大马示威，结果遇到警方的阻扰，演变成暴动。他也是其中的一个热血男儿。

初期人联党的斗争，遭到反动当局的残暴镇压，许多革命志士被捕入狱，更有许多热血儿女为避开反动派的逮捕而相继走入农村。“非法隐藏”战斗就这样开始。当时他们一家成了我们的保干群众。负责提供饭菜，当义务联络员和协助领养一位同志的女儿。

1970 年，他的女儿江丽妃，因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而暴露。为了更好革命，她决定参加北加人民军。父母知悉情况后，虽然感到依依不舍。但为了尊重女儿的决定，为了革命利益，他不但不反对，反而还坚决给予支持和鼓励。女儿参军那个晚上，他在自家举办了“告别晚宴”。在宴会上，他痛斥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许多政策的不公平，并对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寄以无限的期望，他鼓励自己的女儿要听党的话，要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全体参与宴会的同志，都为他感慨激昂的谈话而感动落泪。

真是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呀。1970 年 8 月 22 日连续 74 天的 24 小时戒严，打破了江若勤先生的美梦。当时他的农场已有数千只蛋鸡，本想今后生活将过得更好。哪里知道，戒严期间鸡蛋卖不出去，堆积如山，有的成了臭蛋。人家说，菜不用肥料尚可过关，家禽没有了饲料，就要连本带利一起完蛋的。因戒严是突发的，全无储备，饲料和药品严重短缺，因此死亡率很高，他蒙受惨重损失。

由于全日戒严，坡民全无准备，因此粮食等很快用完。约三十天后，政府宣布解禁数小时，让坡民到市区方便。江若勤乘机便与坡民蜂涌到市区购买必需品。可

当他要回家时，在江边码头被警察带走。由于他不肯出卖革命利益，在诗巫“京林乐”监狱约拘留八天后，被送进古晋集中营，成为政治拘留者。

1970 年 12 月我重返工作岗位，随同前往的有成平，丽妃等来到了他的家。当时江若勤已被捕，嫂嫂初见我们时感到惊讶和害怕。

初时，她对丈夫被捕，对叛徒的出卖和敌兵的镇压有些不满和消沉，但看到我们仍然继续坚持革命，勇于斗争而感到欣慰，并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还杀鸡给我们补身体，使我们非常感动。

当时，我们就是依靠这样的一批群众骨干，一步一步把整个低沉的革命气氛搞起来，因此，他们一家是功臣之一。

可是我们的活动，被坡里的敌特分子出卖。政府当局认为，只要切断了革命家庭与共军来往，就会失去靠山，就会失败。于是在诗巫和泗里街等拉让江流域地区的华族革命家属和革命群众，约有 30 家前后被迫迁移到古晋的新村。可敌人哪里知道，革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一触即发，一场革命武装斗争的高潮就要到来。

1972 年中，政府释放了江若勤先生，并限居在古晋大富村，与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勇敢的走向未来。

时过境迁，万象更新，北加武装斗争于 1990 年全面结束，大家又返回家园生活。

2007 年，我与黄招发等到诗巫，拜访了他。他坦言，对过去的斗争不言悔，反帝反殖斗争没有错，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没有错。无奈我们却以失败而告终，此乃当时主客观因素所导致，非我们主观意识能改变的。

我们祝福他和嫂嫂身体健康、长寿，生活愉快！

江若勤先生

第二节　　我全家被迫迁入古晋新村

在江先生一家被迫迁的同时，於 1971 年 9 月 16 日约于早上 8 点，敌人便包围了我的家，一个政治部女官员上家表明了身份，便通知母亲，要全家迁移到古晋新村，命令我母亲快点收拾行李起程。

由于家中东西太多，特别是货仓里尚储藏有几百公斤的稻谷，不能立刻运走。因此，敌方允许我祖父一人单独守家。母亲只好收拾一些细软，跟着敌兵一路来到鼎新码头。几个在学校念书的弟妹也被带到码头。当晚全家人在诗巫警察局过夜。

事发当天，二弟子法刚好是在诗巫市华盛板厂做工。敌人也不放过，要抓他同去古晋新村，无奈军警讲错名字，找不到人。因此二弟在工友们的掩护下，安全转移，并于当晚在叔叔家与父亲见面，并得到父亲的同意，决心参加北加人民军，为争取北加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第三天，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二弟如愿参加了顺溪美禄民运组。

二弟是个老实人，做事勤勤恳恳，为人忠诚老实。在十九年的武装斗争生涯中，他在党的领导下，转战祖国的东西南北，不怕苦、不怕脏、工作服从分配，他战斗过华区、混合区、民族区、边区，当个宣传员、战斗员、运输员、联络员，只要他能干的事，他就干 。住营休息时，他主动站岗放哨或拿水、劈柴烧火、煮饭；在行军中，主动当尖兵在前面开路侦察，有时在后面当阻击或灭迹，是个很好用的机动战士。我感到欣慰，他能坚持到 1990 年成为武装斗争最后一批走出森林的战士。

且说，父亲在家出事的那天清晨，天尚蒙蒙亮，恰因有事，踏着脚车外出了。因此避过被捕的厄运，并于当晚下榻在梅园路堂弟家。父亲处理好我二弟的事后，决心坦然面对现实。第二天便推着脚车在诗巫码头附近溜达，等待敌警的逮捕。父亲很快就被捕，并押上大轮船与家人会合。一家人见面，虽忧亦喜，相互拥抱，痛哭流泪，真情显露无遗，全船的人都为之感动。

随船同去新村的尚有福昌伯（黄福庄，理生家人）全家、爱发伯（黄爱祥，仕武家人）全家、江若勤一家等等。大家都是在那斗争年代中走过来的，明知前面的道路是困难重重。但他们互相鼓励，互相照顾，随大轮船，勇敢地踏上新的生活征途。

来到古晋西连 22 哩，住进了大富村第四路的一间单层小茅屋。这个小茅屋，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厅，没有电、没有水、连地板也没有（是泥土）。由于来时匆忙，很多东西都没有带来，真可说是家徒四壁。

父亲是个木匠，顺手拆些木板，做了几条大长凳并在大厅做个大床铺，好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就这样挤着睡在一起。

人家说患难见真情，第二天同村的乡亲（也是一起来受难的同胞），纷纷前来探望，嘘寒问暖，有的送菜、送米、送甕（盛水用）等，好不热闹，父亲做的几条大长凳，刚好派上用场。母亲高兴的忙里忙外，烧水泡茶、招待客人。

不久后，祖父也放弃诗巫的家业，来到古晋与家人共度难关。

困难吓不倒有心人，我家人后来在古晋租了 15 依甲的田地，年年种稻，种菜，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渐渐的生活有所改善，弟妹们终于含着笑脸上学堂，并学有所成。

我们的父母是伟大的，他们对我与二弟离家参与革命事业，无暇照顾家庭，并无怨言，只有担忧。后来，我的大女儿出世不幸天生残疾，还是由父母无悔的主动承担下来。我深知，我欠父母太多了，望在有生之年，尽孝侍候老人家。在此我深深祝福母亲健康长寿。

由左至右：赖子銓、俞惠莲、吴美兰、赖子法

第三节　李亦来事件

为了生活，为了要解决每天三餐吃饭问题，许多群众都会在戒严时间内，冒着生命危险，下地种菜、採菜、养家禽等。民以食为天嘛，有些军警也会体谅当地民众的苦衷，给予一些方便。

但在德洛邦河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心寒之事。那是，1971 年 10 月 11 日晚上约 9 点半，一阵仓促的枪声掠过宁静的夜空，使当地居民更显寒心打颤。李亦来一家三成员在巴拉术被保安部队人员开枪击毙。

李亦来，男性，41 岁；张淑珠，女性，41 岁；李丽珍，女性，16 岁，家住巴拉术江边（靠近德洛邦河）。据报导，他们是前往对面江之“陆上运动会”处兜卖冰条、冰淇淋和糕饼后，在回家途中被保安部队喝令停步不果，开枪击毙的。

当时在该区实施自晚上 7 时至次晨 6 点的宵禁令。李家为了生活，延迟到晚上 9 点许才抵达出事地点。当地居民和社会舆论对此事件表示悲痛外，更对军方草菅人命、乱杀无辜，表示愤慨。

第八章　群众是铜墙铁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各地区都会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革命群众和积极分子。他们成为我们的铜墙铁壁，成为我们的靠山。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又说：“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深知，群众对革命的重要性。我们把它比成鱼和水的关系。我们这只灵活蹦蹦跳跳的鱼，若没有群众这塘水，也是活不了的。因此，我们重视发动群众，号召群众，教育群众，把它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筑成了牢不可破的钢墙铁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最艰难困苦的“反围剿”斗争中立于不败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坚持斗争，坚持革命斗争长达四十年之久。

然而，在武装斗争时期，由于叛徒、特务的出卖和陷害，以及长期革命工作的暴露，我第四军分区各坡相继都有许多群众被捕，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得力的群众、骨干分子，也有很多是无辜的群众。

1970 年 8 月，在顺溪美禄等地实施 24 小时戒严前后被捕的群众有鼎新路的包氏一家（包氏和两个大儿子、两个大女儿），福民路有吴仲铭夫妇、江若勤、吴仟

毕，下坡有刘兴锐（六哥）、张孔和母、刘仁存等，油菜岛有任职于超群小学的余其西老师。当时油菜岛的储存库（大批药品、书籍等）被政府兵发现时，就当场逮捕了周围 18 位群众，包括 70 岁高龄的老人和大腹便便的孕妇。还逼迫当地年青人帮助运载至诗巫市，并乘机扣捕他们，坐牢一星期至两个月不等，并饱受拳打脚踢和各种折磨手段。这批年青人，有黄恒善、陈生贵、黄夏禹、林光炎、柯万钿、吴道国、黄增庆、黄仁谋、黄寿金、卓智康、黄寿坚、余其东等等。

1971 年在木桂兰被捕的有黄周成（亚兰哥）、黄明道、张元泰、张旺开、张岩知等，罗马安廿四甲被捕的有许兴由、帝豹父女、郑作云等。

1972 年被捕的有诗巫油菜岛的李思旺。

1973 年被捕的有英基罗的徐邦环、黄自传，油菜岛有徐兴香、陈福美、黄郑信等，百花河被捕的有吴庆昌夫妇。

1976 年被捕的有王春举、黄寿坚（第二次被捕）。

为表彰这些保干群众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特选写数位具有优秀代表性的好群众，以示怀念。

2007 年 12 月 8 日砂中区友协成立四周年庆典午宴
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部分老友合影留念
后排(由右至左)：赖子铨、黄招发、李家镗、杨祖华、吴庄贤、徐邦林、林友美、吴仲明、许孝环、赖子法、余其东、林道贵、余贤凤、吴敏贤、黄声谋、吴庆昌
前排(由右至左)：吴庆昌夫人、黄声谋夫人、赖子法夫人、俞惠莲、林碧珠、黄玉芳、许月珠、许道香、范友爱、詹雪娇、陈紫玉、黄珠英、吴月娇、吴庆英

（一）徐兴香——我们的好表嫂

一提起表嫂，凡在四分区工作过或经过她家的，无不肃然起敬。在漫长的四十多年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中，她总是不离不弃、紧跟着党走。

记得我刚参军时，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食量惊人，平时若是去其他群众家吃饭，都不敢吃饱，一回到表嫂家，就狼吞虎咽吃到爽才放下碗筷。表嫂也明白事理，知道我们年青人很会吃，每餐总是煮出一大锅饭，叫我们一定要吃饱，才有体力干革命。由于她家是联络站，经常都有公开、秘密的同志过路，也要吃饭。我们只看到表嫂家米袋里的米一天一天的少了，初时也不在意，表嫂也从不对我们提起这事。久了，表兄有些微言，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的认识也提高了，社会经验也较丰富了，知道表嫂一家也不好过，如此这般的吃法也不是办法。于是我们就会到外地多捐一些米粮、罐头等放在表嫂家，以补充家用。

不久，我们一个非法隐藏点设在油菜岛的树胶芭里。只有表嫂一人知道我们的住处。后来进进出出来了许多联络员，治病的、送信联络的、过路的，都由表嫂一人在外面打理。我们非常佩服她一个妇道人家竟敢赤手空拳，白天黑夜到我们宿营地进出联络。

表嫂家附近有一片橡胶芭，草长、树茂，非常隐蔽。我们民运小组和过路的联络员也喜欢在那里过夜休息。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很好的休息站。由于离群众住家和菜园芭近，我们不能起火煮饭，因此三餐的饭菜全由表嫂一家人承担，无怨无悔的服务。

在非法隐藏期间，我们经常只穿短裤，早晚进出那密密的胡毛草丛。我的脚开始发痒、红肿，接着成为烂疮（福州人称烂脚田），那烂疮在早晨雾水的侵蚀下，伤口深可见骨，真是痛入心扉。那时我才知道，我的皮肤抵抗力原来是那么差。而表嫂早已看在眼里，她除了嘱咐我进出一定要穿长裤外，还到诗巫市区买了很多“生地”药材，有时煮鸭蛋，有时煮鸭汤给我吃，说有很好的医疗防患作用。在她的悉心照顾下，烂疮逐渐恢复，只留下片片疮疤的痕迹。

1968 年，边区武装部队和国内革命力量胜利会师，轰轰烈烈的拥军运动展开，四分区的群众在同志们努力宣传号召下，群众激情普遍提高。风声传入敌人耳朵，加上敌特、叛徒的出卖，敌人就加紧对我分区进行扫荡。不幸于 1970 年 8 月 13 日，我们在油菜岛芭边的一个临时住点与敌人驳火。当时新毅和王美莉同志还在表嫂家拿早餐。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大家都很紧张，但表嫂还相当镇定，一边指示同志们

拿好东西向后山转移，一边总是担心点内同志的安危。后来得知全部同志安全转移时，一颗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

紧接着，74 天 24 小时戒严，油菜岛的储藏库暴露，许多年青人被捕。表嫂深知，一场严峻的斗争就要到来。听到敌人往后山围剿，听到枪声，无时无刻都在担心同志们的安危，更对逃兵叛徒的出卖感到痛恨，但她总是默默地祝福同志们的安全。

表兄当时是作码头工友，有大轮船来到，才有机会搬着粗重的货箱、麻袋等，靠劳力，流汗赚钱，因此家庭经济并不富有。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表嫂坚持每天清晨 3、4 点推着脚车，载青菜到市区土著摊，我们都叫“拉仔摊”卖菜。回家后，还要到菜园翻土、种菜、采菜，直至日落西山，伸手不见五指时，才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

由于她工作过劳没有好好注意身体的健康，后来患了胆疾。医生建议要动手术切胆囊，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病痛，才能保住性命。她一咬牙接受了医生的劝说。出院后，休息没几天，面对家中沉重的经济负担，她又辛勤劳作，日复一日。

1973 年 4 月，我单位出现了一些逃兵叛徒。表嫂深感局势非常不好，恐怕又要出大事。于是欣然接受了大儿子李勇同志去参军的要求。在现实面前，没有几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去参军。但表嫂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杰出女性。在儿子离家的那一天，没有设丰盛的欢送宴，也没有豪言壮语，但她不断鼓励儿子一定要好好的革命，要听党和同志们的话，要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绝不可以当逃兵和叛徒。在李勇参军后不久，表嫂于 1973 年 8 月间被捕。面对 Rascom 政治部官员的审问和叛徒的威胁，她没有被吓倒。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正义，为了组织机密，她决定坚持狱中斗争。

1973 年尾，恰逢黄纪作在第二省与耶谷首席部长谈判。并于 1974 年 3 月 4 日发表了《谅解备忘录》。一大批一大批同志重返社会。表嫂的孩子—李勇同志也在这行动中返回家园。可他惊讶地发现他伟大的母亲还关在监狱中，后来才知道，其母不愿签写自白书，不与政府合作，所以不能出去。李勇只好通过 Rascom 政治部主任刘锦成等的关系，并在他的担保下，表嫂坐牢一年多，才恢复自由。

表嫂说，她不明白为什么黄纪作要“和平”谈判。为什么要放弃武装斗争，返回社会。人生经验告诉她，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1974 年，文主席发表三.九声明，严批毁枪弃党，就是叛变投敌，号召全党全军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彻底应验了她的想法。当时我们只能认真深入

学习、研究、批判。党终于决心重振旗鼓，并于 1976 年 8 月 22 日号召“斯里阿曼行动”出去的同志重返归队。然 8.22 行动是失败的。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回来。但表嫂的儿子，我们的好同志——李勇同志，决心重返部队。表嫂知道后，表示欣慰，并鼓励儿子勇敢重返武装部队，踏上新的征途。

由于李勇重返革命武装部队，我们担心敌人又会进一步对表嫂逼问、陷害。为了掩敌耳目，我们鼓励表嫂直接坦白去报案。她不愿意，认为这样作，对不起革命，也容易引起他人的误解。我们告诉她，这不是出卖，更不是投敌，而是一种对敌的斗争策略。她听后才高高兴兴，欣然接受，依计而行。

转折期间，我们是以保存为主，很少出去活动，后期更把活动中心转到第三军分区和边区去。约半年才会回来探访一次。因此我们也久久才见到表嫂。见面时，表嫂非常激动，责问我们为什么这么久才来。虽然革命低潮，许多群众对革命不闻不问，甚至还讲了很多消极的言论。可表嫂还是很关心革命事情，盛赞我军能坚持斗争，这对人民更加有利。她也很关心我们的动向，总是问长问短，并主动煮饭，捐钱捐物资，另外她也非常关心儿子的思想、工作、身体等状况。离别后，她叫我们捎话给儿子，“不用担心、挂虑家里的事，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我还在，一定能扛得住，希望能安心跟着党好好干革命”。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

1980 年，表兄不幸在渡江时，落水身亡。听到噩讯时，表嫂确实打击很大。一家之主，经济支柱，突然倒下去，面对一家嗷嗷待哺的几个孩子，可怎么办呀？想到大儿子李勇还在森林里，为革命事业奋斗，安危难料，……可这些并没有压垮我们的表嫂，她办完丧事后，，又坚强地撑起一家大小的生活担子，每日还是起早摸黑的日复一日，不断劳动。

1990 年，党军决定结束这场革命武装斗争。李勇同志是武装斗争最后一批撤出森林的战士。一年后，李勇搬回农村老家与母亲弟妹们一起生活，大家互敬互爱，相互谅解，因此生活愉快。

几年后，我们数次拜访了表嫂。表嫂待人还是那么热情、诚恳，见面时，还是那么叽叽喳喳的说不完。可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增长，表嫂明显的苍老了，身体也虚弱了，听觉也不好了。我们只能深深地祝福她健康长寿。

可，2009 年中，她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后经医生诊断，得知是患了肝癌，而且已是晚期，经住院打针吃药，仍无效，终于在 2009 年 12 月 23 日与世长辞。

200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7 时 30 分在医院举行盖棺和出殡仪式。趁亲朋戚友都聚集在一起，我们一批老友为表嫂举行了简单而有意义的追悼会。以表达我们对表嫂的哀思和敬意。

丧府本着表嫂身前遗愿，分赠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 RM300.00 和友谊协会民都鲁联络处 RM300.00。此种仁风义举、良堪钦式，特此记录以示纪念。

悼文

徐兴香老夫人，原籍中国福建省屏南县人，家住诗巫顺溪美禄全丰岛。她是我们的好表嫂。她是位慈祥、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伟大的革命母亲。她出生于 1937 年 9 月 16 日，不幸得了肝癌，恸于公元 2009 年 12 月 23 日，享年 76 岁。我们对她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惋惜。

在此，我们大家对表嫂的逝世默哀一分钟，以示悼念。

我们敬爱的表嫂，在 60 年代时期，便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是历史上，砂拉越伟大的反帝反殖斗争中许多突出、杰出的女性之一。1961 年，她参加了砂拉越农民协会，成为一位积极勇敢的农会会员，为协助通讯、联络，为当年的农民运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63 年，她在丈夫帮助下，成为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她的家成为当年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据点，是我们的通讯站和休息站。

在武装斗争时期，她经常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出入掌握情报，协助通讯联络，为保护革命工作者和革命工作作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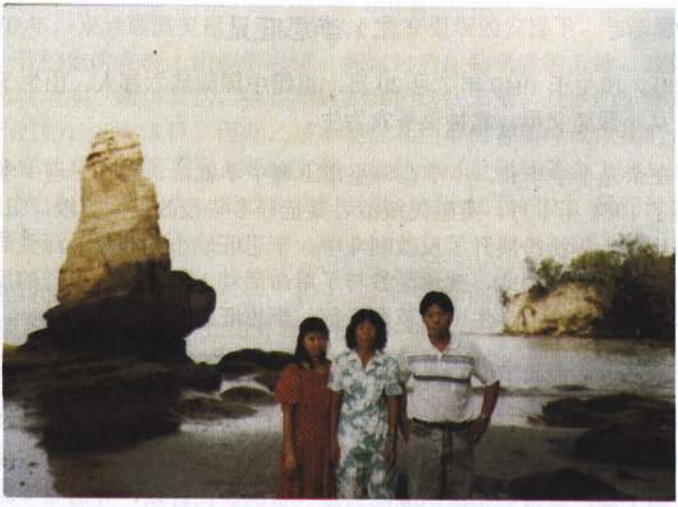
当年她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收入不稳定，尤其是在她丈夫意外去世后，整个家庭重担都落在她的肩上。从此一方面要照顾一家大小的生计，另一方面又要为革命工作操劳奔波。既要当好妈妈，又要兼顾特殊的革命工作。确实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毅力。然而，她从不言悔，总是默默地工作。

1973 年 8 月，由于长期革命工作的关系，她在内安法令下被捕。那时她最小的女儿才十来岁，仍需大人照顾。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当时的压力是多么的重呀。可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抱着坚定的理想、不屈服、不投降，为保护革命组织的秘密，坚持狱中斗争，直至斯里阿曼行动后才出狱。

在漫长的革命低潮斗争中，她仍然鼓励大儿子注意身体健康，坚持武装斗争，并尽力为革命工作排忧解难。她确实是称得上我们革命的好母亲。

我们的表嫂，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多的。在此就无须一一尽表。

如今，她已安静地离开人间，与我们永别了。在此，我们深深地悼念她。表嫂，您安息吧！我们会永远怀念您的！



右为李家铿（李勇）

中是表嫂

左是李勇太太蔡秀青

（二）李思旺兄

李思旺，出生于 1940 年 7 月 20 日，祖籍中国闽清六都人，出生于诗巫顺溪美禄油菜岛。从小跟随父母，靠种菜务农为生。

小学在荣光小学毕业，中学在诗巫市卫理中学就读。当时卫理中学也是一间华文学校。到了 1961 年 1 月，英殖民统治者要把许多华校改制为英校。卫理师生、社会贤达、进步人士等纷纷展开了反改制斗争。李思旺幼小的心灵，深受当时学生爱国爱母语热潮所影响。因此，就逐渐参与了革命活动。虽然当时卫理的反改制斗争失败了，但却造就了许多学生中坚革命干部。李思旺同志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家穷，父亲又早逝，他是长子，因此初中三毕业后，就辍学，继承父业，种菜为生，负起家庭经济的重要责任。

1962 年，他加入了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简称 O 员。由于他工作积极，有冲劲，被提拔为农运干部，负责团结组织顺溪美禄一带的农民群众，并肩负学运工作。他为人和蔼可亲，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甚有威望。

1963 年，他与范友爱女士共结连理，夫妻恩爱。从此，他一方面要挑起家庭的经济担子，另一方面又要积极为革命工作奔跑。1963 年至 1964 年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去搞革命工作。

由于李思旺为革命积极操劳工作，时常有许多革命青年在家中活动，思旺又经常不在家，不能天天帮母亲种菜，这引起他母亲十分不满。因为这些事，母亲经常与他争吵不休，还经常被母亲用藤条责打。为顾全大局，他采取不反抗的策略，有时也向母亲求饶。可革命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因此常常都在这不愉快的气氛中度过，母亲非常气愤。最后迫不得已，只好与老母亲分开，独立居住。

为了掩饰革命工作，也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他买了一架挂尾车和一艘长舟。经常在大清晨便起程去载猪和载菜，白天有空才下地种菜。

1965 年，第三省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当时顺溪美禄也不例外。许多同时期一起工作的干部同志被捕了，有的转入农村；很大一批同志经受不住考验，纷纷背叛或放弃理想，远走他乡。在这种形势下，李思旺也逐渐淡出革命活动。可在他心灵深处的革命信念并未熄灭。

1969 年，第三省武装斗争形势已逐渐形成并走向高涨。李思旺也与革命组织重新恢复关系。

我于 1970 年，来到顺溪美禄活动。不久，我在组织的安排下，与李思旺等接上关系。从此，我们定时在晚上组织学习班，探讨时势，钻研党的方针、政策。他积极、肯学、忠诚老实、敢讲真话，他也不嫉妒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年青人在领导他。他说，他已婚，儿女成群，因此，是不能像其他革命者那样或像我们一样，在没有很大的家庭和经济负担下投入革命工作。但他会尽量化解革命工作与家庭利益矛盾的斗争。他说，他要革命，步伐比我们沉重，付出比我们大。我们深感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

当时我来到油菜岛，人生地不熟，多亏了他给我提供很多资料。当我们要逐户拜访群众，他便积极带头引路作介绍并帮忙宣传。他的努力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也给坡众带来鼓舞，油菜岛的革命工作能很快动员起来，李思旺功不可没也。

每当组织上要我们去张贴标语、挂布条或去江边用浮木挂大红布条标语，他也不落人后。当第二天清晨驶船载菜到江中心时，看到自己的杰作，他一边驶船，一边静静享受同船乡民议论赞赏着共军……，心中美滋滋的乐着。

有一次，我邀他一起，装扮成渔夫，划船到停在诗巫市码头的中国船那里拿“东西”。我负责联络、撒网，其他全由他负责。他欣然同意。由于我什么都不懂，划船撑船不会，撒网捕鱼也不会。在去之前，他非常耐心地教我如何张网、撒网，我试了几次，觉得勉强可以，反正意不在捕鱼，于是分头准备。隔天，我们两人乘着深夜的降临，他轻悠悠地划着轻舟，我提着渔网，装模作样在捕鱼。真是“天从人愿”，我们一切顺利，完成任务回来。后来议论此事，还乐呼呼地说，若还有下次，可别忘了他。

李太太，名叫范友爱，1941 年生，我们都尊称为亚嫂。她是一个平凡而又有伟大母亲胸怀的女性。她虽不像其他女士般锋芒毕露或滔滔不绝谈政治，但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她在丈夫的引导下也拥护革命、支持革命，但更确切地说，从心理更是无怨无悔地支持、协助丈夫的革命工作。比如丈夫因革命工作，有时早出晚归，甚至几天没回家，她不但不埋怨，对丈夫除了担忧，便是更多的关心和怀念。为使丈夫无后顾之忧，她天天要下地把丈夫的菜园工做完，回家后还要照顾家婆和儿子。家婆常责骂儿子“不务正业”，整天在外“东奔西跑”，作为媳妇的她总是从旁劝慰，用伟大的女性柔情感化他们之间矛盾，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使是后期丈夫被捕三年来，她也是强忍泪水和内心的煎熬，把整个家撑起来。

那是 1972 年 4 月 22 日凌晨三点左右，李思旺与往常般挑菜到市区马克律街菜巴刹卖菜，一放下菜篮，便被在那里等候多时的军警逮捕了。

他被捕时，第七个男孩刚出世一个星期，太太还在做月。他深知，自己的被捕，定给妻子打击很大，特别是七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是他的心头大结。初时感到彷徨、无助、凄凉。但他深知妻子的为人，是一定能撑住这个家的。因此，他决定为了坚持信念和人格，绝不写悔改书，绝不做叛徒。警方无奈，在诗巫牢房关两个月后被转到古晋集中营。

来到古晋集中营，他又见到过去一起战斗的战友，特别是战友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深受感动。他乘机把外面的所见、所闻，统统转告给狱中同志，特别提到顺溪美禄 1971 年 9 月 17 日的伏击仗，缴获一支卡宾枪，给牢中同志鼓舞很大。这可都是第一手资料，真材实料。狱中同志都鼓励他坚持战斗。

不知不觉，他在古晋集中营坚持了一年多的斗争，却逢 1974 年传来“斯里阿曼行动”。他见大势已去，便随同狱中一批战友，放下思想，走出牢狱。

“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我们拜访了他，他对现实，对当时的政治还是很不满的，但他也对砂革命局势感到悲观。对我们留少数精干坚持武装斗争，表示尊重和敬佩。因此，在漫漫低潮岁月中，他仍在各方面给我们帮助。

回到家园，他凭着自己努力和拼搏精神，使生活、经济状况大大好转。1989 年，他偕曾带老母亲随旅行团到中国的香港、广州等地畅游。由于办理太太的国际护照出现问题，因此亚嫂没有去。无论如何。他们后期生活是美满的、幸福的。

2000 年 12 月 24 日，清晨的一宗交通意外事故中，我们的好朋友，李思旺同志，因伤治疗无效，与世长辞。噩讯传来，我们都表示万分的疼惜和哀悼。

为表彰他曾对革命斗争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特以此文表示敬意和怀念！

右为李思旺，左为范友爱
这是李思旺兄 60 岁寿辰，与太太范友爱在寿宴上的合照

这是一次范友爱嫂的生日家宴。李思旺对太太深深的一吻，
亚嫂深受感动，她一生的煎熬、操劳、烦恼、付出……都值得了。
右边坐者为李思旺母亲

（三）二哥二嫂

二哥，名叫吴庆昌，1933 年生。二嫂名叫许月娇，1932 年生。

吴庆昌夫妇，家住诗巫百花河，福州籍，务农为生，属于中等小康之家。吴庆昌有个胞妹吴庆英，是我第四军分区百花河民运组的群众宣传员，因此我们也跟着她呼叫吴庆昌夫妇为二哥二嫂。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也显得亲切。后来凡我军同志见到他们时，都亲切的叫庆昌夫妇为二哥二嫂。拉士贡政治部也知道共军在群众中有对“二哥二嫂”的地下人物。二哥二嫂因此出名，叫出“名牌”来。

基于四分区的地理位置关系，二哥二嫂一家恰在我军活动的中心地。由此出发，向东北可抵达木杰而姑、顺溪美禄、泽洛邦河；向东可达英基罗、达山、光华等地；向南可抵达王士来、下坡等地；向西可直抵木桂兰、罗马安、马拉山等地；向北可抵巴拉术和广阔的沼泽森林地。因此他家成为我军武装斗争时期的重要集合地点、联络站。在 60 年代 70 年代我军分区领导机关相当长时间就设在此地，运筹帷幄，通过公开、地下的交通网，调遣、指挥四分区的各项工作，并作出成绩。而其中之一的功劳便是二嫂一家。二嫂当时就成为义务的交通员，她与坡中几位优秀的革命群众，组成了家家相连的交通网，只要任何一家得知什么情报，就能很快传达到我军中。

二哥二嫂与我们建立这友好关系，这也因为百花河吴氏家族很多都是活跃于政坛的。诸如 60 年代被捕入狱有堂弟吴庆利。胞妹吴庆英是北加人民军成员，活跃于三四分区，与丈夫吴敏贤于斯里阿曼行动中出来。还有吴良光和吴良莺兄妹也是北加人民军成员，良光于斯里阿曼行动出来，良莺坚持一分区战斗至 1977 年尾出来；还有跟当年当地活动的杨祖华家也是邻居关系，他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坚持工作，因此就培养了二嫂一家对革命具有很深厚的革命感情。

二哥二嫂家后面是橡胶园，屋后有个水井，他们都在那里取水饮用、冲凉等，因此地面清洁光滑、阴凉又干燥，容易灭迹。在平静时期，我们常常就在那里吃饭、休息、过夜。

1970 年，政府在该区实施了全日 24 小时戒严长达 74 天。政府兵活动频繁，如果没有一定的胆略、理想，那一定是会很快搬家迁移了。当时后山很多家群众都在这紧张局势中纷纷搬离。但二哥二嫂一家却能在这动荡局势中坚持，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二哥二嫂家附近有条红水沟，来来往往驻扎过好多拨敌兵。74 天戒严期间，百花河民运组，王士来民运组，达山民运组，在危极关头，转移到二哥家时，都是通过他们的帮忙，安全与东方红特工队取得联系的。

曾有好几次，都是我们前脚跑，政府兵后脚到，抑或是政府兵前边跑了，我们紧跟就来，可算是惊险万分。二哥二嫂一家人自然是非常紧张害怕的，但为了我军的安全，他们还是坚持帮我们了解敌情，掌握情报、送信、煮饭等。当我们要离开时，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

我们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群众热情送饭、捐钱、捐物质那也算是支持革命斗争，但更难能可贵的是，敌兵来去无踪，随时面对驳火、牺牲、被捕等情况下，他们还是大胆支持，热情招待我们。有一次，敌兵就在附近，为解决我军吃饭问题，他们大胆的挑锅送饭，来到我们接头处，叫我们吃饱了把饭锅等藏在指定的草丛中，然后等兵撤离后，又自己冒险去取锅了。他们甚至可以在革命需要时，深入兵营或敌兵活动区或戒严区了解情况。提供情报，让我们安全突围转移。这些都是他们，包括百花河许多优秀保干群众，爱兵如子的伟大革命胸怀和崇高的革命情义。

由于当时革命斗争，敌我矛盾日益尖锐，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逃兵叛徒，加上长期的革命工作，二哥二嫂已有一定的曝露，敌之魔爪已逐渐转向各地有怀疑或已暴露的群众。

1973 年 8 月 18 日早上，敌一批武装军警直奔百花河后山，并包围了二哥二嫂的家。早上九时正，二嫂在住家被逮捕了。家婆年纪虽大却勇敢坚定，她嘱咐媳妇安心跟着去，带家中几个小孩，她还能胜任。因此，二嫂就较镇定地跟着敌兵走。二哥在板厂做工，惊闻妻子被捕，立刻匆忙赶回，在半路也被敌兵拦截逮捕了，那时是早上 10.30 左右。

首先，他们被关在诗巫警局，政治部官员不断在审问、恐吓他们。二嫂也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与政治部官员争辩，由于她的讲话，字字句句在理，加上当时的翻译官是二嫂的亲人，在他的周旋帮助下，6 天后就安排关在“京林乐”监狱，饮食起居、招待等还相当周到。二哥关 9 天后，便先回去。二嫂关了 33 天，于 1973 年 9 月 19 日释放回家。

二哥回家后不久，我们就去见他，初时显得较害怕，甚至不想见我们，他说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们，而是你们内部有些软骨头，会出卖自己人。因此他要选择对象，点名谁谁才愿意见。

二嫂回家后，显得较镇定，也较老练，她叙述被捕的前后经过，痛骂逃兵叛徒的无耻，也对我军内部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斯里阿曼行动后，我们少数同志坚持留下战斗，二嫂表示万分钦佩，并承诺仍积极支持我们。事实也证明，在漫长低潮的斗争中，二嫂出钱出力、坚守工作岗位，继续给予我们积极支持，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1990 年，全面结束武装斗争后，我们几次通过友谊协会的名义，拜访了百花河几家群众，他们发出豪言壮语说："只要你们还能坚持斗争，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到底。"

吴庆昌和许月娇 70 岁寿辰合影留念。
虽已是银发族，但夫妻恩爱有加。

2007年，吴庆昌带太太许月娇去中国厦门旅游时的合照

（四）吴仲民夫妇

吴仲民兄，1934 年生，吴嫂名叫郑秀英，1936 年生。

吴仲民夫妇一家是诗巫顺溪美禄福民路人。在当年的反帝反殖斗争时期，付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代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纪念他们的斗争事迹，特此略述一二。

1961 年，吴仲民兄便已接触当时的革命活动，很快便成为砂拉越农会会员，积极参加了当年青年进步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 1970 年他已是八个儿女的父亲了。为了养家糊口和我们革命同志的额外口粮，他只能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他是位机械技工，在陈兄弟板厂任机械头手。每天清晨天蒙蒙亮。便驾着电单车去上班，平时到傍晚六点才放工。若要赶工，经常要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生活虽清寒，可一家人其乐融融，美满幸福。

吴嫂是个忠诚老实、有正义感的农村妇女，她与丈夫同时期接受青年学习和农会工作。由于她积极工作、肯求上进、进步很快，是福民路农会妇女中的骨干会员。

二十世纪 60 年代尾和 70 年代，他们的家是顺溪美禄福民路隐藏干部同志的其中一个重要联络点和休息站。吴嫂认真保护同志的安全，也负责对外通讯联络、购物等。看到吴嫂竞业尽责的精神，增添了同志们对前景的美好向往。

为了减轻吴嫂一家人的工作负担，我们当时也组织了劳动队，到她家帮忙劈烧火柴或除草、种菜等。有时也帮忙照顾家中几个小孩子和做些家务事。几个小鬼虽调皮，但却很听话，我们成为一家人。

由于长期积极为革命事业奔走工作，加上特务叛徒的陷害，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1970 年 8 月 22 日，政府在顺溪美禄实施了 24 小时的全日戒严。吴仲民兄当时尚在陈兄弟板厂做工，来不及赶回家。由于家中只留下妻小，又无储备粮，这使他很为家人安危担心受怕。几天后，他大着胆子向诗巫警局恳求，说明家已断粮，必须带一点粮食回戒严区的老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诗巫警局总监批准了。

1970 年 9 月 3 日，政府宣布放宽三日（三小时）戒严令，让民众去市区补充粮食。这一次他又乘机去诗巫市区买了必要的粮食，在启程赶返鼎新码头时，却被武装的军警用手铐把他逮捕了。

初时，他被关在诗巫警局，政府官员要他坦白与共产党的关系，并告诉他有人向政府告发了大量的秘密，并恐吓他若不与政府合作，是要坐牢的。他无法，只好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但政府并不满足，又把他关到“京林乐”监狱。约 8 天后，与同坡的江若勤兄，吴仟毕先生一起关进古晋集中营的 H 座。

在狱中，他感到欣慰和感激，谢谢狱中战友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使他永生难忘。可是他考虑到上有老母，下有八个嗷嗷待哺的儿女，跟着他受尽人间苦楚，特别是儿女们的身体健康、学业和前程等，无不使他牵肠挂肚。他自认“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决心“放下”思想，签署了自白书，约关了 18 个月，他才被释放回诗巫与妻儿团聚。

且说在吴兄被捕的同时，吴嫂当时是在住家被捕，几个孩子紧紧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因此，她坚持请求警方一定要把 8 个儿女一起带走，否则她坚决不走。警方无奈，只能答应了。因此一家大小在武装军警的扣押下来到了诗巫警署。

由于她不主动、不彻底坦白录取口供，政治部官员很不高兴。不久后，她得知自己和丈夫都要被关进古晋集中营时，她表面上虽显得镇定，但她心如刀割。试问，天下有哪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儿女啊？！8 个无依无靠的儿女，从此没能在父母的爱护下，要自谋生路了，甚至流落街头巷尾、受冻挨饿。她千思万虑，为顾全大局，只好忍痛把几个较小的的儿女分散寄居在亲友家，较大的托亲人逐个安排去工作。大约在“京林乐”监狱住一星期后，她也被关进古晋集中营。

在各界舆论与亲友、社会贤达等周旋和帮助下，吴嫂约关 8 个月后，被释放回诗巫，限居在城市。一年后，仲民兄也释放出来。为了生活，他们在诗巫市区租了一间屋子，白天（即早上 8.00AM——晚上 6.00PM）可以到顺溪美禄福民路自己的住家农地劳作赚钱，晚上必须在市区住家。条件是必须与政府当局合作，见到共产党，必须如实向政治部官员报告。

1972 年尾，我们在老地方又见到了吴仲民夫妇。初时他们显得有些害怕，但见到我们还是那么立场坚定，勇敢坚持战斗，深受感动。他们控诉了在敌特和叛徒等的陷害下，造成了家庭儿女在幼小的心灵上所受的创伤和痛苦，也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示无可奈何。我们促膝长谈，大家心领神会。最后，他说基于联络不便，举凡他农园的食物，可以不必过问，随时自行拿走，我们深受感动。在分手后，他们千交代万交代，要注意安全，要早日离开此地。因三天过后，他们必须如实向“拉士贡”政治部报告。我们深深体会与理解他们的难处和苦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最后，我们告诉他们，今后我们会常常见面的。他们报以点头微笑，互相挥手告别。

从此，我们关系如常，感情依旧。想当年，我们就是依靠像这般忠诚老实的老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工作才能一点一滴做起来，新一轮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才能搞起来。

1990 年，我军与政府达致全面和平，结束了武装斗争。我回到家园后，几次到 oya 路老家又见到吴仲民夫妇，大家都很高兴。只是吴嫂已满头白发，背也有些驼了，双脚膝盖疼痛，走路困难。然而吴哥在谈政治，论时势，风采依旧，吴嫂高兴为我们泡茶解渴。大家在小屋子下，回忆往事，慷慨万千。

吴仲民和郑秀英在乌也路老家门口合影留念

（五）徐邦环婶

邦环婶，原名陈月妹，出生于中国福建省闽清县一个农村贫穷家庭里，三岁时母亲去世，九岁已是童养媳。小时上过一年的学堂。十几岁便随夫来南洋工作，育二女，不幸丈夫早逝。三十岁再嫁徐邦环，又生六个儿女，家住诗巫英基罗坡。

由于家穷，他们只能在农村租地割胶、种胡椒和青菜等，维持一家生计。生活虽苦，但一家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七十年代，在那反帝反殖风火的年代，邦环婶在我第四军分区同志的教育和引导下，积极参与反帝反殖的斗争。在公开斗争战线上，积极配合我军分配给她的任务，诸如送信、联络、侦察、了解情况、购物等等。由于她家住在我军活动的中心，四周又有茂密的橡胶林作掩护，是扎营、休息的好地方，我们一个兵工厂就设在该区。十几廿年来，亚婶的家成为我军在英基罗坡的一个重要联络站，亚婶成为我们的优秀保干群众。

2004 年 4 月 16 日，邦环婶与世长辞，享年积闰 92 岁，噩讯传来，我们深感悲恸和惋惜。王连贵、杨祖华、黄珠英等朋友都到府上吊唁、慰问家属。友谊协会和前第四军分区朋友等各献花圈和輓联以示哀悼。丧府本着亚婶身前遗愿，捐赠三百元给中区友谊协会。

对此，我们对亚婶表示深深悼念外，也对其家人慷慨捐赠和深明大义的精神，表示万二分的敬意。

为表示对邦环婶的怀念，在此，我略述一些她的生平事迹。

一，邦环婶很尊敬我们的同志。当我们到她家时，不论年龄大小，都叫我们“阿哥”“阿姐”。她的子女、媳妇也跟着如此称呼我们。她这样叫，是出于尊敬与敬仰。因为我军敢于与恶势力抗争，为维护真理、为坚持正义、为了理想、敢于牺牲个人一切。她说“你们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我年纪已大，儿女成群，不能像你们一样风里来，雨里去，但我可以做一个出色的保干群众。”她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在武装斗争高潮时期到漫长的革命低潮，她始终如一，支持革命到底。

二，邦环婶很疼爱自己子女，但也很疼爱我们的同志。每当我军从外地回到英基罗坡活动或扎营，她除了积极谨慎帮助了解敌情，保护同志的安危外，更是积极负责煮饭，让同志们吃饱。你别看她年纪一大把，拖着略胖的身材，可她尚能一边手提着饭锅，一边手拿着菜，穿插那难走的胶芭小路。到我们住地时，已是气喘吁吁，她一边抹汗，一边命令同志们“快吃，快吃”，真像个管家婆，更像是我们的好母亲。据她的儿女回忆说，“母亲煮完饭后，总是先让同志们吃，然后剩下的我们几兄弟才吃，我们有时还吃不饱，甚至还吃饭巴。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肚子饿得慌，忘了同志们还没吃，就先吃起来，被母亲发现后，还挨了一顿骂。当时虽感委屈，但我深知母亲的心，妈妈是深爱自己儿女的，但妈妈也深爱同志们。”

是的，我们有时工作至深夜，到她家后芭，绑好吊床，就如回到了家便美美的睡大觉了。邦环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第二天，看看家中没什么好菜，就早早与媳妇等下地，有时杀鸡，有时杀鸭，给我们同志加补。她说“有更好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干革命。”

煮粉干蛋，这已成为她处事待人之道。她对我们说：“吃粉干蛋，就是吃平安蛋，同志们就一路平安顺利、大吉大利。”我们听在耳里，甜在心上，我们是永远感激她的。

1972 年尾，我特工队去峇都执行任务，不幸与敌驳火，同志们几经挫折，终于回到华区，来到亚婶家附近休息。当时铁英等身负重伤，亚婶知道后，便立刻主动杀鸡又杀鸭，还早早赶到市区买了猪肝，煮熟后给铁英等吃，同志们深受感动。

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女同志，病得很重，基于安全问题，无法去市区看医生。亚婶知道后，冒着生命危险到市区找医生，并大胆告诉医生，患病者是共产党，不能来市区，请求医生给予配药，治好病疼。医生也被她的勇气、胆量、诚心所感动，乐意协助，他多次去市区拿药，这位同志的病在她的细心呵护下，逐渐痊愈。

三，1973 年中，亚婶的丈夫徐邦环被捕。这对亚婶的打击是很大的。她知道要支持革命，总有一天要准备面对被捕坐牢的。但没想到坐牢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丈夫。她深爱丈夫，也了解丈夫，知道他胆小怕事，做人老老实实，而且体弱多病，特别是有严重的胃病，深怕他吃不消。为了解救丈夫，她亲自找过政治部官员、警察等。她不会马来语，因此坚持用福州话与政治部官员理论。政治部官员一看到她就摇头，说她最难缠，最怕见到她。

不知不觉，邦环叔被关了半年，1974 年的农历新年又要到了。见到人家儿女不断回乡过团圆年，而想到自己丈夫还关在牢房里。亚婶心生一计，立即领着一家大小又来到诗巫警局，大着嗓子与政府长官对话，又哭又闹，说：“若不放我丈夫回家过年，今天我就带孩子们一起坐进牢里，不回去了……。”警察无奈，只能好言相劝。后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在社会知名人士的周旋下，于当年农历 12 月 29 日晚上，邦环叔等被释放回家。同时被释放的有黄自传、黄郑信、陈福美等。

四，敢怒敢言，坚持正义，更显现出亚婶是女中豪杰。一次在公教中学礼堂的公民集合，政治部官员、警官、叛徒等演说完后，请求人民发言。亚婶大着胆子上台声讨叛徒的无耻罪行。她说：“给他们（指叛徒）吃好吃饱，不但不报恩，反而回过来咬你，真是禽兽，连猪狗都不如，狗吃了还会摇尾巴；……”说到支持共产党，她说“大家都拿枪，山芭人哪认得谁是共军，谁是政府军。……他们都拿着枪，

我們山芭人，胆子小，他们要什么，我们只能给什么，……”她的一番言论，感触台下许多群众，夸她勇敢，敢怒敢言。

五，有几件事也能看出亚婶的人缘和为人。

1973 年，戒严期间，丈夫尚在牢狱中，家里快要断炊了。邻居知道后，非常关心他们。邻居益彬叔分给她一珍生油，立康伯买一只“曼鱼”也分一半给她。这真是雪中送炭呀，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近邻胜远亲呀！”亚婶非常感激。她除了谢谢乡亲们的好意，也经常以此作为教育子女的真材实料；一次她的孙子顽皮，跌断了一边脚，必须给予接骨医治。我们同志知道她经济有困难，便掏钱给予帮助，但她坚决不肯收。她说，“再难，我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同志们更困难，更需要钱。”亚婶经常这样教育子女说，“吃笋要记得种竹的人，喝水要记得掘井的人，人家对我们的关心、恩情，应永世不忘，将来有出头之日，应该数倍报恩于人。”儿女们都深受教育，并以此为做人的准则，立足社会，终于各有所成。

徐邦环被捕时，夫妇俩还是英基罗坡荣光小学的校丁。她深知，丈夫被捕了，自己一定要更加坚强起来，让儿女们放心，更踏实去面对一切挑战。因此，她每天如常去学校煮水泡茶，清洗卫生间等。放工回家后，还要下地劳作，天天要替儿女煮饭、洗衣服……。由于过度劳累，她体质显得有些虚弱。一天，踏着脚车，不小心翻倒，整个人跌入水沟，手腕骨折断了，真是“屋漏遍逢连夜雨”呀。亚婶包扎好手腕，一声不哼，忍着伤疼，忍着内心的痛，又照常每日上学校为课室打扫清洁……回家还是煮饭洗衣……。她总是笑哈哈面对儿子，面对邻居，无怨无悔为家庭，为子女操劳。亚婶是个伟大的母亲！

六，1986 年 10 月，我妻子因病，身体不好再加上怀孕，决定不再坚持武装斗争，要重返家园。我们把真相告诉亚婶，并安排在她家小住数日。亚婶知道后，非常通情达理，很乐意收留她。在逗留的日子里，民辉得到亚婶的精心照顾，盛情接待，使我们永世不能忘。

1990 年，全面结束武装斗争后，我们几次下乡拜访亚婶。亚婶虽显得苍老，但还是保留过去的风格，爽朗健谈好客。如果你没有吃她煮的“粉干蛋”（用粗米粉煮鸡蛋包，据称吃了会一路平安，大吉大利），她是不会放过你的。

2003 年 12 月 20 日，友谊协会迎来了“三喜临门”。即友谊协会 6 周年庆祝暨会所落成和友谊公园开幕纪念。亚婶受邀参与当天在诗巫民众会堂所设的午宴。当大会宣布向所有烈士和革命群众配挂勋章时，亚婶非常激动。事后她说：“我能有这份特殊荣誉，感到骄傲，感到光荣，我真的很感动，很激动！”

七，亚婶晚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小时虽认识字不多，但在一生的生活中，她努力学习，使她认识大有提高。到了晚年，手捧着厚厚的一本《圣经》，她更加努力、认真学习，有看不懂的，就用笔画或用同音记起来，《圣经》留下了她努力学习的见证。

晚年的她，身体状况虽大不如前，但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病痛，只是手脚没那么利落，身体也显得笨重、不灵活了。儿女媳妇等都劝她不要再下地工作了。但苦惯了的她，永远是闲不住的。她菜是不种了，但还养一些鸡鸭。逝世前一天，她还下地去喂鸡鸭呢！

因此，亚婶晚年生活是幸福的，子孙满堂，儿女孝顺，婆媳和睦，这本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可那天，她只感觉有点头晕，一躺下休息，便安静地与世长辞了。

亚婶！我们永远怀念你！

陈月妹肖像

徐邦环婶（陈月妹）在自家与儿孙的生活照

（六）赖华利叔叔

赖华利，福州籍，家居诗巫英基罗坡，出生于1927年。他是个过继儿。据他本人向我回忆，小时家很穷，无法进学校读书。少年顽皮、好玩，父母并不疼他，经常挨打受骂。因此，小时叛逆心很强，对家没有感情。他被父母打骂后，经常离家出走，有时是一星期甚至更久不回家。

十几岁，他曾参加“私会党”闯天下，过着“紧张刺激”的江湖生活。稍大，他知道这是与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是在违背良心做坏事。于是逐渐远离该组织，他远到加拿逸、牛麻、桑、加帛等地做工。可他当时只顾做工，不想积蓄存钱。赚多少钱花多少钱，今朝有钱今朝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因此当他到廿多岁时，还是吊儿郎当，穷光棍一个。

1953年，他26岁，在加拿逸做工时有缘认识了蔡娜娜，两情相悦，从此成家立业。1970年初从如楼搬到诗巫木杰而姑坡后山，租地割树胶为生。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总共有八个儿女。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他们经常搬家，还好东西不多，简简单单的，要搬就搬。当时生活虽苦，但一家人还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在一起。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孩子也都逐渐长大，并有了家室和事业，特别是大儿子，事业有成。后来在诗巫的英基罗坡买了一块地，终于苦尽甘来盖起了属于自己的屋子、自己的家。

我于1970年尾，执行任务经过鼎新路后山，无意中认识他。当时他住在一间很破旧的屋子。由于家穷，家里摆设简单，有如伊班人稻芭中的“郎高”（伊班人叫稻芭中的小茅屋为郎高）。我环视四周，方圆数十里地，都是空屋子，只有他一家敢在那里住。无奈，为了生活，他只能如此。当时我表明身份，他们虽然感到吃惊，但还是热情招待我们。得知我们未用饭，立即叫太太煮饭，虽只是几只咸鱼配白饭，这已是他的家底了，已用真心表达对我们的拥护了。由于敌情不明，需要他帮忙到一些地方侦察，他二话不说，立刻放下手上工作，起程而去，并很快完成任务。

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已搬到英基罗后山的“十四甲”。当时，他已儿女成群。我们告诉他，要在这里逗留几天，他也满口答应。时间一久，他家的几个小顽皮鬼也与我们混熟了，天天到我们住点来玩，有时甚至赤裸裸，没穿衣裤，像猴子般，围着我们转，跳来跳去，我们几乎成为一家人。

由于长期的接触，我们也逐渐地了解他。他没文化，行事虽有些蛮，不顾后果，但他讲义气，乐于助人，他“敢”字当头，只要他决定帮，他一定帮，而且是帮到底。

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虽然我们武器差、人员少、经验差，但他相信我们、愿意帮助我们。

有一次，他正在割树胶，得知我们需要他帮忙了解敌情。由于当时敌兵活动神秘，敌情变化快，又怕我们出意外，立刻叫我们躲一下，他立刻放下手中胶刀，踏着脚车，立即去侦察。办完事，看着我们跑时，已近响午。胶是不能再割了，只能拿着胶桶去收胶汁。

1972 年和 1973 年是地方最动荡的时期。敌兵活动猖狂，我们也活动频繁。有时我们来，敌人刚跑，有时是敌兵前脚跑，我们后脚到。他不是不怕，而是他少年时已过惯了这种“紧张刺激”的生活。因此，他遇事较镇定，不慌张。

他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有些相似，在这兵荒马乱时期都不知道“怕”。如果兵营建在他家附近，他们还经常跑到兵营去玩，有时甚至还有大收获，诸如政府兵会送给他几罐军用罐头，在要搬家时，还叫他尽情拿，否则也是埋到泥土里。据说当年，政府兵在搬家时因嫌重，把罐头等都丢弃。加上，他们长期在伊班长屋居住、生活，一家大小都以伊班语对话。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伊班人呢！由于这种特殊身份，他们较容易与政府兵沟通、接触、往来。久了，他们也熟悉政府兵的动向。因此他的情报，往往是较准确的。

1973 年，我们一个民运组和兵工厂就设在他家后门。当地同志并没告诉他住地具体位置，但痕迹和声响已告诉他，我们住在那里。他也知道，我们不告诉他的原因，他也佯装不知道，每天照常割胶、收胶。有时还主动帮忙灭迹和了解敌情、帮忙购买物品。

1974 年，“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我们在“保存精干，继续坚持斗争”的政策下，不公开活动。他家就成为我军后期活动的重点之一，成为一个重要的休息站和联络站。在这漫长的十几年革命斗争低潮里，他在敌情紧张、最困难的时刻，常常帮忙煮饭，侦察了解敌情，给我们无怨无悔的帮忙。他确实是我们的好“叔叔”，我们永远会记住的。

1990 年，我们全面结束了武装斗争。我和余清禄等一批老友专程拜访他，并邀请他们夫妇参加友谊协会，他满口答应，并畅谈过去的故事。据他说，当年他在牛麻等地做工时，曾与我们同志有联络，还当过送信的交通员。后来由于形势有变

加上工作关系，他离开了中游，从此就再没有联络了。对这件事，他本来是当作秘密，深深埋在心中，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后来还是说了。

赖华利叔叔，不幸于 2007 年 2 月 21 日患病，治疗无效而逝世，享年 80 岁。噩讯传来，我们深表哀痛，友谊协会的赖子法、江绍其等曾到府上吊唁，赠帛仪。我与黄招发赠送花圈等。丧府本着先人的遗愿，捐赠五百元于中区友谊协会。这种居丧不忘旧谊，良堪钦式，我们除了深深对华利叔叔悼念外，也对其家人深明大义的精神，表示万二分的谢意。

赖华利与太太蔡娜娜切 60 大寿生日蛋糕

赖华利 60 岁寿辰与全家人合照

（七） 亚兰哥

亚兰哥，原名黄周成，福州籍，1930 年 10 月 18 日出生（在中国），长大后迁居诗巫木桂兰坡。他热爱人民，有正义感，追求民主信念。在那反帝反殖反大马的烽火斗争年代里，积极参加初期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和农会的工作，后来成为坡中的骨干分子。

1970 年初，年满 16 岁的长子黄华道参军。为父的初时顾虑儿子年纪小，不懂事，会给党和革命事业增添烦恼，故持反对态度。久了，他的孩子，在斗争中成长，后浪推前浪，并成为四分区民运组工作的重要干部，他深感欣慰。因此，他的家成为我军在木桂兰坡的一个重要联络站和休息站。他和几位邻居都是我们的骨干群众，他们经常帮我们煮饭，搞情报，联络坡众，甚至帮忙做军包，车军装等。

时间久了，他们的行动引起敌特的注意。1971 年 12 月 31 日，政府武装军警包围了他们的住家，并逮捕了亚兰哥、黄明道（亚兰哥第二儿子）、张元泰、张旺开、张岩知等人。不久，其他人关两个月左右，便相继释放。亚兰哥和黄明道终因不愿出卖革命组织，不与政府合作，成为重犯，被关到古晋集中营。

亚兰嫂是位伟大的母亲，她身体不好，平时除了照料儿女，做好家务，还坚持下地辛勤劳动，虽感劳累，为了这个家，她无怨无悔。

在丈夫儿子被捕期间，她曾经彷徨、痛苦难过，有时甚至失去方向；加上时间的流逝，病疼的折磨、家庭的压力，身体已更加虚弱。但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不能倒下去。因此，她带着幼小的儿女们以顽强的毅力、勇敢的生活下去。

约关一年多，亚兰哥为了家中的太太和孩子们，他通过古晋的亲朋戚友向有关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回家。在多方交涉下，亚兰哥终于在 1973 年中获释，但附带条件是不许在诗巫住，并要与政府当局合作。

释放后，亚兰哥只好举家从木桂兰搬到古晋 17 哩的新生村居住。生活虽苦，但一家人团结合作，欢欢喜喜在一起。

1974 年，“斯里阿曼行动”开始，黄明道也在此行动中获释，并与父母同住。黄明道在狱中努力学习医术，通过自修，获得证书，出来后他更加努力钻研医术、苦读医术，并在古晋 17 哩开设黄明道中西医疗所。

1976 年 11 月 30 日，黄华道同志不幸在百花河壮烈牺牲。这对亚兰哥一家打击很大。但他们还深明大义，带着悲痛的心情，从诗巫“拉士贡”领出尸体，给予安葬，并安上生前的北加人民军装束的肖像，以示纪念。

亚兰哥不幸于 2003 年 1 月 21 日在古晋与世长辞，享年 73 岁。

黄周成肖像

（八） 王春举

王春举，福州籍。1946 年出生并居住在诗巫顺溪美禄福民路。年轻时，他怀着一个伟大理想和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参与了当年的斗争。在政治上，他抱定爱国家爱民族，主张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和实现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在教育上，他主张平等对待各民族的文化教育，尊重各民族的宗教、风格、传统。

长期以来，我与王春举老友都保持联系，特别在武装斗争时期，他出钱出力。我们促膝长谈，分析、了解社会的千姿百态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人物、政党领袖、小商家等的政治动态。他给了我很多讯息，使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王春举是个性格耿直、滔滔善谈、有话直说的人，即使是很友好的朋友，为了真理，他也要争辩的脸红耳赤，有时还当面骂人。因此也容易得罪人，但，只要是为了“理”而争，过后大家还是好朋友。

他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他挺直腰杆，靠自己的努力立足社会。如今已是小康之家，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他思想敏锐，判断、独立思考能力强，因此工作效率高。从当年的华教、大强、农场、合作社、路委会等工作，充分肯定了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他是一位华文教育的积极捍卫者之一。1968 年，光民中学初办高中部，学校缺乏老师。他在校方的邀请下，毅然放弃大强的高薪工作，来到光民中学执教，无奈因教育部不批准（文凭不足）而作罢；1971 年-1992 年，他出任鼎新小学和光民中学的董事。任职 22 年来，他为华教默默耕耘、付出。特别在 70 年至 73 年，整个校园因政治动荡而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每个董事、师生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坐牢。在这危急关头，他不离不弃，大胆与其他热心的董事、苏啟耀校长、师生们一起，想尽一切办法，把学校硬撑起来。在复兴期，他积极与董事们一起为扩建新校舍、物色校长和学校的招生作出了努力。他自己的三个儿女都曾在独中求学，并学有所成。

1976 年 5 月 2 日，政府当局引用内安法令，逮捕了他（同时期被捕的还有黄寿坚老友）。当时，他是去顺溪美禄合作社办点事，在回家途中被武装的军警扣捕。在诗巫南兰律狱中度过 6 个月时光。第一个月是住在“暗房”，接受政治部审问，其他时间都在“京林乐”度过。当时“斯里阿曼”行动已经结束，政治动荡也已暖和，王春举通过大哥与林应良总监的关系被释放了。但仍有 5 年的限制令，须定时向政治部报到。后来恰逢“Rascom”的一把大火，把许多文件烧毁，王春举通过与政治部的协商，才正式恢复自由身。

我重返家园后，几次拜访了王春举老友，我们忆往事，大家都感慨万千。他坚持认为，当时完全是一个政治趋势，稍有良知、爱国爱民族之心的人，都会认同当年的斗争。因此，他始终认为，对过去的斗争和付出是无怨无悔的。

右为笔者，左为王春举

第九章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环重要工作，是革命武装斗争三大法宝之一。没有了这一项工作，我们就孤立无援，革命就不能成功。

在我们分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指对社会上层人物，开明有地位人士或中间分子，积极争取支持或同情革命事业；在国外尽量争取国际方面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

这里我介绍几个较突出的事件。

第一节　　记公开战线上的林友周同志

林友周同志，顺溪美禄福民路人，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的大姐跟随姐夫回国建设新中国；二哥林友基是革命烈士；大哥在内安法令下被捕，释放后，被留在政治部做翻译工作。林友周也曾被捕，但因无证据而释放。因此，他是在政治漩涡中打滚长大的。

林友周为人忠诚、老实；办事认真、积极。平时虽言语不多，但头脑清醒，办事效率高；他善于团结人，特别是坡中的年青人都很尊敬他。

由于他放心不下家中的老父、老母和幼小的弟妹，因此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参军。组织上考虑他的具体情况，鼓励他在公开战线上多做一点事。

1970 年，他成为“0”员，从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认真的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

他曾到丹章马尼工作，也曾出海捕鱼，并有机会与中国船员沟通、联络，商讨搞武器问题，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在革命组织搭线下，他在某西医师直接指导下，学会急救扶伤的基本原理，并搞到一批枪伤药，如强心剂、盘尼西林等等。

长期以来，我们同志牙疼，主要是靠止疼片等药物解决的。若身份没有暴露，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平民到市区去解决。做假牙更不用想了，同志们甘受“没牙”的称号。

当时诗巫市有位牙医，他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开明人士。在我方积极争取下，答应为我方人员培训治牙、拔牙和补牙等技术，并提供了许多药品和器材等。

1972 年尾，在我第四军分区领导同志的推荐安排下，林友周秘密接受了学牙医的使命。诗巫市某牙医师看到林友周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大胆实践的精神，表示欣赏，并认真给予传授。

1973 年初，他学成归来，我分区卫生员向党同志成为他的第一个得意门徒。只要革命需要，他就会安排到其他单位解决拔牙补牙问题，并把所学的技术向同志

们传授。不久后，他在牙医的帮忙下，捐了一套拔牙、补牙、做假牙等器具和药物交给组织。他还买了不少有关牙齿的医书供同志们参考。从此，我革命队伍逐渐培养了许多牙医人才，并取得成绩。林友周同志居功不小也。

1973 年尾的“斯里阿曼”行动，大批武装人员重返家园，大部分前战友慢慢的消极了，不革命了。可林友周仍然紧跟着革命组织，他主动坚持交月捐，也帮忙搞了许多中国的文艺小说、书刊等，为坚持低潮斗争的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粮食；他联系的几位同志，也在他的感染下按月捐钱捐物资；他也很重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言论，只要觉得有价值，都会记录起来並主动反映。

林友周关心群众也热爱群众。在不暴露自己身份下都乐于助人（学生时期也参加福利工作队，如帮忙劈柴、砍草、割稻等），为群众排忧解难。当时马来甘榜有一些较极端的年青人，仇视、欺压来往的坡中老、妇、幼等。林友周就动员、组织坡中一些青年学习拳术，并鼓励大家团结一致，用集体方式往返，慢慢地这些地方恶势力也收敛了。曾有一个老人在他不幸逝世后，流着眼泪对我们说：“阿周死了，我这个老人只能走路了。”他述说了过去林友周是如何关心他，经常载他上市区等，还抱怨老天，“为什么都叫好人短命啊！”

他能坚持长期地下工作，除了他性格较沉默寡言外，更重要的是他严于遵守党的地下工作规则，具有很强的党性。他的属下有时会打听武装同志的住处、去向等问题，他都会守口如瓶。即使无组织关系的同志也很难从他口中得到不应该知道的东西。

25 岁的他，该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了。从家庭、个人愿望出发，他都想有个助手互相关心、互相帮忙。可他想到自己的身份，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将给对方带来痛苦、打击。他也怕有了家庭，就有了拖累，就有后顾之忧，就不能放手搞革命。因此坚持要再等几年。

林友周同志，不幸于 1975 年 12 月 11 日凌晨，在一宗交通意外中逝世，年 25 岁。由于林友周是我军的地下工作者，所以逝世前，家里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在坟头只刻下林友周之墓。右边刻有“青春闪光绿水知”，左边刻有“壮志未酬青山伴”。深刻反映了他当年青春与壮志的伟大胸怀。在一次同学聚会中，我找到一张 1969 年林友周在光民中学高三班的全体毕业照片，今特録印其一部分，以示纪念。

后排左三是林友周
前排坐者，左一是辛泽泓老师，左二是吴恒惠老师，中间是苏启辉老师
右一是宋志义老师，右二是包望珍老师

第二节　　与香港轮船的联络

基于各种因素，中国的大米、罐头和其他纪念品是深受我国华族同胞欢迎的。然而在 70 年代初，中马还未建交，砂拉越与中国的通商是通过英属香港成交的。

1971 年初，香港轮船载货来到诗巫，却受到诗巫政府当局的百般限制压制和刁难。如，不准轮船靠岸，更不用说船员可以上岸喝茶走动。因为他们怕这些船员会把中共的红色政权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进来。

为维护和争取船员的基本人权、尊严、荣誉，他们除了向诗巫政府当局递交抗议书外，还进行了实际的抗争行动。一天清晨，他们在船杆高挂中国国旗和党旗，沿船横挂大幅抗议布条，全体船员手挽着手，高呼口号，高唱中国革命歌曲等，以示抗议。

香港船员的抗议行动，吸引了大批诗巫各族人民的围观，影响深远。政府当局怕事情弄大，只好妥协，批准他们在尊重大马法律之下，可以上岸喝茶，有限制的走动。

革命组织当时还很缺乏来自中国原装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党组织文件大多数是自己手抄油印本，不够清晰，较难看）和其他物质（如毛主席像章、连环图、小说、唱片等）。于是，我们乘机通过各种管道与中国船员取得联系他们也答应并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我觉得，当时能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因为当时第四军分区党组织和同志们都能重视这方面的统战工作，我们也感谢当地的群众骨干给了我们积极、主动、有力的配合。真是“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这里，谈谈两次我有幸参与工作的一些细节。

（一）香港船员送大礼

应该是 1971 年中吧，我们得知香港轮船靠岸的消息。我们就秘密派我们的码头工友同志与船长同志取得了联系。在确定双方的身份后，我军以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指挥部的名义再一次寄信去，明确说明需要的东西（主要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他们所能给予援助的东西。船长满口答应，愿意帮忙。由于码头关卡把风严密，根本无法得手，我们决定在水路解决，并约好时间、暗号等。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月亮也起得早，我和李思旺同志划着小舟，慢慢接近香港中国大轮船附近。我抬头一看，哗！这么高大，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看诗巫市夜景，灯光闪烁，感觉真美。但大家并无心情欣赏这些，而是警惕四周是否有暗探。李思旺轻轻划着小舟，我拿着渔网，在撒网捕鱼。

虽然，我事前已在江边码头进行了“撒网”的练习，但那时是在岸上，而现在是在船上，由于重心控制不好，心情也紧张，小船左右摇摆的厉害。我第一次撒网时，差点连自己也撒出去了，还好李思旺是个“行家”，他一边控制船只，一边从旁指导，慢慢的就习惯了。只是鱼网撒的并不圆美，根本网不到鱼。可我们是“渔翁之意不在鱼”。

当时钟指向凌晨一点正时，我们眼看四周，并无异常动静，确认“安全”后，我停止“捕鱼”，坐在船头，划起三根火柴，然后点燃一根香烟，在狠劲地抽，那是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果然，大船的窗口有了动静。接着一条粗大的绳子，吊着一个大纸箱，慢慢往下垂。老李赶快把小舟固定，不久一大箱“宝物”就平安降落在船上。沉甸甸的，相当有分量。我们高兴地收下“礼物”，并向香港船员示意敬礼，他们也向我们挥手告别。

在划船回程的水路上，刚好是顺流，我们轻快地划着小舟，两人带着激动喜悦的心情，看看四周无人，彼此都在小声低唱：“东方红，太阳升，……”

（二）船长同志来访

经过几次与香港轮船的联系，合作成功后，我们成了没“见面”的好朋友。

1972 年初，我们通过关系又找到了船长同志，这次我们提出要与他见面的建议，他欣然答应。

那是一个风光明媚的早晨，太阳缓缓升起，我们在油菜岛佈好岗哨，群众和积极分子主动在各地来回“巡逻放哨”。约于早上九点多，船长同志在我群众骨干的带领下，准时抵达。顺溪美禄工作小组，身穿军装，手持北加来福枪，列队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

见面时，彼此激动地热烈握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北加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阵寒暄过后，我们就上屋坐定喝茶。

我们的会议地点是设在这位保干群众住家的大厅里。我获四分区党领导的委托，肩负起这次会谈的重任。双方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好形势有着共识，并对整个国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充满信心。接着船长同志介绍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热火朝天的干革命，搞生产，“祖国”经济欣欣向荣。…….我最后着重谈我军的成长过程，特别提到了我军武器还很简陋，希望他们能通过关

系，给与我们可能的协助。这位船长同志过去也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负过伤，解放后复员来到香港的轮船当船长。他看到我们穿着补钉的军装和简陋的水龙管枪，非常感动，表明将请示上级后，尽力给我们帮助，并表示帮助我们是他们国际主义义务。

中午，我们在保干群众家共用午餐。群众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鸡汤长寿面”。希望中国与北加里曼丹的革命友谊像长寿面一样源远流长、万古长青。

基于安全问题，不便久留，午餐后，我们彼此依依不舍，珍重道别。

我们通过这位群众与船长的关系，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精神粮食”和其他物质。但不知为什么，从此之后，香港轮船就没有再来了，我们的联系也就中断，对武器等的援助也就没有下文了。

第十章　1971 年——1972 年为四分区革命发展的高潮期

第一节　　加强民运组织

1971 年下半年，党领导为加强开展和巩固华区工作和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对四分区的民运组和特工队又进行整编。整编后华区民运组被编为上段和下段两组。

上段范围包括巴那术，德洛邦河，木杰而姑，顺溪美禄，英基罗，达山，新路，南平厂，兰兰厝，三河村，二河村。组长是葵花（后改为武英，原名詹雪娇），副组长是忠东（黄乃存）和向红（黄珠英）。组员有：红灵（许爱明）、怀英（江娇英）、立新（李孟源）、永革（许孝环）、成平（熊山根）、民辉（俞惠莲）、陆盛协、雄心、新忠（柯万同）。1972 年年尾，因武英调往特工队。忠东升任组长，向红为副组长。

下段范围包括王士来，下坡，白花河，木桂兰，罗马安，24 甲。组长是成安（赖子铨），副组长是红英（黄玉芳）。军分区领导于东（黄招发）也在此。组员有毅坚（陈光德兼任警卫员）、勇敢（吴万钦）、胡兰（陈郁芳）、向党（詹赛琼兼任卫生员）、坚（黄华道）、李玉和（刘世业）、坚兵（林兴明）、刚铁（徐邦林）、刚成（黄寿仁）、旭阳（高孔海）、明清等。

我们对老区涌现的华族革命骨干分子，青少年积极分子，进行了分组，定期理论学习和政治研讨。他们认识水平，政治党悟不断提高，这为往后的工作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我们在四分区的华族群众，进行 99%的逐家拜访、宣传教育，使他们对我党我军领导的这场斗争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我们对有嫌疑的敌特分子给予说理教育，重者给予警告、罚款处分。对罪大恶极的少数敌特给予处决。

我们活动形式是以武装活动为主，化白工作为辅。白天或晚上都全副武装在大路上行走和上群众家宣传。

我们为民众医治普通病痛，利用针灸、打补针、打鸡血等等；我们也为民众捉贼防盗，使民众安居乐业，深得民心。

对敌兵，我们也不手软，我们通过麻雀战、骚扰战、地雷战主动出击，对敌展开斗争。

第二节　　加强民族工作

砂罗越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他们包括华族、伊班族、比达友族、马来族、马兰诺族、加央族、肯雅族、普南族等。民族兄弟不仅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分布在广阔森林山区地带。

民族工作能否被发动起来，是关系到北加革命胜败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我四分区的北部，南中国海沿岸一带如马都，拉老就聚居着很多马兰诺族；在马拉山、巴拉术、拉卓邦江、都督等广阔的森林地带全部是伊班族活动的地盘。

1971 年，我分区的特工队肩负着艰巨的战斗使命，把搞好民族工作挑在肩上。他们有时结合当地民运组，去“兰高”（兰高是伊班语，是建在稻芭中的小茅屋）上长屋，动员、唤醒民族兄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71 下半年，为加强民族工作，对特工队进行了整编。

整编后的特工队，正队长是战明（吴庄贤），副队长为程明（江水池），队员有：新群（吴珍香兼任卫生员）、安娜（Nuaraini）、金平、新忠（柯万同）、新平（吴仲城）、光明、勇强、大胜、雄鹰、求平、铁英、亚文等。他们是一支机动部队，他们在华区配合民运组搞华区群众工作和搞杀敌夺武，除奸反特等斗争，他们更深入民族区，沿伊干江岸边至顺溪都督一带进行对伊班兄弟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上“郎高”，进长屋，大大扩大了我军的声誉和影响力。

到了 1972 年，军分区党领导决定加强和扩大民族工作，计划将工作扩大到峇都县和拉杀河一带的马兰诺族群。对特工队又进行了一次改编。战明（吴庄贤）乃

是队长，葵花（詹雪娇）出任党代表，星（林秋梅）同志为辅导员，副队长是程明（江水池）。队员包括：雄鹰（赖子法）、大胜（杨隆平）、勇强、光明、明忠（卢永发，新兵）、亚文（新兵）、安娜（Nuaraini，为伊班族）、求平（谢惠莲）、铁英（江丽妃）、老妹（刘世娥）。

特工队改编后的工作重点仍是伊干区的伊班族，但须扩展到马拉山，砂威河，峇都县和沿海地带。

1972 年 10 月，经军区党领导小组开会，决定特工队深入砂威河木山板厂一带开展宣传工作并计划突击峇都县的警察局。

特工队全体指战员，雄心万丈、信心百倍，冒雨前进，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到砂威河，并对柴山、板厂的工人进行了宣传。10 月 24 日静悄悄抵达峇都县范围。26 日本来是决定突击峇都县的警察局，可是后因曝露，警察局有了警觉，我们只好放弃。队伍继续深入到拉杀河尾，对那里的板厂和木山（火车路的低地伐木营寨）营寨广泛宣传，取得圆满成绩。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准备打道回华区之际，却不幸于 11 月 12 日发生驳火事件，造成卢永发同志（明忠）牺牲。队伍面对敌情紧，断粮挨饿，风吹雨打。但战友们互相鼓舞、激励、相互扶持，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历经十多天行程，终于在 12 月中胜利回到华区。（详情请参阅友谊丛书第四期《峇都记行》）

第三节　　捣毁二座正在兴建的兵营

1972 年年尾至 1973 年年初，敌相继在顺溪美禄的鼎新小学附近和木桂兰的榕南小学附近各建起了兵营。形成两头夹击，容易调动兵力，对我“进剿”。

为阻止敌之阴谋得逞，我们对两座兵营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我们对顺溪美禄和木桂兰两座兵营进行了 11.15、11.19 和 5.6 的骚扰战。

一、11.15 骚扰战

1972 年 11 月 12 日，我们从大马电台获悉，特工队同志在峇都县与敌驳火，造成卢永发同志壮烈牺牲，敌人蜂拥增兵“围剿”，企图一举消灭我军。领导上指示我们要开展斗争给予支援。

我们认为，敌人正在鼎新小学附近兴建兵营，这是一个很好的战场，若打得好一能支援特工队同志，二能暂缓或破坏敌建兵营的计划。

11 月 15 日深夜，我和成平经商议，各手提两大桶电油，静悄悄地摸到鼎新小学后面，登上三座未建好的兵营，分别把电油泼在易燃物上（如三夹板，油纸袋）和一个堆满建筑物材料的货仓，然后点燃，登时火光冲天。离此新兵营仅五分钟路程（指平时走路计算）黄仁贵荒屋的驻兵，立即开枪扫射。

二、11.19 骚扰战

继 11.15 骚扰战后四天，我和毅坚，民辉，红军等同志于 1972 年 11 月 19 日深夜又出现在同一地点。发现前几天刚烧毁的兵营，还是一片狼藉，没什么整理。就决定利用这个山头再去骚扰对面山头的敌军（即黄仁贵荒屋的敌兵）。

这一次，我们用一排排的鞭炮放在几个空罐内，然后逐个点燃。“砰砰！嘭嘭”的鞭炮声有如阵阵手提轻机关枪的扫射声，这可把营寨里的敌人搞的晕头转向。他们不断对空发射照明弹，敌兵用重型机枪“嘟嘟嘟”疯狂扫射，好不热闹，如此这般被我等折腾约半个时辰后，我方才从容转移。

三、5.6 捣毁木桂兰兵营

1973 年 5 月 6 日，天刚亮我们就已抵达木桂兰榕南小学附近建兵营的工地上。两座用木料筑成的兵营已呈现在眼前。这一次我们是总结过去烧毁顺溪美禄兵营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带来了电锯、粗大绳子、地雷等。因此一到工地，同志们就很有秩序地分工投入战斗。一个同志提着电锯把兵营的每根柱子平均约锯到五分之四深，然后埋下一粒地雷。一个同志登上屋顶绑上粗长绳，另一端栓在大路边。有的同志在四周广贴标语、大字报。

当一切准备就绪，大伙一二三，一拉长绳，兵营便“噼里扒拉”倒塌在地面上，随着地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见工地上木料、泥土、硝烟四处飞溅。同志们再放一把火，便把全部易燃的建筑材料烧毁了。

最后，我们组织人员对建筑工地的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劝告工人不要跟反动派合作，过后工人都听从劝告，当场提起包裹回家。

这次战斗是由军民同志指挥，参加者有李玉和、向党、红军、胡兰等。

第四节　　对自卫团的斗争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进一步对付农村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混合区和民族区用尽办法收买了许多伊班兄弟当自卫团。一些自卫团乘机勾结坏蛋，民防队在华人区持枪威吓、恐吓、偷、抢农作物、家禽等。这给我军活动和民众生命安危、财富等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损失。

当时在巴拉术的兴化芭，大多数农家都养有一些猪、鸡、鸭等。那些伊班坏蛋勾结自卫团、民防队、手持武器到猪栏。点上汽灯，当场把猪杀了，丢下肠胃，把整只猪劈成四腿放在“拉龙”（伊班话，伊班人用藤制成的篮子）里背跑，当时群众曾开窗喊话，呼叫，这位坏蛋就持枪对空开枪以示恐吓。可怜这些农家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坏人抢劫一空。鸡鸭更不用讲了，今晚几只，明晚几只，剩下空空一个鸡寮。不久兴化芭成为“空坡”，这更成为贼人的天堂，什么瓦锌、木板、门板、红柴柱等都成为他们的囊中物，真是无法无天！无语问苍天。

为了制止和破坏敌之阴谋，和维护民众的利益，我们对该区的自卫团进行了争取、警告和缴枪的斗争策略。

1973 年 1 月 18 日，我一民族工作队约十余人，在武英的带领下，在通往巴拉术的路上，碰上了五位的打猎的伊班族。我们立刻拉开队形，各司其职。民族工作者金平同志和安娜同志迎上了他们。我们同志以流利的伊班话向他们宣传，说明我军的性质，任务和使命，更希望华伊团结像一家人，并得到他们的共鸣。最后谈到对自卫团的政策时，也得到他们的合作。

我们全部“缴”了他们的猎枪，并真诚的表明，我们只收政府发的自卫团猎枪，若调查确属于个人私有的猎枪，我们一定奉还，并具体说明退枪的方式和地点，望他们合作。

经过调查，我们没收了三支自卫团猎枪，其他两支是属于个人所有，我们按计划于一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把枪包好，写上名字，划船放到兴化芭对面的巴拉术一长屋码头。

长屋伊班人知道这消息后，拍手称快，称赞我军是守信用的队伍。从此自卫团甚少在我军活动的地盘上打猎。

第十一章　1973 年敌我斗争日益尖锐

第一节　重新调整民运工作

1973 年初，我们虽对敌之建兵营计划予以种种破坏和斗争，但无法阻止他们继续再建。因为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除了增兵对我“围剿”外，还加紧督工，日夜守卫工地。很快的，顺溪美禄兵营和木桂兰兵营就建成，并长期住进了民防队，经常调动兵力，进入各坡活动，有的敌兵化装成猎人进山侦察我军活动。

为破坏我粮食来源，敌对农村合作社、私人小店、艟船进行粮食限制、检查等。

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也为了开展新的工作和加强兄弟单位工作的需要，决定解散特工队，战明队长调往第一军分区参加战斗队。其他相继调跑的有旭阳、程明、刚成、钢铁、战斗、明红、先锋、长风、毅坚、向红、红英等，他们分别参与了三分区，二分区的工作。

民运组经调整后，组成两个民运工作队。一队负责上段兼顾伊干江一带的工作。队长是葵花，副队长是忠东。队员有：成平、铁英、光明、勇强、永革、新忠、新平、老大、红灵、民辉、安娜、星、怀英。

另一队负责下段兼顾拉让江一带工作，由于东领导统率。队长是我，副队长是军民（平时兼职警卫员职责）。队员有：思忠、红军、胡兰、向党、李玉和、金平、勇敢、坚兵、求平。

这种调整，对当时的斗争形势，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特别两队都扩大回旋余地，在必要时尚可二合为一，较有利于保护自己。但许多主客观困难的问题却日趋严重，敌我斗争日益尖锐。

第二节　敌成立 Rascom，加强军政进攻

1972 年 3 月 26 日，政府当局成立了“拉让江特别保安区”，即 Rascom。这是当局的一种策略转变，一方面进行军事进攻，一方面加强政治攻心。政府在某些问题上采取怀柔政策、安抚民心、施些小恩小惠、极力推行反革命心理战。

政府也通过《拉让江人民之声》等反动刊物，对党军领导，进行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竭尽诬陷、诽谤，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和同志中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敌人也通过通缉和赏金为诱饵，通过直升机在天空散发反革命传单，也通过重赏在各坡收买特务，更通过蹂躏，摧残烈士的尸体，搞恐怖主义。

政府当局以上述策略之加强和改变，确在我党军内部一些同志中产生作用，内部消极因素开始萌芽、发酵。队伍内部矛盾斗争增多，使一些头脑不清醒者，对领导、对革命信心不足。加上敌我斗争更加尖锐、生死考验，生活艰苦，这都促使了内部不可避免的分化淘汰。

第三节　　1973 年内部分化淘汰

在残酷的敌我斗争面前，我们一些同志革命彻底性不强，经不起生死考验、艰苦生活、公私斗争、内部矛盾等问题，选择了逃避，不要革命，向敌人投降。有的甚至背叛革命，充当敌之爪牙。

1973 年 4 月中，在上头英基罗民运单位出现了勇强和光明的逃跑事件，然后 5 月 1 日成平，铁英也相继离开革命队伍。不久，他们四人都主动向敌人自首。再接着，诗巫市区单位也有多位坚持不了革命。

1973 年 9 月 22 日，政府当局在诗巫市区展开“诛达行动”，以“内安法令”逮捕约 30 多名有社会地位人士。以上一些离队者，有的成为可耻的叛徒，出卖了多年来支持自己的革命群众，让他们遭受长期坐牢之苦，受尽肉体折磨和精神虐待。他们丧心病狂，在公民集会上（特别是在江边的光华中学）进行反革命宣传，有者甚至充当敌之爪牙，四处带兵围捕过去的战友和革命群众，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破坏。

在这个时期，由于敌我斗争非常尖锐，敌方是想尽一切办法，利用逃兵叛徒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事实说明了这些的投敌事件，给革命工作带来很大的破坏。

当时，“拉士贡”政治部想尽各种办法，让投敌者就范，如为了怕你不愿跟他们合作，他会骗说去执行一项任务，然后带你到目的地后，才告诉你真正的“意图”，说明这一带有共产活动，让你当参谋出谋献策，接着叫你穿上军装，发给枪支和几发子弹，夹在队伍内执行“剿共任务”；他们还可以故意让你给坡众隐隐约约的看到，一旦被群众确认你带兵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轰动起来，成功制造了紧张气氛和恐惧感，敌人还可以在公开场所集会时，让你现身或有意无意去认人，把你身份搞臭，让你愧对良心、愧对组织、愧对群众、愧对人生，让你下不了台，有意无意地配合了他们的军事行动目的，你只能“乖乖”地为敌人服务，成为可耻的叛徒。如此等等。我们一些投敌者，却甘受敌之摆布，做了许多坏事，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和破坏。

当时在我华区群众中，确实密布着革命低霾的气息。他们骂叛徒的无情无义，也对我同志不信任，对革命前程感到失望。

第十二章　“斯里阿曼”行动前前后后

第一节　“斯里阿曼”行动震撼人心

1973 年年尾，执政当局利用黄纪作擅自出来“和谈”，开展了“斯里阿曼”行动。这对敌方真是一大喜讯。然而，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声响”，震撼着每个同志的心，眼睁睁的看着一批批革命战士，从此脱离革命队伍。我们感到寒心，爱莫能助。

我感到徬徨，不知所措。当时我认识水平低，还很幼稚单纯，我们只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在“严酷寒冰”时刻，仍然抱着对党的信任，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把被动变为主动，一定能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因此在党提出“出多留少”的政策后，就积极主动要求留下，愿做革命火种，做公开革命斗争的后盾。

1973 年 12 月 28 日，我四分区第一批出人，地点在顺溪美禄油菜岛码头，出去的人员是忠东（黄乃存）、立新（李孟源）、安娜（Nuaraini）、勇敢（吴万钦）、李玉和（刘世业）、永革（许孝环）、红灵（许爱明）、怀英（江娇英）共十位。

其他要出的人员转到三分区的南舌坡，他们是新平（吴仲城）、新忠（柯万同）、忠党（李家铿）、胡兰（陈郁芳）、星（林秋梅）和坚兵（林兴明）。

葵花（詹雪娇）和求平（谢慧莲）等调往其他分区坚持战斗。

坚持留守四分区阵地的有九位。即于东（黄招发）、长城（早期叫成安，原名赖子铨）、坚（黄华道）、红军（杨生智）、红英（黄玉芳）、民辉（俞惠莲）、向党（詹赛琼）、思忠（赖子法）和老灿（黄育灿）（由他分区调来）。职务分配是于东为领导，我为队长，军民为副队长。老灿是技术人员，负责枪支等的研制工作。为了北加革命事业，大家团结一致，积极准备“斯里阿曼行动”后的革命工作。

从有关资料显示，“斯里阿曼”行动在一、二省出了 305 位，被销毁多种枪支（不包括三省）224 支，各种子弹 4390 发，地雷手榴弹等爆炸物共 28 个。拉让江共出了 265 位，销毁武器 265 支。“斯里阿曼”行动结束后，第一省留下 52 位，第二省是 0 位，拉让江地区留下 122 位。使我军人员痛失将近 80%，损失大批武器弹药，使北加革命武装斗争遭到空前严重的挫折与打击。

当时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我们在达山坡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点”，在保干群众的掩护下，相对安定的潜伏起来。

1974 年 3 月 4 日，“谅解备忘录”终于在砂拉越各报章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公布了。真是“亲者疼、仇者快”，做为北加革命军人的我们，只能默默地忍受和等待。

第二节　　1974 年文主席发表三•九声明

1974 年 3 月 9 日，北加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通过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发表声明。

声明严正指出，“斯里阿曼”行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彻底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一条背叛人民的道路。

声明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外阶级矛盾和敌人的反动面目，决定了马来西亚反动派政权是我国人民当前的革命对象。

声明根据伟大导师的革命理论和北加的实际情况，指出，为殖民地半殖地人民开辟了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以邻国的印尼和拉丁美洲的智利等国革命斗争的惨痛经验教训，指出“枪悍子里面出政权”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用他们的鲜血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最后主席强调，只要我们能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只要我们紧握枪桿子，只要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只要我们真正相信群众，依赖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只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又播出《毁枪弃党就是叛变投敌——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文章。文章坚定地肯定了和支持文主席的三.九声明。文章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毁枪弃党就是叛变投敌，就是叛徒。黄纪作等领导人所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

1974 年 9 月 30 日，文主席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唯一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通真理。北共坚决反对目前在我国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坚决反对严重破坏党组织，摧毁自己的军队，把用人民鲜血换来的武器，奉送给敌人的背叛行径，坚决和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的谬论作斗争。

文章指出，形势变了，我们的政策和策略可以改变。但是我们实现人民民主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纲领不能改变。同样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是不能够改变的。

文章呼吁全党全军认清 3.4 事件的反革命事实，坚决与一小撮叛徒划清界线，在党的领导下，更高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的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前进！

第三节　　弄清路线，明确方向

文主席的三九声明，震撼着每个坚持革命战士的心，把我们心中的疑团打开了，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了。

在北共中央第二分局洪书记的领导下，开诚布公，进行自我检讨，并承担应负的责任。全面发动留下坚持战斗的同志，广泛地、深入的、认真的对路线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及时引导同志们努力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应用革命理论结合北加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认真真地弄清问题，认清道路，继续前进。

我们四分区也在于东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的激烈批判和检讨。

我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大家争的脸红耳赤，互不相让。在争论中，有的被肯定，有的被否认。大家都从认清路线，找出今后的斗争方向和目标，挖空心思，找根据，找理由。目的就是为了弄清路线问题。

当然其中有些意见是不实际的，不客观的，有的是泄发个人情绪，产生消极作用，诸如有的同志对党，对领导不够信任，对党对领导同志的能力问题产生置疑。特别是出去的领导同志表现令人失望、痛心；有的同志会乱扣帽子，提出所谓不相信党或对党有意见就是反革命、反党，诸如此类等等。

通过这次的学习、批判，使我更深刻体会到：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要搞好革命，当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没有提高理论是不行的。有了理论，脑筋才转得快，遇事不手忙脚乱。二、要加强自己实际工作能力，多动脑子，对事要有洞察力，敢于自我分析，判断，要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三、我们要加强树立大无畏的革命主人翁气概，要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干，为谁而干，不能因为党的某些领导，自己的上级或老朋友不革命，自己也不革命。我们甚至要把自己当成是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勇于承担责任，开拓新的局面。

弄清了路线问题，搞清了自己问题，明确了斗争方向，全队同志又朝气蓬勃的干起来了。

第十三章　整顿步伐，继续前进

第一节　当局撕破和平假面具，硝烟又起

1974 年 7 月 4 日，政府宣布“斯里阿曼”行动结束。7 月 5 日，敌兵又开始频繁到我活动地区活动。政府动用了海、陆、空进行大规模进攻。在军事上，加紧进山对我军进行“围剿”，或在农村大路上“巡逻”。在政治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搞心理战，迫革命家属或过去的战友，通过报章、电台公开呼吁早日走出森林，召开反动公民集会；利用叛徒大肆攻击党领导和革命事业；用直升机在上空广发传单；更用重赏通缉犯为饵，诱人上钩受骗。总之，妄图损毁党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削弱我军的斗争意志，动摇革命立场，达到消灭我革命斗争。

但这一切是徒劳的。群众对我军的精干队伍是信任的；我们对党的事业，对北加的革命事业是忠诚的、永恒的。

1975 年，为了打击当局的伪国庆，也为了表示我军仍健在，拉让江下游各军分区分别于 8 月 28 日和 8 月 30 日在各地悬挂大幅反大马标语，并装上真假雷。我们四分区用大条浮木钉上布条、标语，装上真假地雷于凌晨推出江面。无数快艇乘客，迎着晨曦，看到江面漂流红布醒目的大幅标语，无不在心里拍手称快。

1975 年 9 月 9 日，为了打击敌人和支援兄弟单位的反围剿斗争，我们四分区同志（我、红军、思忠、明辉）在鼎新路主动伏击敌人。当时，我们得知顺溪美禄兵营的敌兵正在路两旁砍杂草，令清除大路 50 码以内的路边杂草等，以防共军埋伏。然而我军早已埋好地雷，并用北加来福枪在此守候。当敌人进入我埋伏圈时，枪炮齐鸣，打死敌两巡一名。

第二天，即 9 月 10 日下午 4 点多，我们来到鼎新后山的一个临时休息点，被数名打猎的“伊班人”发现，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敌兵，还是猎户，只好一边做好战斗准备，一边向他们喊话。他们一看到我们就非常惊慌，再一喊，他们即刻拼命夺路而逃。我们没有主动开枪射击，只故意弄大撤退的路，用一根草做引线，就地埋下地雷。第二天早上 8 点多，敌兵向我临时休息点搜索，绊倒引线，地雷开花，当场炸伤敌兵两名，其中一名后来死去。当天晚上我们并未撤退，而又悄悄摸到顺溪美禄兵营附近开枪骚扰敌人，使敌人一夜不能安眠。

第二节　1976 年 8.22 起义

1976 年，党提出了“在巩固，保存的基础上，发展革命力量”的中心任务。8 月 22 日党号召斯里阿曼行动出去的同志重返部队。但没有获得前领导的支持，只获

得极少数基层同志的响应。我们四分区单位只叫回了两位新同志，即李勇（李家铿）和卫红（游怀珠）同志。其他单位也不理想，因此这次行动是失败的。

我们对那些过去整天高喊革命的人，特别是对有的领导干部感到遗憾。因他们（领导干部）没有履行承诺，根本没有也不能够组织出去的前同志搞公开合法斗争，连个开头都没有；有的甚至还借故避而不见，拒我等于千里之外；他们只顾埋头努力搞个人事业，结婚生子，……

一些“现实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的前同志，还充当说客，鼓励我们放弃革命斗争，出来社会，同享“荣华富贵”。

有的人说人家都不怕当亡国奴，你又怕啥？人家都不要革命，为什么你要坚持？

有的说我们是“傻子”，是天底下最最蠢的“笨蛋”。

一串串，一件件，令人难受疼心的讯息，……

我们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些压力，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探索真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第十四章　低潮生活（1974-1976）

1973 年，斯里阿曼行动后，我们潜伏在达山区、王士来坡和下坡。我们深居简出，努力调整自己，充实自己。我们只联络少数几位保干群众。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保存自己，等待时机。

第一节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深知，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有限的，是无法胜任党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理论，就无法指导我们去实践工作；没有理论知识，我们就无法在群众中说理宣传，就无法与他们共鸣，打成一片；没有理论，我们就倍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斯里阿曼”行动就是经验教训。

为了迎接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只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

因此，只要我们没有外出工作，每个同志都在“营寨”里专心学习，做笔记。夜里，每个同志仍点燃着小土油灯，用一个小空罐罩住光亮，只留一边灯光，我们便在那微弱的灯光下，认真学习。

第二节　　用竹筒抓鱼

我们在白花河的几条红水沟，装藏着数百条抓活鱼的竹筒。所谓竹筒，即把砍下的竹条，戳穿竹筒内的节头，成两头通。然后把它平放在水沟里。沼泽芭的泥鳅，很喜欢躲在里面。要捉鱼时，只要把一边手掌堵住竹筒的一端，另一手迅速把另一端露出水面，然后垂直竹筒，让水慢慢向手掌的手指缝流出。你就可感觉有鱼在你的手掌心蠕动。

竹筒捉鱼比竹篮好，因为竹篮（鱼篓）鱼一进去就不能出，要有空气才能活命，因此要露出水面，容易暴露。而竹筒是两头通，鱼可自由进出，只要放在阴暗地区，做个暗号即可，因此即隐蔽又安全。

第三节　　毒鱼

我们也曾在王士来后山的一条的小红水沟毒鱼，别看那杂草丛生，无人活动的水沟，却藏着无数的“泥鳅”鱼。我们把白药溶解于水桶中，然后一个在前慢慢倒药水，后面的人就在水中大力推波助浪，不久，大家就分头去捉鱼了。一袋又一袋，一桶又一桶，满载而归。我们把没死的鱼用淡盐水冲洗后，它就又能活蹦乱跳在水缸里游走，死去的就当场杀了下锅，大快口福，吃不完的就晒成咸鱼干，留下后用。

第四节　　迷你“基地”

为了落实党在 1977 年 9 月 19 日会议中提出的重建基地的号召。我们在营地四周较空旷的地带也试种起菜来。当时，主要是由军民同志积极带头。我们搞了一个小菜园。泥土嘛，是从附近山头背回来的，我们的肥料，就是不用花一分钱买的“尿尿”。但由于阳光不足，菜长得不理想，倒是金瓜藤爬满了兵工厂，甚至爬上了橡胶树上，成了天然的掩蔽物。在住点的另一侧，挖个水井，养起小鸭来了，把剩饭和青菜都给鸭子做粮食。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从荒屋借了一架胶车，在营地四周割起树胶来了。一天两片，不知不觉却割了几十斤。当时我们割胶，不但不怕暴露，反而是更有利于模糊或扫除我军活动的痕迹。

面对这迷你小基地，我们也生活得很开心很踏实。

边区基地所采集的果子和自己种的金瓜

边区自力更生建基地，这是自己种的农产品

第五节　　兵工厂

我们小队里有位技术员，做枪头手，即老灿。我们也肩负着低潮斗争研制武器的任务。因此，我们每搬到一个新营寨，就要建兵工厂。为了敲敲打打的声音不外传，我们就要建成地下室（在山地）或用烂泥土堆高成一座土屋（在低芭）。

当时，李勇、军民也都很专心学做枪。老灿不愧是技术头手，他模仿兄弟单位的土枪、真枪，终于成功制造了土制自动 sten 枪、卡宾枪和手枪。由于巧工细做，群众还以为是敌人使用的枪呢！

我们的李勇同志在得到老灿的真传后，对技术工作更加认真负责，更加精益求精，为后期转战三分区、边区时，对兵工厂的武器、弹药、炸药等钻研，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李勇同志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

边区基地的兵工厂 之一

边区基地的兵工厂 之二

第六节　　野猪栏

我们曾与一户保干群众共同建造了一个“野猪栏”。制造的方法是：我们砍了很多大腿般粗大的小橡胶树，去尾切掉根须，插在泥土中，四周用硬木板钉牢，綑实成栏子。猪栏高 10 呎余，长约 20 呎，宽约 15 呎，活门即机关门是用木板制成，用粗绳拉至机关点。猪栏内外种满木薯，只要山猪进到猪栏，踏到机关，大门从天而降，那山猪就别想再逃跑了。我们这个猪栏，曾抓到四只山猪。可惜我们的住点已经转移，而倒回来时，见到的只是几堆骨头。

我们当时建野猪栏，是为了制造一个假象。即有敌兵或有外人经过发现我们的运粮路线的痕迹时，以为是猎户来探山猪的。我们低潮的一个住点，路口便是此野猪栏。路口通往营地的路已经过我们特殊改装掩饰，不会轻易认出。而这位所谓“猪户”便是为我们通风报信的保干群众。

为加强保安，我们更与这位保干同志预先订了暗号。他在家里吹笛子的调子是那一首，就是表示有敌情或兵进芭或有急事要找我们相见。

来到保干群众家附近，见到窗口放一件东西，就知道他家有无人或其他，然后再来一个事先约好的暗号，如鸟叫、击树头或击掌等，就万无一失了。

我们用这类似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使用，确为保密工作做了不少贡献。

第七节　　赤脚兵

赤脚兵是我军在武装斗争初期时势下的产物，也是新区民众（包括伊班兄弟）赖以鉴别敌我的特殊办法之一。

所谓赤脚兵，是我们战士把鞋放在背包里，行军时是光着脚板走路。当时一方面是为了掩饰痕迹，因为当时在华区农夫不论是割胶或种菜，大多数是不穿鞋的，在民族区的伊班族也都是赤脚去打猎或走路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革命作风。只有在驻营时或睡觉前，为保持床铺或吊床的清洁卫生，才会穿鞋的。

在当时，我们确有铁脚板之称。因为我们赤着脚走遍祖国的天南地北，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哪怕是山再高，水再深，也不管它是深至大腿的烂芭或混合民族区的“隆基”芭、茅草地，我们如履平地，把我们的脚底磨出厚厚的一层茧。连我们的老群众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的脚，竖起大拇指称赞我们的“铁脚板”厉害。

可要练成铁脚板，也并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新来的或来自市区，过惯小姐少爷般的生活，是要一段时间的锻炼才会习惯的。当然啦，像我们这些从农村中来的“野孩子”，那考验会少一点的。

可怎么说，脚底都是肉长的。你说当尖尖的东西插到肉里，怎么会不疼痛呢？！比如我们在低芭森林过“亚山”刺丛时或在山上过“隆基”芭、茅草地时，脚底被那尖刺插到，也是绞心的疼痛。还有我们在低芭森林负重行军，那一脚深一脚浅的走，都会有些同志的脚底被暗藏在烂芭里的尖木插中流血。但我们只有在停下扎营时，才自己用针挑刺或卫生员帮忙敷药包扎，第二天又继续前进了。

记得，我单位有位叫红军的同志，由于他长期在烂泥中行走，两只脚经常泡在水中，结果两个脚掌得了顽癣症（水癣）。脚底皮脱落，露出鲜红的嫩肉，又疼又痒，若在土路赤脚跑，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但有时经过石头路，那是真的很疼呀！可他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前走，连“哼”一声都没有。你说他不疼吗？不！他疼！可他当时是把它当做一种考验，一种斗争。心中只有战胜它，坚决战胜它，心中才有一种喜悦，一种胜利的喜悦。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在福民路宣传群众工作完毕后，要到一间荒屋后芭的一个临时住点过夜休息。为了不暴露行踪，大家关掉手电筒，摸黑小心走路。当时我在前面带路，走着走着，突然脚底下感到一阵刺心的疼痛，使我站不起来。用手一

横，妈呀！一颗小腿般大的仙人掌倒在地上，七八条仙人掌上的刺已毫无留情，深深刺进我的脚底。我用力抬起脚，部分针刺却残留脚内，疼得我几乎不能走路，还好在同志的搀扶下，绕过旁边，才抵达休息点。当时，卫生员民辉同志，也是我的太太，用针、钳子、夹子等在我脚掌小心翼翼的挖刺，我的两只手掌拼尽力气，钳住小腿，可还是疼得我流下眼泪来。休息一天后，我一拐一拐又继续前进了。

我觉得，当时我们这些年青人除了有一股顽强的意志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一颗愿为人民、为社会、为党、为理想奉献生命的决心。因此，大家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去接受这种考验和锻炼。

第十五章　　烈士魂

中国伟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又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阶级而死，就比鸿毛还轻。"

1950 年-1990 年的四十年时间里，由北加里曼丹革命组织领导的反帝反殖、反大马斗争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北加儿女。他们为了追求理想，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解放，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千秋记载英雄史，万世留名永长存。"

回顾我第四军分区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为国为革命，捐躯的有 30 位。他们是：①居住在顺溪美禄坡的林友基、俞贤团、王福隆、张登昌；②巴拉术兴化芭有卢永发；③英基罗坡有陈世明；④百花河有黄世真；⑤王士来坡有张孔喜、黄聿开、陆能协；⑥木桂兰坡有黄华道、詹赛琼、詹赛鸯；⑦廿四甲有余清寿、黄互富；⑧从外地调来工作而牺牲的有黄增安、张宫女、袁锦香、黄祯华；⑨光中学生有吴珍香、林秋云、王丽珍、黄和泰、邱顺真、潘启美和白益忠；⑩光中老师有黄声光和朱宋盘；⑪朱玉莺和陈干共也相当长时间在我分区工作后调往其他单位工作而牺牲。

这里，我对黄华道、詹赛琼、吴珍香、林友基、俞贤团五位烈士做一些介绍，以表示我对他们深深的怀念和敬仰。

第一节　1976 年 11 月 30 日黄华道同志英勇牺牲

整十年来，由于敌我斗争日益尖锐，敌兵活动频繁，有的敌兵更蛮横无理的对待居住在后山的群众。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以通共的罪名威迫利诱，他们为顾个人

大骂叛徒和敌人的无耻行径。他积极团结身边同志坚持革命斗争，他还把传单捡回来当大便纸用，说是“敌人的免费服务”。1973年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坚持留下来，并很快意识到所谓“和平谈判”是不对的，但他还是满怀信心，在黑暗中总看到黎明的曙光。

二，勤于学习革命理论。只上过小学教育的他，深知没有提高理论，是不能为革命肩挑重任。因此他勤奋好学，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进行思想改造。因此，他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工作能力也相应提高。

三，认真对待技术工作。他写得一手好字体，为了搞好刻字工作，他反复学习，推敲《群众报》或其他资深刻字员的字体，很技巧的一笔一划学习。当时我分区负责抄刻的《少先报》，便是他用心的结晶，深获好评，为出版工作做出贡献。

写书法也是他的爱好，一有空，他就会拿起笔墨在旧报纸上练字。当时我们贴在学校、公共场所的“大字报”，就是他的精心杰作，深获得学校老师、社会贤达的赞赏。

有时他也参加学习做枪，做枪师傅说他是一块“好料”。

四，他健谈、幽默、歌喉好，深获群众、年青人的喜爱。

一次，我们刚吃完饭，天还没暗，他来到保干群众家要拿一件东西。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谈呀谈到“鬼”的问题。保干群众现身说法以亲身所见，如海鬼、水鬼、陆鬼、桥头鬼、鬼火等来说明确有鬼的存在，而军民同志则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浅出，引经据典和亲身的经历阐述、批驳，证明没有“鬼”的存在。哗，可真热闹！连小孩子也唧唧呱呱的闹到深夜，大家获益不浅。深夜了，军民才回到营寨，却忽然才记得忘记了本来要拿回的东西。唉…。

平时，他凭着讲故事和讲话的技巧，幽默感让许多年青人、小孩子，都会不约而同地在他身旁坐下，瞪着双眼，静静地等待他开口，享受快乐的一刻。因此在群众中他的信誉很好。

五，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

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他很快意识到是错了，心直口快的他，立即向军分区领导和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时天真无邪的我们，都是“完全相信党”，忠于党的。谁敢对党有怀疑，就会被批“不相信党”，甚至冠以“反党”帽子的罪名。为了搞清问题，大家进行了争论，但各有说词，难分对错，领导同志对党的路

线正确与否，进行了民主投票，结果只有军民同志投了“错”的票。1974 年文主席发表了“3.9”声明，就证明了他坚持的观点是对的。说明了他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有较高的识别能力和坚定的革命原则性。

对上级同志有意见，他除了面对面提批评意见外，也敢于写越级信给党领导，以示对革命事业的关怀和负责。

当时有些同志，曾向保干群众借了东西没有及时还或损坏了也没有赔。军民知道后，除了对有关同志提出批评外，也主动向该保干群众赔礼道歉，使同志、群众深受教育和感动。

六， 勇于牺牲，敢于战斗。

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表现机智勇敢、镇定。在危险关头，总是冲在前，阻击在后。同志们都很放心跟他一起工作，一起战斗。

1970 年 8 月 22 日，敌在我分区实施了长达 74 天的全日戒严。当时他还是一个新兵，更确切的说，他还只是 16 岁的小孩子。却肩挑尖兵的重任，终于冲破敌的重重封锁，把队伍安全带到百花河后山与特工队结合。

他坚决勇敢地参与了 1971 年的两次军事行动。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增长了军事技术，丰富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1972 年，他带组摧毁了正在兴建中的木桂兰兵营。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

1976 年 11 月 30 日，军民同志在白花河执行任务，不幸牺牲。但他短暂的一生，却闪烁着生命的活力，斗争的毅力、力量的延续，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军民同志 您的铁骨丹心，永垂不朽！

您的英雄气魄，永记史册！

您的英名，万古长存！

第三节　　向党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向党同志，原名詹赛琼，1950 年出生在砂拉越诗巫木桂兰坡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福州籍。由于家穷，只在天真小学修完后即停学。小时便跟着父母种胡椒、种菜生活。长年的劳动，培养了她艰苦朴素、爱劳动的工作作风。

1970 年参军，在王士来民运组搞群众工作。1971 年民运组调整后，参加了四分区警卫队，除了搞群众工作外，也兼任卫生员工作。在参与小组打仗时，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女战斗员。

1973 年，“斯里阿曼”行动后，她留下坚持武装斗争，愿为北加的独立解放贡献力量。

1975 年，调往三分区工作，并积极配合兄弟单位搞好各项工作。1976 年，惊悉军民同志牺牲后，悲恸万分。不久，她参加了下游支队，转战华区、民族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革命工作。

我是 1971 年就与向党同志一起并肩战斗的，直到她调离四分区。1976 年，我四分区全体同志渡江与三分区同志会合时，我们又见到了向党同志。她热情照应我们，并讲述别后情形和当前的工作状况。可当时她已是“大忙人”，常常因工作进进出出，不能陪伴我们闲聊。我们这些浅见寡闻的战士，可真是又羡慕又敬仰她呢！

1978 年 5 月 25 日，老天爷下过一阵大雨后，还是下着蒙蒙细雨。向党和同志们为护送领导同志，在过南蛮河后，在一条小路上被一位伊班妇女看见。在叫停不果后，同志们决定派向党等四位同志到附近一间“郎高”（郎高为伊班语，即小茅屋）了解情况。当时两位同志上了“郎高”，向党和倪新聚（益群同志）披着雨布在路旁守候警戒。可那个伊班妇女立即向敌兵报告了我军的消息。由于敌人情报准确、地形熟，很快沿路跟踪而来，远远就看到向党和益群，敌人枪声响后，两位同志中弹倒在血泊中。向党牺牲时才 28 岁。

廿八年光阴，对向党同志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了。可向党同志的一生是伟大、光荣的。她忠于革命，忠于党，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她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她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革命战士应具有的光荣典范。因此，她的英名是永垂不朽的。她的英雄气概永活在人民心中。

为缅怀对向党同志的哀思。在此，略谈她的一些生平事迹。

（一）勇于破私立公，勤勤恳恳为革命作贡献。

1970年尾，向党父亲去世，在党和领导同志的允准下，她回家奔丧。可刚参军不久的她，回家治丧完毕后，在家人和亲友的劝诱下，她要不要重返武装部队的矛盾斗争很大，处在十字路口徘徊。同志们知道后，每人写一封鼓励她坚持斗争的信。这给她带来很大的精神力量。她两眼噙着泪水，手捧战友们一封封充满阶级友情的信，这使她下决心重返部队，决心为党为革命多做奉献。大斗争大进步，从此她积极、勇敢、乐观坚持战斗在武装斗争的最前线。

有一次，她收到家里寄来的一盒“高丽参”和其他补药。家属是指名道姓要给向党的。可她只留一条蔘自己备用，其他的全部交给党组织集体处理。回到住点后，她又把自己的一条蔘分一半给一位女同志。后来一位同志要到远方去战斗，她又把剩下的半条蔘送给他。她说，“远方战斗，条件差，困难多，更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不要紧。”看！多好的战士呀！她这种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所有在场的战友。

大约是1974年吧，她得了一种怪症。两只手痒得发狂，后来胸、背部也痒得很厉害，然而她每天还是有说有笑。另外，由于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下生活，她也患有风湿病。天气不好时，双脚膝盖酸疼难当。但她坚持负重背粮，甚至还争着去当尖兵、开路，有时也负责断后灭迹。为了革命工作，她经常进进出出背粮、跑交通、侦察敌情。回营地后，已非常疲倦，需要休息，但她看到营地内同志们都很忙，她又主动要求去站岗、炊事或帮忙洗衣裤、烘干衣裤，同志们深受感动。

向党同志和军民同志是一起来参军的，又是同乡，又是同学，长期一起工作，两情相悦，逐步发展为爱慕对象关系。后来，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她服从工作分配到三分区工作，虽然两地相思，但他们俩都能同心同德、坚持积极乐观战斗。1976年惊悉自己的爱慕对象军民同志不幸为革命壮烈牺牲后，她悲恸万分，在党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她抚平了内心的伤痛，又坚强地乐观坚持战斗。不久，为了安抚和关心军民家属，她在领导同志的批准下，返回四分区，见到了军民同志的母亲和父亲，彼此抱头痛哭。虽当时并未坦承婆媳关系，但亲情已显露无遗。她鼓励亲人要永远记住这阶级仇、民族恨、亲人痛。一定要更好地坚持革命武装斗争，为完成军民烈士未完成的使命，把革命进行到底。

（二）敢于战斗、敢于胜利，向党是女中豪杰。

1970年8月，敌人向四分区进行长达74天的全日戒严。刚参军的她，就面对生死的考验。在反围剿斗争中，充分表现了她对敌斗争的胆略。在敌兵四处穿插、

围困的当儿，她敢大胆摸到群众区搞粮食、砍生香蕉心等。在住点被敌人突击时，她镇定地跟着同志们一起撤退，一路上连碰几个敌人旧兵营，其中一个还是敌兵当天刚搬跑的呢！同志们问她："会怕吗？"她说："说怕是有一点的，但那有什么可怕的呢！要革命，就要跟它作斗争。"

打仗本是男儿事，然而向党从小就羡慕花木兰、穆桂英，后来参加革命了，更加敬仰江姐、刘胡兰等英雄人物，决心要好好向她们学习。因此，每当有军事行动，她坚决主动要求参加战斗。

1971 年，她成功参加了一次地雷战；1972 年她参加了烧毁正在兴建中的木桂兰兵营的战斗；1975 年，她积极参加了三分区的"木山斗争"，然后转移到中南村又打响了地雷战。地雷是由她负责压响的。

1976 年，3 月 27 日，她与同志们来到丹章公集后山的一座荒屋。向党和一个同志上了荒屋，楼下两位同志在休息。突然楼下两位同志听到芭里有踩断树枝的声音，立刻通知楼上的同志。当同志们下楼梯时，敌我双方同时发现，敌人猛向我方扫射。我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形下，向党和同志们都镇定、机警拿走所有物质，安全撤退。一位同志在撤退的路上埋下了两颗"踏雷"，将沿痕迹追来的敌兵炸死炸伤。

当尖兵和后卫是大队行军两项艰难的重要差使，而这些工作往往是由精干的男同志担任的。然而性格刚强的向党同志，常常是主动争着去干，有时同志们也安排她去后面灭迹。她二话不说，便拿起灭迹棍，在后面小心翼翼扫来扫去。她说："女同志要学会独立，力顶半边天，不能什么事都依赖男同志。"多么豪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真有巾帼不逊男子汉的风范。

（三）对卫生工作尽职尽责

参军不久的向党同志，便参加了卫生员学习班。由于她勤学医理，敢于钻研、实践，诸如学针灸时，她都先在自己身上找穴位、找针感。因此进步很大。就因为她"敢"字当头，敢在实际工作中去摸索、去学习，所以深值同志们敬仰的。

记得她第一次替伤员动手术是在 1972 年 11 月 13 日，那是一位去峇都工作，因驳火受伤的女同志，弹头从侧腰进去，卡在胸部的皮层下，用手还可压到弹头。她大胆地进行了局部麻醉，然后用锋利的刀片，切开皮层，取出弹头，手术成功。事后她告诉同志们，"当看到鲜血不断地流出来，心里有些慌，两手也有些颤抖，不听使唤，但我不断用毛主席语录来鼓励自己，终于战胜惧怕，把手术做好。"从

实践中，她学到更多东西，胆量也就更大了。从此，部队内有什么刺伤、刀伤、骨折等，她都能胜任，深获好评。

拔牙虽不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但第一次必须有勇气、有胆量去实践，否则永远是不会的。向党同志第一次学拔牙是在一位公开同志（即小林同志）的指导下开始的，当时她虽然带着颤抖的心，但在同志（被拔牙者）的鼓励下，在小林同志耐心指导下，终于拔牙成功。以后，她又连续拔了几颗牙，终于逐步掌握了技巧。熟能生巧嘛！从此，她成为部队、群众中著名的“牙医师”了。有位被她拔过牙的老群众，获悉向党同志牺牲，流着眼泪，盛赞向党是位好同志。

1977 年，她参加部队由张秀琴医生领导下的卫生员学习班，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卫生员。回来后，我们调皮地叫她为“高级卫生员”。

（四）热爱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

由于向党同志性情开朗，很会说话，加上舞姿优美、歌声甜美，一碰到群众，便像亲人般在一起，因此群众（包括青少年）都很欢迎她。

她重视在群众中搞福利工作。如果条件允许，她也下地帮忙採胡椒、拔草、挑土、施肥、劈柴等，群众常夸她是劳动能手。若群众有什么病疼，也会主动找她帮忙，因为群众知道她是个卫生员。

在工作中，她除了进行政治思想宣传外，也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她也常常帮助群众解除思想矛盾斗争、家庭纠纷等，群众深受启发。

当年，我分区出了多位逃兵和叛徒，群众深受其害，因此害怕接触我军。由于向党、军民等同志长期沉着稳重的工作作风，深深得到群众的爱戴与信任。因此，群众向我们同志提议，如果是向党、军民等同志来，他们一定欢迎，一定会支持的。

（五）认真看待批评与自我批评

她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承认和检讨，时刻要求自己在斗争中学习，在失败中成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错了就改嘛，吸取经验教训嘛。因此她进步很快。

她对同志（包括领导同志）有意见也会主动、诚恳地提出批评。这也是她爱护领导、关心同志的一个表现。为了革命，她经常是抱着“宽以待人、严以待己”处世之道，与同志们一起在愉快、团结合作的气氛中工作。

在每次的检讨会上，当同志们向她提批评意见时，她都会认真听取，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即使有时批评是主观的、片面性或与事实不符，过后她亦冷静听取，并给予谅解。

在 1977 年时的一次入党讲评会上，同志们对她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有些意见是片面的、主观的。会后进行民主投票，她落选了。这使她非常难过，流下了眼泪。初始她陷入痛苦的矛盾斗争中，她感觉自己的满腔热情，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好几天都不喜欢讲话。后来，我找她谈心，并鼓励她继续努力，党是始终敞开着大门欢迎的。最后她诚恳地说：“这次入党讲评会，给我教育很大，使我真正懂得自己还存有很多缺点，这使我很难过，我对不起党。即使会上有些批评是不正确的，但我会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勉励自己，并以这次讲评会为前进的动力，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请党放心，请同志们放心，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这是多么好的体会啊，体现了她认真的自我批评，虚心求上进的。我也深受感动，并真诚地祝福她。

1978 年 5 月 25 日却传来向党同志牺牲的噩讯，我们为失去一位好战友而痛哭流泪。然而她以实际行动，完成了她的决心和愿望。在追悼会上，党领导根据她生前愿望和实际表现，追认她为光荣的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党员。

安息吧！向党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

詹赛琼肖像

第四节　　人民的好女儿——吴珍香同志

吴珍香，兴化籍，家住诗巫后浦港，1951 年生，小时就读建兴小学，年少聪明好学。于 1966 年在建兴中学毕业。1967 年，为了继续深造，她来到 Sg Bidut 光民中学就读高中班。

她是位勇敢坚强的女孩子。当时要从后浦港（老家）或中华路（外婆家）去光民中学念书，没有电单车，更没有汽车。只能每天骑脚踏车在往返那黄土小路。虽然路途遥远，小土路坑凹凸不平，来回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中途还需靠渡轮过伊干江，若是遇到雨季，那将更加辛苦。可这没有阻止她，她始终坚持天天往返不误。

有一天早晨，她与往常般来到光民路对岸码头。刚上渡轮，突然一艘快艇从旁疾驶而过，掀起了很大的浪花。船小左右摆动厉害，她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被震落江中。不谙水性的她，一连喝了几口水，感到天昏地暗，处在万分危险之际，幸好一位马来青年在码头上见状，立即勇敢地跃下江中，把她救起，否则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她对这位勇于救她的恩人，感激不尽。每当谈起跌江之事，她都感到“怕怕”。但为了去念书，为了追求人生崇高的理想，她还是勇敢地、风雨不改，坚持往返上学。

在学校里，她都会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活动。她虽不是主角，但也从不落人后，坚持认真完成。1968 年，光中举办了一次运动会，她参加了女子短程赛跑，在全校师生、啦啦队的“加油”声中，她勇敢地向前跑，最后虽然没有拿到名，但她敢于参加并坚持跑完全程，这种精神，是可佳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每逢学校有举办联欢会，她都会主动参加演出。由于她歌声甜美、舞姿轻盈，博得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她是兴化人，在校内讲话又“大声”又“凶”，像在吵架，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经常凑在一起，有时也学她讲兴化话，笑她讲“你吃饭”变成“猪吃饭”。可她知道我们不是恶意的，大家都在“争吵”的欢笑声中度过快乐的时光。

平时，我们无所不谈，但有一点，基于组织纪律和严密原则，我们都没有相互暴露身份，彼此心灵相通、互相鼓舞、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大家团结在一起，搞好工作。三年的校园生活，使我们结成了深厚的感情，成为最友好的朋友之一。

1969 年 10 月，珍香同学积极响应学运组织提出参军的号召。她毅然离开学校，离开自己的家，勇敢地参与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武装斗争。当时她取名为新群。

初时，她是参加拉让江下游第四军分区顺溪美禄民运组。1970 年初转到百花河民运组，为了更好地工作，她与同组的战友、保干群众等结拜为兄弟姐妹，由于她排行第八，大家都亲热地叫她“八姐”。同年九月，敌人对四分区进行了长达 74 天的 24 小时全日戒严。刚参军一年多的吴珍香同志，随百花河民运组与敌人展开了“捉迷藏”的斗争。敌人因怕碰到共产党，大老远就在呼喊、吹口哨和砍树，因此他们都顺利避开，不与敌人正面交锋。不久他们主动撤离“围剿”区，并联络上东方红特工队，顺利抵达木桂兰坡。

1971 年中，她又重回顺溪美禄民运组，协助恢复和推动群众工作。1971 年尾，参加东方红特工队，任卫生员职。不管在民运组或特工队，她都积极乐观战斗，她关心同志，也关心爱护群众，她全心全意为大家针灸、按摩、治伤敷药。在斗争中，她逐渐锻炼成一名优秀成熟的革命战士。她是一位很好的革命战士。只要是工作需要，她二话不说，坚决服从，并出色地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1972 年，她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奔赴中游民族区，接受更艰苦的民族工作。主要活动地区是在 S.Machan、S.Lijan、S.poi 河尾一带，协助思英同志搞好卫生工作。从此，她抱定为落后的民族同胞的觉醒，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坚持战斗在中游伊班区，并改名为思晶。

在中游民族区工作是艰苦的，常常是吃不饱，菜类经常是马拉煎配盐头；行军时要爬山涉水，还要面对那讨厌的水蛭和山蛭（吸饱了血，伤口还一直在流血）。这对于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女知识分子来说，其考验是可想而知的。初时，她有些不习惯，思想有斗争，特别是背重上山，赤脚跑河边的石头路。驻营后，二脚酸疼无力，一坐下去就懒得爬起来，连下山冲凉都会有斗争，更不用说劈柴炊事了。但这对一个已决心献身民族工作的她，坚决敢于跟“私”字展开了斗争，并把它当做一种考验，考验自己是真假革命的试金石。从此，每当行军住营，她常常哼着小调，帮忙劈柴煮饭，甚至在同志们已疲倦地绑起吊床睡觉休息时，她还拿着药箱，跟这个洗伤口敷药，替那个针灸、推拿治病；每当在缺粮时，她尽量少吃，让同志们多吃些，特别是让背重和体弱多病的同志多吃；每当长途背粮，她都坚持多背，甚至从一些有病痛的同志身上抢东西背，……同志们深受感动。

在民族区，生死考验是很大的。除了要警惕民防队和敌兵的军事围剿，也要时刻提防少数伊班特务的出卖，更要警惕敌人在镇压后，许多长期的好群众和落后分子被收买，有意无意的出卖革命。吴珍香同志在 1973 年就经历两次出外执行任务，被伊班坏蛋告密而驳火，造成多位同志壮烈牺牲事件。

第一次是 1973 年的 6.20 事件。当时吴珍香同志是参加中游白鸽工作队。6 月初，她与同志们来到 Poi 河尾的一条支流，叫 S.Bilat 与中游团结工作队组成一支临时宣传队。珍香同志是负责排练歌舞，以备演出。可能是由于活动已有一定的曝露或拔木薯的痕迹以及营地练歌舞等声响的曝露，被伊班坏蛋与民防队跟踪到营地附近，并于 6 月 20 日清晨，当珍香同志和同志们正准备吃早餐时，敌人从背后向他们突然袭击，造成四位同志壮烈牺牲和多位同志受伤，而珍香同志与其他同志都分散安全撤离至 S.Machan 河尾。

第二次是 1973 年的 10.30 事件。当时吴珍香同志随队伍来到 S.Lijian 支流 S.Kelimit 工作。10 月 30 日，他们碰到一对和我军关系很久的屋长夫妇。这个屋长是个靠不住的贪心的两头蛇。当时他们表现很害怕，我军向他们了解敌情时，屋长说没有，但他的妻子却说有。同志们不以为意，在离稻芭不远的一条小河边山坡上驻扎下来。约于傍晚 6 点多，珍香同志和几位女同志都围着“沙龙”在河边冲凉洗衣服。志武独自在临时住点下游河边冲凉，遭到敌人袭击而牺牲。珍香和一部份同志在上游河边冲凉，听到枪声，立即倒回住点，整理了装备，向上游半山腰安全转移。据后来的情报得悉，原来是那个坏蛋屋长去告密，民防队沿路跟踪而来，导致驳火。

敌频繁的军事行动，造成驳火，死里逃生、敌迫击炮的轮番轰炸、敌之诱降心理战、敌之粮食限制，造成只能靠杂粮为生、群众中坏蛋的告密陷害、民防队的追踪……，以上这些不但没有吓倒珍香同志，却把她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

1973 年 12 月，“斯里阿曼”行动开始，这给同志们思想震动很大。但为了民族千秋大业，为了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珍香同志决定留下坚持武装斗争。“和谈”不久后，我们收到她寄给我和华区同志的信。信虽不长，但充分体现了她对革命的豪情壮志和深厚的同志情，她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把革命进行到底，我深受感动。从此，民族区成为她的家，伊班族成为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她融入长屋，与群众同住同吃，帮群众医疗治病、帮群众劳动生产、认识他们的风俗习惯、体验他们的生活状况。Apai Indai 都称她为“好闺女”。在部队，她保持以往活泼开朗的性格；她坚持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她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她很有爱心、心胸宽阔、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她也能与各种类型的同志团结合作，搞好关系。

时间过得真快。她在伊班民族区扎根已五年多了。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她的足迹，家家户户也都留下她的身影，这是她成长的地方，是她感到自豪的地方。她下决心要迈开大步，为民族工作为唤醒伊班兄弟姐妹而不懈的工作。

1977 年初，她奉命与同志们在 S. Matna 一带搞粮食。由于一段时间的活动，已造成暴露，已经探悉敌人暗兵曾来此侦查活动。对此，同志们已经有所警惕。但基于工作需要，必须再搞到一批粮食。

1977 年 3 月 1 日，珍香等三位同志接受任务，并找到一个长期联络的伊班保干群众帮忙买粮。可是这一带伊班群众，已遭受敌人的残酷镇压，有些群众变化较大，许多过去的好群众在敌人威迫利诱下，有的便有意无意地出卖革命。这位保干群众也已被敌人镇压并被收买，他出卖了我军叫他搞粮食的消息，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当天，珍香和其他两位同志接到该伊班群众送来的粮食，正背着沉甸甸的米粮，低头沿群众河边路回程赶路。可敌人早已在河边埋伏，并占着有利地形，准确向他们三位同志开枪。我们敬爱的吴珍香同志与其他两位同志（孙剑平同志和李道进同志）同时中弹，壮烈牺牲，时年 26 岁。

噩讯传来，令我们昔日的同学、战友，深深沉浸在悲痛、惋惜的悼念中。我们誓言要接过她手中的红旗，要继承她未完成的遗志，前赴后继。

吴珍香同志，您不愧是女中豪杰，您永远是人民的好女儿，您的英名将永留青史。

吴珍香肖像

第五节　　林友基烈士和俞贤团烈士永远是人民的好儿子

人民事业的好战士

大约是 1979 年吧！我们小组人员（包括我、于东、红军等）来到顺溪沙碟南平厂的一个群众住家搞宣传工作时，这个群众（郑氏）在无意间惊爆了一个秘密，这也是过去我们心中永远解不开的谜。今天终于在案发现场，听这位群众细细道来。那是 1969 年 6 月的一天深夜，我们的林友基同志与新接头的领导、交通员等围坐在这位群众住家餐桌上喝茶聊天，并观看一支新制造的枪支。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在交谈时，一个同志一时疏忽，扣动放在餐桌上猎枪的扳机。“砰”的一声，坐在枪口方向的林友基同志腹部被击中而牺牲现场。时年 21 岁。意外发生后，尸体用挂尾车载往哥乐多，埋葬在当地墓园里。一个年青的生命就因此意外悲剧而长眠九泉。

党组织，在这意外事件发生后，怕产生不利影响，采取内外高度保密。时间久了，在家属、战友等的追问下，领导上于一年后才公开了林友基烈士是因枪支意外走火牺牲，没告知详情。此事曾在当时内部个别同志中引起猜疑，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林友基烈士，1948 年生，诗巫顺溪美禄福民路居住。少年就已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63 年已是砂罗越先进青年会会员。是当时学运的基层干部。1964 年是四分区领导小组成员。1968 年 5 月转入地下工作，1969 年初调往达山坡接替俞贤团所负责的民运工作和兵工厂工作，直至 6 月牺牲。

林友基烈士生前对工作非常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非常热忱。他对党忠心耿耿、立场坚定，是一位难得的干部人才。平时他的性格较静，但遇事沉着应战，不慌不乱，深得群众和战友好评。他做事力求最完美，有缺点有错误就改正。因此，在许多工作中，都取得很好成绩。他本应大力发挥自己的才智，为人民解放事业做更大的贡献，然而他却用短暂的人生，走完光辉生命的征途，实为可惜。

写到此，使我想起了同是诗巫顺溪美禄福民路居住的俞贤团烈士。俞贤团烈士，1947 年生，1961 年就参加革命组织在光民中学的学运工作。1962 年参与农运工作，1964 年已是当时的农运干部。1968 年接任顺溪达山的兵工厂工作。1969 年调往诗巫市郊任领导工作。他是一位意志坚强，坚定不移的革命同志，他是一位有魄力、有冲劲的年青革命干部，却也因枪支意外走火而中弹牺牲。

1971 年 3 月 11 日上午九点左右，正当俞贤团同志在诗巫市郊黄梨园胶芭的一个住点埋头工作时，一位刚参军不久的新兵在玩弄枪支，不幸意外走火。弹头不偏不倚正中俞贤团同志背部，并穿过胸部，当场倒下牺牲了。牺牲时年方 24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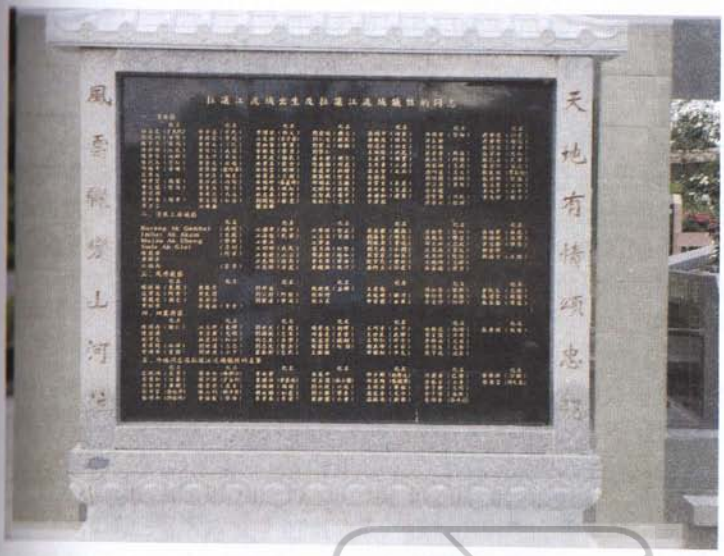
据早年从印尼连队训练回来的同志说，当时边区也曾有一位同志，把自己的来福枪当拐杖，下巴靠在枪口上玩枪。不知是震动力过大或是自己把扳机扣了。“砰”的一声，把自己的下巴打穿了；据称，早年砂人民游击队在反“围剿”斗争中因病、因饥饿、因伤而死的；边区也有同志因吃癞蛤蟆蛋而死，……

从表面上，这么好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牺牲，特别是被自己同志误射而牺牲，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冤”或“不值”。觉得要牺牲，也要倒在轰轰烈烈的战火中，那才是英雄，才不枉此生。但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当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党、人民事业时，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随时为革命事业做好献身的准备。不管是战死沙场、不幸意外身亡、仰或冤死，都是为了革命事业，都是我们尊敬的烈士。

林友基烈士、俞贤团烈士和许多不幸身亡的战士，在她们短短的一生中，那么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忠心耿耿、立场坚定为砂罗越人民的反帝反殖事业，为人类的美好理想做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永远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永远是人民的好儿子，人民事业的好战士。

俞贤团

林友基



图为位于新珠山卫理墓园，纪念在拉让江流域出身及拉让江流域牺牲的同志陵墓。

第十六章　　转战大江南北

第一节　　与第三军分区同志会合

为达到更好保存自己，巩固内部，1976 年 12 月初，我们横渡拉让江，来到下新芭森林，与第三军分区同志结合。我们心情都很激动，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孤独小组战斗，来到此，看到了大部队的风貌，看到了领导同志及久违的红兵同志、向党同志。我们回顾过去、畅谈眼前、展望未来。从此，我们融入这个革命大家庭，为了共同理想，一起生活、一起战斗。

第二节　　九一九会议胜利召开

1977 年，“9.19”会议顺利在拉让江中游举行。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副书记洪楚廷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致拥护洪楚廷为中央第二分局代理书记，王连贵为副书记，温贤定为委员等。

会议明确规定“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的决议。

9.19 会议是一个成功的会议，全体坚持斗争的同志，都在这会议精神感召下，抛弃一切思想包袱，昂首阔步，奋勇向前进。

第三节　　重组下游支队

1977 年尾，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委员温贤定带着警卫队来到了东南坡森林三分区营寨，重组了拉让江下游支队。温委员为党代表，杨祖华为指导员，黄招发任支队长，刘华荣任副支队长。其他队员有：秀琴（张淑英）、立志（黄珠英）、红英（黄玉芳）、武英（詹雪娇）、东武（杨云庭）、勤红（池贞芳）、江晖（陈世灿）、承志（吴松花）、铁汉（张延居）、图新（何可兰）、持政（林树雷）、求平（谢惠莲）、强汉（黄长安）、坚强（钱本兰）、长城（赖子铨）、民辉（俞惠莲）、向党（詹赛琼）、忠勇（刘祥勇）、思忠（赖子法）、大胜（杨生智）、李勇（李家铿）、敢斗（林政本）、红兵（谢水源）、革红（黄美华）等。

下游支队，肩负着党和祖国的重托，为战胜革命低潮，进而打倒英马反动派，为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而英勇奋斗。

第四节　　我与民辉共结连理

东南坡森林营寨，座落在林中的一个独立小山头，构筑着坚固的工事，四周有茂盛的大树小树为自然屏障，来路布有岗哨。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营寨，是一个具有纪念性的营寨。

1978 年，我与民辉同志，时年 26 岁。经长期共同战斗，互相认识、恋爱，觉得时机成熟向党领导申请结婚获准。因此，同志们兴高采烈在此营寨为我们筹备婚礼。当天早上，我们带着领导同志和全体同志的祝福缔结连理。记得，当时同志们给我们布置了“新房”。我也带着迎亲队，“欢欢喜喜”的把新娘迎回来，并举行了结婚典礼仪式，经领导同志亲自批准签名为证。傍晚，同志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晚上也有闹房，同志们载歌载舞，还有精彩的相声演出等等，战友们都以茶代酒，给我们以声声的祝福，大家欢乐至深夜才散会。

第五节　　大江南北任我行

来到三分区成立下游支队后，我们的同志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增长了见识，我们认识了从不同单位而来的战友，我们取长补短，我们也看到领导同志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官兵一致，亲切待人接物的温馨场面。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了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和阶级感情。

在军事上，我们也扩大了活动地区，提供了更大的迴旋余地。在地理上，东来森林、东南坡森林、亚山港森林和南蛮森林，连成一片。这真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那苍苍绿绿的大树，除了是野生动物的天然摇篮，也是我们革命斗争火种得以保存发展的好地方。每当出门工作回来，只要一进到这林海，就感觉到心情舒畅，精神抖擞，连睡觉也是甜蜜的，真正感受到“家”的可爱。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生死斗争考验并不大。因我们人少精干，迴旋余地大。这已不是刚参军时只能在顺溪美禄地区转，菜园芭转。现在我们可以在四分区、三分区、二分区、远至一分区，甚至还能够转到更远的地方去。不管是低芭平原、高山峻岭、仰或是茫茫大森林，只要有个指南针，一张地图在手，要去哪儿就有能力，也有办法去哪儿。吃的问题更加多样化。实际经验告诉我们，除了菜饭能温饱，森林中还有取之不尽的“板督”、“亚扁”心、硕莪等都能当粮食。若能在林中营寨种些木薯、蕃薯、芋头之类，粮食将无愁也。我们上山可以打猎，下河可以捉鱼，特别是在三分区低芭森林更捕捉了不少乌龟，在低芭倒树头坑洞水塘里，有许多贪吃的生鱼（我们叫丽鱼）在张口瞪眼等着你来钓呢！四分区的红水河，用竹筒便活

捉了不少的泥鳅。因此，事实已证明，北加革命是一定能够长期坚持的，绝不会饿死的。

第六节　　认清局势，继续前进

对我们来说，考验最大的是长期坚持斗争的决心和毅力。身经十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深知北加革命艰难性、长期性。民族问题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场革命斗争，单由少数华族精英去拼杀，是不能胜利的。只有动员各民族群众起来，以革命事业为己任，积极参与斗争，方能成功。因此，这是一项极其繁重又神圣的工作。过去，我党我军已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才取得这份成果，今后还需准备更大的付出和牺牲。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70 年代末在国际形势上，东欧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落，我们邻国的泰国、缅甸等国的人民武装斗争走向挫折、低潮没落。中马建交后，给了我们反面影响很大；在国内，反动统治集团推行一定的改革和执行中庸政策，使民族矛盾缓和、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因此，普遍人民都能在较安定的环境中生活，满足现状，不思改革，这些都造成了我们革命事业的长期性、艰难性。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战斗下去，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本能的告诉自己，我们是共产党员，要以党员的条件要求自己，要为实现人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战斗。

1977 年到 1980 年，我们除了参加三分区和大队的工作外，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有派小组渡江到四分区工作。初期主要是我、民辉、红军、思忠四位，后来于东队长，红英也直接参加。说句老实话，久久来回一趟，许多老群众都显得格外热情，见面时总是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离别时都会吩咐小心看路、平安回家。

前面已说过，由于四分区的人文、地理条件优越，因此，我们来工作时，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包括对社会结构的新状况的认识，人民群众的新心态，政党的政治最新动态等等。我们也能增加一定的经济收入，也能搞到一些重要物质支援兄弟单位。

吃的东西，那是不用讲了，群众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甚至特地杀鸡杀鸭等给我们加补。若逢年过节，那更是有口福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情景，仍然是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有的好群众，已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了。他们说“为了革命，你们仍能在这么困难情况下坚持斗争，你们宁愿奉献个人青春，不求个人荣华富贵，坚持在林中受苦

挨饿，图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我们国家，人民能翻身解放，过上更幸福的日子！因此，今天你们能来我家，这是我们的荣幸，就如同一家人！”

积极的东西能鼓励我们继续勇敢，乐观地坚持下去。但是也有消极的、反面的东西。一些群众说的也是真心话、内心话。因为形势确实是变了，我们人少力量弱，难以与强大的阶级敌人抗争。还有“斯里阿曼”行动出去的那么多前同志都不要再革命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再坚持？！还有什么生活好啦，安居乐业啦，还有国际的苏联、中国……。因此一些老群众出于对我们的关怀，劝我们走出森林，过安定和平的日子。

我们很感激老区群众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因此我们只有更加清醒认清局势，勇敢地继续前进，走向未来。

第十七章　1982 年记边区行

第一节　边区潇洒走一回

1977 年 9.19 会议，掀开了党迈向建基地的序幕。初期，我们都在国内搞生产点，如 OMT 单位去 OYA 河的混合区，民族区搞，后来都因暴露而放弃。1979 年转到 OYA 河尾和达斗河尾，大量生产板督粉，内部才较安定下来。中游武工队也在 SG.Poi 河尾等地搞生产，也因暴露而放弃。我们四分区也在营地附近搞起“迷你”基地，我们种菜，养鸭，甚至也在营地四周割树胶，但这些都是实验性，学习性的。

到了 1978 年 2 月 19 日，由刘队长率领的 8 人先锋队，于印尼境内的 Tekalang 河建立了重返边区的第一个武装斗争基地。他们的重任是艰苦的。他们每天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起早摸黑苦干，要荒山野林长出粮食。经过 20 多天的艰苦奋斗，终于“基地”露出了曙光。

1978 年 7 月 30 日，洪楚廷书记也带领一批同志参加基地建设。他们开展了“加强战备粮运动”，同志们更加斗志昂扬、辛勤劳动，至此，边区基地已奠定了初步基础。

1979 年 5 月，温贤定委员又率领一批同志增援边区基地。增加了生力军，同志们更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

1980 年和 1981 年迎来了稻谷大丰收，并解决了一定量的战备粮。同志们满怀信心，要把边区基地搞好，支援和配合整个革命斗争的需要。

1982 年 2 月 4 日，国内领导王连贵政委带领了部分国内同志来到了边区总部。

当时我们也接到要去边区基地参观学习的指令。我们欢喜若狂，提早来到南蛮森林等候联络员的到来。他们是星火、武英、我、民辉和红军 5 位。

1982 年初，7 号、04 和毅坚（5 号）来到了我们南蛮住地，表明边区基地建设欣欣向荣，正准备搞水力发电。我们立刻叫群众买了一台 1500 瓦特的电动机，爬山涉水、千辛万苦轮流背到中游，却在联络点接到边区基地告急的信息。我们只好把电动机收藏起来。

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来到了 Katibus 河尾。只见河两边奇石磷峋、两岸峭壁凌空、河中乱石丛立、滚滚河水冲击着乱石而爆发一浪接一浪的浪花，使人看了晕头转向，眼花缭乱，那里还敢游过去？！而带路的 5 号同志地形熟，有经验。只见他上下侦察并无情况后就立即把两张大塑胶布相叠着张开，把背包、吊带和其他东西都放进去，两头绑紧，变成一个“浮艇”。再把枪架在“浮艇”上，并用绳子綑实，以防翻覆。毅坚同志身强力壮，又是游泳好手，他把一条粗绳子绑在“浮艇”的一端，就哗啦哗啦的先游过去，那粗绳子拦着急流而拼出“哔叻哔叻”的响声，不亚于一场战斗。其他同志立即扶着浮艇，顺着急流，半推半拉，终于游向对岸。

过了河，就进入稀少人烟的地带。有时沿着山垄的山猪路跑，有时在河边沙滩上急行军，在华区长大的我们，可真是山芭佬，什么东西都好奇、好看。看到垄顶的大巨石，真想与它合影留念；看到河岸边像鹅蛋的石头，真想背几粒回家；看到那倾流而泻的大瀑布，真想下水去泡一泡；看到树上的猿猴，也要学着猴子叫几声，……。我们真是大开眼界，一边行军，一边欣赏边区的好风光。

负重爬山涉水确实辛苦，特别是上山岭时，约十五分钟就要一次小休息。每天下午三点多就扎营休息。早上七点就继续赶路。由于已深入到无人烟地区，我们显得格外轻松。一次登到山顶上，一位同志提议，放开喉咙，大声狂喊，以泄心头“热气”。我屏住呼吸，大声呼叫，但因长期习惯低声细语说话，我喊不出也不敢放声喊。在一些同志的带动和鼓励下，我尝试几次喊叫，结果我和大家的成绩都不理想，反而是把自己喉咙喊痛了。

每当队伍扎营休息时，捉鱼可亦是美差了。我们预先准备了一张一寸半洞的鱼网，每当在河边驻营，便先下河张网，不久就有鱼儿对我们张口瞪眼了。边区的鱼，由于天天在激流险滩中逆流游走，所以不管大小，煮出来的鱼和汤，都特别甜美、好吃。

一次我在河中张网捕鱼，感觉水有些异样。富有经验的 7 号同志向河尾一望说，河尾下雨了，要爆发山洪了，即令收网上岸。我一上岸，把枪支吊带拿在手里，心里还直喘气，只听见“轰隆，轰隆”声响，小木夹着大木桐随着急流“从天而降”，宛如万马奔腾。我目瞪口呆，真的看呆了。7 号同志拉了我一把，“还不快走”。我爬高一步，水位跟着涨到我脚下，才 5 分钟的时间，水位涨高到一丈多高，一条小河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比第二省鲁巴河的“梦幻”，还要壮观呢！

我喜欢打猎，刚来时，因地形不熟怕迷路不敢走远，有时也跟 5 号同志一起去打。中游的猎物较精灵难打，内陆偏僻的猎物就比较容易打。在初进边区的路上我们总打不到山猪，最后很幸运的我旗开得胜，打到一头山猪和一只吠鹿（山羊）。

说到打猎，我还有一段趣闻呢！为了改善伙食，也为了过过打猎的瘾。有一次，我单独一人，持枪沿着边区的一条山脉走，山垄边尽是山猪刚挖过食物的痕迹，但却没有看到山猪。当我漫不经心地走着走着。突然一只山猪远远向我走来。我一惊，持枪欲打，但猪是直对着我的，又比较远不好打。同志的“山猪经”告诉我，要打前腿直达心脏，一枪就倒。可这山猪一见到我，先是一惊，随后还是闲哉悠哉向我走来。原来这地方的山猪很少看到人，还以为是“同类”吧！所以没有逃跑。可我没经验，看看旁边光溜溜的，没有一棵树供我靠身，又怕它跑掉，若站着打，又恐打不准。于是就地俯下，用手腕托在地上，持枪瞄准待机才打。可山猪还不跑，还是头向着我，是直行的，又太远难打，我学着四脚蛇向前移动。山猪还是看我不动。我大着胆子再爬，还是不跑，我加快了速度，可能是吓到牠吧！一个箭步跳向山边不见了。我怎么后悔都已来不及了，要送到嘴边的美食就此飞了。

一路上，我们也经过边区的“鹿湖”、“山猪洞”，听闻着同志们打猎的趣闻，增加了我对大自然奥秘的兴趣感和探索感。我们也看到在树上翻筋斗的猿猴、苍天大树上的猩猩、急流险滩的白磷鱼、潭中看着鱼群、河边奇石林立，让人望而惊叹。

某日，我们终于来到了砂印边界，这山势果然与众不同，高山之巅到处是巨石、石壁、参天古树。山垄的路，由于经常有山猪等动物走动，形成了一条又大又阔的路模，非常好跑。但山高、空气稀薄，跑山感到特别的累，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卫生员说这叫“高山反应症”。我们只能慢慢跑，慢慢适应。

当晚，我们在分水岭山边一个小垄的山猪湖边过夜。所谓山猪湖，就是山猪、鹿等经常在此冲凉、休息的地方。时间久了，成个大坑，下雨聚水而成的。此湖水深约半尺左右，虽不很大，但也够我们小组用。幸好山猪已有几天没有来光顾，水

还算清洁。因为有水虫在游走，绝没有毒。虽然不卫生，但我们还是用它冲凉、煮饭。

由于山高，天气寒冷。边区同志说，扎营时，雨布的四个角，必须尽量绑低，不要让冷风有机可乘；另外还特别交代，要多穿衣服、盖好被，以防着凉。果然，到了深夜，冷风飕飕、寒气逼人，身体直哆嗦，吊床布和被都已潮湿。还有雨布上的雾水，不时滴在脸上，我只好把身体卷曲在吊床里，才勉强入睡。

天刚亮，带队同志叫醒大家。我带着僵硬的身体跳下吊床，一不小心，头顶就触到雨布昨晚凝聚的雾水，冷得刺骨，立时打个寒颤。还好我年青，身强力壮，不畏惧寒冷。我抡步走出帐外一看。哗！精神为之一振。看那朵朵云雾在我们营地四周漂浮，我们真有点像置身于仙境的云层之上，成为会腾云驾雾的“孙悟空”了。

匆匆吃完早餐，整理好装备，我们又启程了。约莫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了砂印边界的分水岭，一越过这条岭，便是印尼国土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和兴奋。因为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印尼，来到波涛汹涌的马罗河，来到期盼已久，由我党我军在此所建立起来的基地。

出于好奇，我走向垄边的一块巨石岩，往外一望，真是雄伟壮观。山坡像墙壁那样陡直，许多爬藤植物，英勇顽强向上攀登；向上看，刚才的云雾还在绕着山边转，依依不舍地升空；往下看，见到的全是树梢、树叶，再下去就是黑洞洞的深渊。若有人敢在此纵身一跃，我保证他一定会粉身碎骨，从此深山留名了。

1982 年 2 月 6 日，我们到达 Tekalang 河。Tekalang 河是马罗河的一条大支流，这里孕育着为北加独立解放的英雄儿女。它像母亲，让我们陶醉在它的怀抱里，在它的沐浴下成长、壮大。它不愧是一条“英雄”河，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在 5 号同志引导下，来到 Tekalang 河的一个过河地点。当时没有下雨，水深至腰，可河面常年水急，河床急流更急。强壮有经验的同志在前指挥引路，并指定我们新人和女同志都须手紧拉着手，一个拉一个，脚板用力紧踏河底石头，面向上游蟹行而过。并特别强调，无论河底急流多急，都要坚持顶住，不能放弃。这才不会被急流冲走。我也小心试探缓缓而过，到中心点时，有股很强的冲力在猛推着双脚，若不镇定，脚板一松，就立刻被海龙王拉去当女婿。唉，可能只当看门兵吧！

我们终于成功平安过河，但却收到紧急通知，边区反“围剿”斗争开始，总部命令我等速返回至 S. Piyang 一个临时营寨集合。总部人员也聚集在那里开会。

1982 年 2 月 14 日，边区基地会议总算胜利结束。会议审议以往的政策，探讨了国内外形势，并通过了几项重要决议。第一，会议重申了当时中心任务，“巩固，保存，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力争发展。第二，准备成立东北突击队向东北挺进。第三，对国内外华区工作，做了一定的部署和调整。

3 月 2 日，边区同志分成三队分散转移。他们是(a)洪书记一队，率众转向另一生产点，待机而动。(b)温委员率众继续坚持德卡兰河流域，进行反“围剿”斗争。(c)王付政委一队在余清禄的带领下，一路顺风，返回国内至卢仙一带分手。清禄等去中游木山营活动，王付政委转回 OMT 单位，我们经南蛮森林、亚山港森林和下新芭森林，抵达东南坡。我们在党的新政策、新动力的激励下，继续坚持开展华区工作。

边区基地的乒乓桌

边区基地的羽球场

边区基地文娱演出

边区基地文娱演出合照留念

边区基地的一只小猿猴

边区的小花豹

边区基地的生活照

边区美景之一

第二节　　边区基地的猎犬

1980 年，我在边区见到了爱国同志驯养的两只猎犬。长得黑黑的，不大也不小。据说是通讯员在伊班长屋带回来的。当时两只小狗，瘦瘦的，站都站不稳，怪可怜的。后来在同志们的细心照料下，牠们逐渐健康成长，聪明伶俐，深得同志们喜爱。不久母犬怀孕，产下一群的小狗狗。而两只大犬在主人的训练下，成为边区基地的猎犬。他们天天在边区基地稻田和菜园驱赶野兽、小动物，为农作物减少受破坏，作出了贡献。

一天，母犬满身湿漉漉的奔回营地，看到主人后，便缠着不放。初时，主人只觉得怪怪的，为什么母狗今天总绕着他转，跑几步又回来在他的脚边缠着转。过了一阵子，主人也因很久没有看到另一只公犬，也担心牠的安危，便要起身去找。母犬见状，立即高兴地在前边引路，主人紧跟在后，约莫跑了数公里的路，在一个山边看到一幕令主人感动的事。原来两只猎犬捕捉了一只约 30 公斤的山猪。公犬守住猎物，母犬飞奔回营地，引领主人去领回。唉，真是两只很有灵性的猎犬啊！

可惜，两只猎犬刚学会打猎，想进一步为主人尽忠尽责时，便面对边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当时斗争形势尖锐，为恐暴露目标，主人只好忍着眼泪将两只猎犬“就义”了，并给予厚葬。几只嗷嗷待哺的漂亮小狗狗，也生不逢时，在转移的路上，相继饮恨九泉。为了这些狗，我们掉下了串串的同情泪。

写到此，使我想起当年在华区工作时，许多狗的故事。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由于我们华区革命工作者多在晚间出外活动，因此有些狗往往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它一见到外人在路上行走，总是朝你汪汪汪的吠，甚至会狂追不舍，有的同志就特别怕被狗追。后来我们总结了很多对付狗的方法。其一是手持木棍，甚至狠狠用石头、木块对它抛去；其二是撒胡椒粉刺鼻之物；其三是当狗对你狂追狂吠时，你立刻伸手把戴在头上的帽舌向后一拉，然后拼命大声地原地踏步十几下，狗会以为你回头追击它，而夹着尾巴，拼命往回逃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四我们为了避免行踪暴露，会事先有计划地叫有关群众把狗关起来，等我们离开后才放出来。

可是，到了 70 年代，敌我斗争形势更加尖锐，敌人采取戒严、宵禁来封锁消息，乘机秘密（白天、晚上）调动兵力，当时我们往往是循着狗一户接一户，此起彼伏的吠声，来判断敌情和推测敌兵部署状况，进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赢得先机。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狗确是人类的忠实朋友，也是当年我们通风报讯的“警铃”，帮了我们许多忙，为革命事业也做出了贡献。

第十八章　难忘的低潮斗争点滴（1980 年-1987 年）

第一节　1980 年后的华区工作

于东离开后，我受党的委托，负责四分区的的策划工作，铁汉负责三分区工作。对于各分区的群众工作、青少年工作，大家在能力范围内，不分彼此、积极主动把工作搞好。

当时，在四分区工作的方式，还是以武装活动为主，并结合化白工作，我们的重要对象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年轻的积极分子。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为了地方安宁，为了民众利益，我们也对本单位一些地方的恶势力，特别对一些无知的青少年吸毒和聚众闹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因为这些青少年的家属很多都是我们的老群众，有的是误入歧途，有的也对现实不满，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确有很大的改善。对于极坏的，给予严厉警告，或离境处分深得民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内部有两件人生大事，是急待解决的。第一件是对单身同志努力促成好事。我们不是神，也不是和尚，我们也需要爱情。我们有好几个男同志的年龄都是有 30、40 多岁了，为了革命事业，无缘处理对象。党为此也很关心并做了努力。他们把单身同志轮流调到华区工作。作为华区工作者，我们极力为单身同志穿针引线，介绍有条件发展的对象让他们自由发展，经过努力凑成好事的有亚坚和雪梅，立新和永真。其他单位成功的有思忠和林红，耀武和可清，毅红和峰云等。有缘者终成眷属，可喜可贺。对于不能如愿者，我们只能鼓励他，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并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坚持革命工作；第二件事是对已婚夫妇的后代孩子问题。由于革命是长期的，准备一辈子进行革命斗争的革命夫妇，在有一定条件下，想要个小孩子来延续香火，是合情合理的，是允许的。说一定的条件，这个标准是很难定的。十月怀胎嘛，在这段期间，情况随时会变，就随缘吧！有几个革命母亲都是在险象环生，冒着生命危险产子的。作为革命母亲，真是伟大啊！

第二节　1982 年 8.8 驳火事件

1982 年中，王付政委警卫队来到亚山河森林扎营。他们是：王连贵付政委、怀坚、劲强队长、向前、怀锋、风雷、峰云、毅红、志峰、增坚、耀武、武英、星火、学民、江晖、承志和祥勇等。我们华区几位工作者，奉命来到营地，共同参与休整，学习，约有廿多位。

亚山河森林和南蛮森林，都是一片沼泽地，虽经砍伐，但还有很多魁梧的“马拉甲”树，树根高且干燥，是扎营休息的好地方。这里也能找到一些小山头。亚山河的福州籍群众和南蛮坡的广东籍群众，长期以来都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

当时的营地是在较深入地带的一个单独小山头，四周是沼泽地，恰够 20-30 人的小队扎营。依山一字形展开，每俩人一个单位，都有一间够睡觉、学习的“小屋”。每间小屋旁都有坚固的工事、战壕等。岗哨放在中间的前方，也是进山大门。我们利用倒树、“马当”（树桐）筑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直通外面。这样的路，行军方便，灭迹容易，敌兵也不容易发现。

1982 年 8 月 8 日，约于午时 11 点左右，一股敌兵恰巡逻到我营地岗哨的右前方休息吃饭。军用食格的敲击声，砍树枝声，夹杂着叽里呱啦的马来语。我们清醒地知道，敌人又进山“围剿”了。当时是学民同志站岗，他立刻拉响了警报，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在我营地的一头是我们的晒衣场，所以比较光亮。两个敌兵漫不经心，毫无戒心的恰从那里鑽上来。守卫在那里的指挥员和战士们立即举枪对准敌人就射。随着枪声，明显地听到两声惨叫。而此时，在队长和王付政委同时传出了命令，“同志们不用紧张，狠狠的打”。战斗打响后，守卫学民也朝右前方敌人开枪，并压响了地雷。当时，枪炮齐鸣，敌人被这突来的猛烈枪声吓呆了。敌兵虽有开枪还击，但也不敢贸然追击。一阵火力过后，指挥员命令撤退，我们大队主力有秩序的安全转移。守卫学民也奉命撤退。当他撤回营寨迅速背跑自己的军包。在越过篮球场（营地中间我们建了一个篮球场）时，耀武和祥勇已在那里接应他。不久，耀武看到一个敌兵冲到篮球场，被他一枪击毙。这一仗，至少打死打伤敌人各一个。

由于驳火，大队决定转移至下新芭森林。可当我们越过亚山河后，发现下新芭森林里也同时有敌兵正在搜索。为避开敌兵锋芒，我们只好找个较隐蔽的临时点住下来。由于当地储粮点只有米和少许罐头，我们廿多个人的队伍，好长的一段时间，只能每天煮一大锅饭，配一罐红毛鱼或一罐肉酱或一罐午餐肉。生活虽苦，但同志们都很乐观和团结，共渡反“围剿”斗争。

过后，王付政委转回 OMT 单位，而我们华区工作组向东南坡华区转移。

第三节　　几位革命母亲的经历

一、阮赛兰

阮赛兰友，部队名志方。她怀第一胎时，可算惊险万分。其中经历了 1983 年的 4.18、7.29 与 9.25 三次反“围剿”斗争。前两次我不在，第三次我可参加了。为表扬志方对作为妈妈的伟大胸怀和在战争动乱年代无怨无悔的付出，特此略述一二。

据同志们的回忆，1983 年的 4.18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她已怀孕四个月了。由于长期活动，有了暴露。敌在侨南、嵩山、砂廉和乌也路 7 哩等一带进行了四天的 24 小时戒严和长时间的宵禁。他们得到消息后，立即趁夜撤离群众区，转移到森林边缘，不失时机的突围。虽路途面对艰难、饥饿、病痛等考验，却都能遇事不乱、遇险不慌，主动机警避过与敌正面驳火。五天左右才转到安全区。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那是在同年 6 月尾 7 月初的时候，当时小组决定到发富港一带找个较稳定的住点，让已有 7 个月身孕的志方有个安定地区生活和分娩。可是敌人于 7 月 29 日又对当地进行了另一次的“围剿”。当时志方等同志也还是在“围剿”区。他们虽主动转移，但还是於中午时分与敌人遭遇。由于大家警惕性高，先发现敌人，并抢占了有利地形，主动先开枪并击中敌人，然后安全转移。由于驳火，敌采取“梳发”战术，动员约 2 千多兵力，密集搜寻。同志们又一次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几经艰苦，约一星期才撤到安全区。

第三次的遭遇，那是 1983 年 9 月。当时第三军分区华区，敌兵明显增加了活动，经验告诉我们，敌人又要向我们“围剿”了。由于志方同志产期将近，我们选择到南蛮大森林安营搭寨。队员有孕妇志方、接生员承志、助手民辉，其他成员是扬帆、学民和我。

9 月 24 日，我与扬帆护送星火和武英（准备去第四省）离开后，我们顺便处理了一些事情。由于有敌情，我们只能搞到一些粮食和产妇的必需品，用肥料袋绑好背回来。约于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森林边沿地带，突然听到从森林方向传来有人跑动并踏断树枝和军用水壶碰撞声。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跑路的痕迹和小树的摇动，也引起敌兵的警觉，并向我们喊叫，命令我们不许跑。我们估计驳火已不能避免，就闪到大树边，主动先开枪射击敌人。敌人也向我们胡乱扫射。我们乘敌人火力稀疏之际，仍顺利背着粮食向森林深处转移。由于我地形熟，很快就回到住地。同志们看见我们平安回来，都放下心头大石，出来迎接我们。

我们简单的收拾一下便转移了。撤离前，一个同志把已压死的两只鸭子从烂芭里重新挖出来背走。在途中，还听到直升机在低空盘旋。直到晚上 7 点左右才扎营。我们立刻起火烧水，把死鸭烫水拔毛。但毛多热水少，很难拔。索性把鸭皮剥掉，煮熟包装，给孕妇备用。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就向亚山河转移。傍晚时分，当来到亚山河附近时，还看到敌兵刚走过的痕迹。我到河边侦察时，远远看到有几个敌兵在河岸上下走动。记得当时下着大雨，我们布好岗哨后，便乘机小心冒着雨游过河，离河约 30 分钟路程，就扎营住宿。翌日清晨五点多，又继续向下新芭森林前进。

9 月 27 日，当我们来到东南坡森林，发现这块森林也逃不过劫数，敌兵已在该区进行深入纵横穿插搜索。傍晚 6 点多我们来到此地时，孕妇走到不能再走了，她也因几天的紧张劳累，恐临盆在即。因此我们暂不去见群众，就在敌兵穿插过的两条路中间，找个较好的地形，搭起营寨，用两条大的烂木垫底，上面铺些小树棍，就是孕妇的产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次连续的反“围剿”斗争中，志方表现令人佩服。在转移路上，仍坚持背着自己的背包。虽然肚里的小宝贝顽皮，她仍忍着疼痛，一手托着肚子，一手拄着拐杖，咬着嘴唇，喘着粗气，流着汗水，坚持跟上队伍。

1983 年 10 月 2 日凌晨两点，我们就听到婴孩“哇哇哇”的哭声，得知母女平安，大家终于放下心头大石，非常高兴。第二天傍晚，我、民辉、学民，便护送小婴孩到东南坡，通过群众关系，把小宝贝送出去。

二、俞惠莲

俞惠莲是于 1979 年尾怀孕。当时她是一位华区工作者。初期物质生活条件还好些。可是十月怀胎，她仍不时要面对敌人的军事行动。

有一次，敌兵大举对华区进剿，为避敌锋芒，她与同志们一起转移。为不让战友添麻烦，她仍坚持自己背军包和持枪行军。当要过亚山河时，她以为像平常般一定能独立游过去。于是，她“扑通”一声，跳下去便游。哪知这次她是挺着大肚子，没那么灵活了，加上体力不支，她游至半河，有些挺不住，还喝了几口水，眼看就要沉下去，还好强汉同志看见了，立刻游过去助她一把，才带着疲乏的身体和紧张的心情，顺利上岸。

来到了亚山河大森林，住进了大部队的营地。所面对的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物质短缺问题。由于是大部队，米粮需求量大，加上华区有敌情，搞粮并不顺利。因此

必须节省。可民辉当时也会多吃些，同志们也另加照顾。有时即使是少许马拉煎配饭，也吃得津津有味。

1980 年 7 月 20 日是她难忘的一天。她肚子疼痛得厉害，这是分娩的前兆。接生员和战友们都在紧张地准备并期望她顺利分娩。可是羊水已破，孩子还是不能生下来，时间再拖下去，婴孩和母亲都将有危险。在同志们的声声鼓励下，终于产下婴孩，母亲也平安。但因婴孩在母体内逗留太久，生下时身体已呈紫色，似已无生命气息。同志们并不放弃，一直拍打婴孩的屁股进行抢救。不久，终于“哇”的大声哭起来，鼻子和嘴里还流出许多羊水，脸色逐渐好看，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我们按照计划，通过群众关系，安全把婴儿护送出去。

可是，我们的女儿，却成为残疾儿。初时医生诊断是软骨症，只需多吃些钙片和早晨多晒太阳，就会慢慢好起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还是不能坐、不能翻身、也不能拿东西，一切都需大人帮忙解决。后经名医诊断，确认她是因出世时脑缺氧，运动神经损伤，导致终生残疾。

我们寻找很多名医和器材，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但病情皆无好转。后来经过她自己的努力和我们的各方面配合协助，她能坐着，并用僵硬的手支撑身体一步一步往前移。她听觉灵敏，头脑思维正常，但不能言语；她吃东西不能用牙齿咬，只能直接吞下。稍大后，她已能勉强自己吃饭、冲凉、穿着衣裤和简单的手语。

我们曾通过政府的福利部、卫理的福儿院等协助处理。但终因年龄太大，国家并无足够完善的设备、人力、经费等而拒绝收留。因此，至今尚在自己家中生活。

三、Sinia Ak Ubong

作为一个革命母亲，是要随时与“死神”打交道的。当时我们部队内缺乏高科技的器材、药品、技术。我们都默默地希望每位革命妈妈都“福星高照”。否则一旦出现难产，诸如坐胎、横胎、临产骨盆不开或血崩等，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剖腹取子”的卫生设备和技术。

我们的学锋烈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 1981 年 5 月 9 日产下孩子后，自己却因血崩，不幸逝世于达岛河尾（S. Anap），年仅 22 岁。

学锋同志，原名 Sinia Ak Ubong，是北加人民军付司令的二女儿。她 12 岁参军，跟随父母和同志们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战斗过中游武工队，OMT 武工队，求勇工作队和参加了艰苦的基地建设。1978 年成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党员。她确实是一位伊班族优秀女儿，党和军队的好战士。

1979 年 3 月 18 日，她与怀学结婚。婚后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相亲相爱。怀孕后，她坚持做自己能做的事，诸如厨房炊事工作、制造藤制品。那些箩、筐、篮、篓等都是她的拿手绝活。她也时常帮忙同志们缝缝补补，洗衣晒衣等等。

她深知自己是位伊班人，要与华族同胞沟通、生活，必须要学会讲华语。因此她努力学习，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获益不浅；平时也坚持用华文写日记、思想报告。因此到了后期，她已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就是一个这么好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革命母亲，却与我们永别了。亲爱的妈妈！您的战友和您的儿子永远会记得您的伟大，我们也永远会怀念您的！

四、其他革命母亲

洪惠莉，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当我怀余民洪的时候，是在印尼边界临时基地里，我吃金豆（玉米），吃了几个月。因而我天天吃、餐餐吃金豆，白天吃金豆，晚上吃金豆。……"当时恰是马印联合"围剿"边区基地，可想而知是多么的艰苦。到快分娩时，才从边区撤回国内，在 Oya 河尾把孩子生下来。

其他的如立志（黄珠英）、增坚（余碧兴）、一心（毛巧兴）、新苗（江秀娇）、承志（吴松花）、红英（黄玉芳）和图新（何可兰）等等，都是在革命转折后当上妈妈的。她们怀孕期间，都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营地从一个地方又转到另一个地方；吃的方面也很简便。产后有的有"做月"，说白了，也只是比平时的伙食好些，并无天天大肉上口，有的并没有机会"做月"，就要参加反"围剿"斗争了。

因此，这些妈妈都是当年在森林里，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才把孩子生下来的。希望这些后代能更加珍惜自己、爱惜自己，做个好青年，不要辜负妈妈的期望。

重返家园后，许多妈妈都与儿女团聚了，这是可喜可贺的。但也有个别妈妈并不那么幸运，基于各种因素无法与自己亲生的儿女相认，实为可惜。

图新同志，在森林里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是由于当时条件差、亲人不理解、联络有困难，无法照料孩子。因此只好寄托给好群众、好心人抚养成人。可当他们重返家园后，养父母却不允许让他们与儿子相认。

十几年的光阴，养父母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早已当做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了，怎能舍得还给你！另一方面，做为亲生母亲，她是经历了千难万险，才把孩

子生下来。这是自己婚后幸福的结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呀，她又怎能不珍惜、不疼爱呢！

敬望双方父母都能理智地处理问题，大家团团圆圆、快快乐乐。也希望孩子长大后，作为儿子要妥善处理好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的问题。大家都是亲呀，要做到尽善尽美、遗爱人间。

第四节　　1984 年末永真来参军

1982 年 2 月 14 日，边区基地会议重申了“保存巩固的基础上，力争发展”的中心任务。要我们华区同志力争发展新兵，这样才能突破，才能进步，才有希望。在工作中，我们主动努力抓点、找目标，对个别较有希望青少年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团结教育。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永真同志，家住民丹莪，父亲是我党的第二军分区出色的群众干部。长年来，当过保干群众、联络通讯员，等。他忠诚、积极，毫无怨言为革命工作奔波操劳。革命转折后，我们同志又来到他的家。他热情依旧、盛情款待我们。当时永真同志还是一个含羞答答的姑娘，躲在后院厨房，偷听我们的讲话。在同志们的鼓励、引导、教育下，很乐意与我们来往。在铁汉、立新等同志的积极努力教育、培养下，最后她选择参军，为革命贡献力量。时间是 1984 年 11 月。

永真的决定获得她父亲的满口答应和支持。参军那天，父母亲亲自送女儿到联络点，并在一个群众家里一起共进晚餐。他的热情大方也感染着当地的群众和我们同志。革命高潮送子女参军只属少数，然而在低潮革命时期，愿意送子女参军，实属罕见。这就更显示出永真和她父母亲的革命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为永真有这样的一个革命父亲感到高兴，我们也为永真能在这个时期来参军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五节　　关心和帮助群众做好事

伊兰坡又叫伊兰岛，地处南舌、合春园、丹章公集的后山。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很多后山住户纷纷搬跑，荒屋连连。因此南舌坡通往伊兰坡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是无人烟地带，是一个与外界有些脱节的乡区，成为“孤岛”。

伊兰坡是一个平原的胶园地，农民靠割胶为生，生活较贫苦。当我们来到时，当地只剩下 5 家住户，人口不足 50 位。他们诚实、善良、团结、合作。

伊兰坡群众对革命同志很热情，也很好客，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我们白天帮他们劈柴、砍草、割树胶、针灸治病疗伤。晚上我们上屋子与群众聊天，从国际国内的大事，说到家庭，个人琐碎小事，包括内心的心理活动。

这几家的孩子可都是机灵鬼。你看他们在你旁边围坐成一个小圆圈，昂着头，两眼看着你，期待着听你讲故事。有时不是我们不会讲故事，而是天天迫着你讲，一题接一题，没完没了。讲到最后，还要绞尽脑汁乱编故事了。小孩子晚上听还不够，大白天放学一回来，扔下书包，又跑到我们的临时住点叫我们讲故事，最后还需劳动他们的父母帮忙领回去。

这里有一家叶伯伯。他家比较穷，屋子极为简陋，若不及时修，将有倒塌的危险。我们几个同志大胆献议，帮他建一个新屋子，并获得他们赞同。于是 1984 年 11 月，在左邻右舍帮忙下，终于物色了一间附近的荒屋。我们的红军同志，早年是个木匠，大胆承担了重任，“呼呼，嘭嘭”的做了起来。

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就把旧荒屋拆完，然后用脚车把木料载到新地点。经过整修，拼排，选择了一天好日子。全村齐动员，天一亮，大人帮忙扶大柱、上大梁，小孩子忙着搭着脚车四处巡逻、侦察，妇女们忙着煮菜做饭。中午就挂上“上梁大吉”红布了。当晚全部工作人员吃上了妇女们精心制造的丰盛上梁饭，尽兴而归。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我们几个同志全包了。在红军同志的指挥下，我们又盖瓦又钉板，前后共用了十五天的时间，一间新木屋就呈现在眼前。坡民看后，拍手赞好，赞扬我们手脚快、技术好。叶老伯一家人拉着同志们的手，声声表示感激。

因此有一段时间我们把伊兰坡比喻“天外天”，是“世外桃源”，是我们的“解放区”。

我们帮群众建一间完整的新屋子，确是头一回，也是创举。帮助群众钉鸡寮、建猪栏可是常有的事。

写到此，使我又记起一件事。那是 1976 年尾的事了。那时黄华道同志牺牲后，我们转到道南坡住点。一家保干群众叫我们帮忙建猪栏，我们欣然接受。那时也是红军同志指挥。由于规模小，容易做，红军同志有些“轻敌”，因他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环节，即那几条大柱子没有个别用木板架稳。当柱梁做好后，我们摇摇晃晃爬上去钉“砂厘瓦”了，可能是震动太大吧！只听见“咔嚓”一声，猪栏向后便倒，我们也跟着摔下来，还好不会高，大家只受点皮肉伤。只是拆裂了一根柱。经过修整，总结了刚才的经验，只用一天时间就把猪栏建好了。大家都很高兴。

搞好福利工作，既能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也能调动群众革命积极性，又能搞好军民关系，何乐而不为呢！

第六节　　难忘的团圆饭

1985 年 2 月 28 日，是华人农历除夕，我们趁着这喜气洋洋的日子，大家庆团圆的时刻，来到了四分区。我们的目标是去会见几位久别的前战友。他们为了生活，为了拼搏个人事业，平时是很难相见的，而农历新年是最好的时机。

除夕那晚我们分别拜访了五家革命群众。他们都热情邀请我们入座吃年夜饭，说那是除旧迎新，从此大家团团圆圆，生活美满幸福。入乡随俗吧！我们与群众一起欢度这愉快的日子，彼此相互道贺。那晚，我们吃了五次除夕团圆饭。

初一，我们拜访了几位前同志。经他们努力拼搏，事业有成，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我们为此表示庆贺。我们无话不谈。其中谈到了这社会问题，他们揭露这五花八门的社会是如何的黑暗，资本家、剥削阶级是如何的阴险狡诈，为了个人事业，他们是如何的辛苦操劳等等。最后，他们却怀念起过去在革命部队时同志之间纯洁友情、阶级友爱，在困难时是如何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他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和今后的斗争方向。我们表明了我们这些少数“傻瓜”要坚持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获得他们同情与支持。分别后，千叮咛、万嘱咐，要小心多保重。

第七节　　“保存、巩固、发展”搞好工作。

1982 年起，我们是在王付政委直接领导下工作。一般上，我们离开大队，可以出去工作半年或更长时间，然后回来集中整训，共同检讨工作、思想问题等。这也是党在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决定，也是为巩固、保存内部而决定的。

当时扬帆为华区工作的总负责人，他监督各区的工作，但重点负责诗巫郊区和对外工作，学民负责 OMT 单位，志方负责一分区，图新负责二分区，铁汉负责三分区，我负责四分区。在工作上，除特殊需要高度保密外，其他我们不分地区，彼此互相配合，发挥各自所长，有时是重点集中突破工作等等。基于这种工作关系，我们小组在拉让江下游和 OMT 地区走透透。我们可以而且必须熟悉所有活动地区的地形、行军路线、联络点和群众。我们是以集中工作为主，分散为辅，我们原则是在保存、巩固的基础上，力争搞好工作。

由于这种工作方式，给我们扩大了回旋余地，我们有如燕子般，在广阔的天空任你飞翔，有如一条蛟龙在敌人的心脏穿插。

第十九章　1985 年砂沙政局新动向

第一节　1985 年经济萧条，人民怨声载道

1985 年的经济非常不景气，木材业价低、建筑业、养鸡业都陷入半停顿状态，有的被迫改行。

马来西亚外债日增达 500 多亿元（内债 360 多亿，外债 206 多亿），大马每人包括刚出生的娃娃须负债约 4000.00 元左右。国家财政，大受打击。

砂州虽是大马的一州，但却是全国最贫穷的州属之一。据《诗华日报》4 月 26 日报导，砂州 1985 年平均日产 15 万桶原油，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为国家带来庞大经济收入，但砂只能享有 5%的开采税。同样的，联邦政府拨出天文数字款项来建造的民都鲁液化天然煤气厂，为联邦国库带来可观的财富，但对砂而言，也只有 5%的开采税。计划中的巴贡水力发展计划，砂人民要付出建筑计划约 100 多亿的部分经费，还要面对天然环境被破坏，四千多位居民受徒置，……。

以上例子，充分说明了砂通过“大马”虽脱离英殖民地统治 22 年，而今却又成为吉隆坡变相的殖民地。

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确对统治当局存在着极大的不满和反抗心理。这动荡的经济使人民陷入生活的困苦中，渐渐地在人们思想中产生着反政府的意识，给我们的斗争带来生机和希望。

第二节　哈里士下台，百林上台，让人振奋

1985 年 4 月 20 日，在沙巴政坛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于 1985 年 3 月 5 日刚成立仅 46 天的团结党，在没有支会、区会，也没有党员的情况下，在沙巴州 4 月 20 日的州选举中，却获胜，得 25 席，沙统 16 席，巴索党 1 席。国阵人民党惨败，仅得 6 席，人民党主席哈里士却被团结党的一名农夫，名字叫卡社阿贡隆打败，大爆冷门。结果团结党以反对党的身份执政沙洲。这件事，却给我们打一针强心剂，我们决心静观其变、等待时机。

这说明只要我们能坚持斗争下去，革命就有希望。这说明，若当权的统治阶级已不得民心，而绝大多数的人民要反抗时，国阵政府也是会倒台的。沙巴州是一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2008 年半岛的州大选，民联也在吉兰丹、吉打、霹雳、雪兰莪、槟城，五州同时打败国阵政府而取得州执政权。

第廿章　武装斗争继续走向低潮

第一节　　边区面对马印围剿

1981 年，由于边区基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以及防空等方面的疏忽，大片大片的生产地逃不过敌人的空中侦察。

1982 年 2 月 6 日，敌人正式向我边区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力，我们大队主力只好转移。2 月 14 日边区基地会议结束后，大队分散安全转移。留下温委员带领一部分战斗人员在后方与敌人周旋。

不幸的是，边区一个生产点的志明被捕，他经受不住考验，出卖了革命利益，造成他的爱人，孩子同时被捕，而华联队长在驳火后受伤，一次在过河时被急流冲没而牺牲。他的爱人 6 号同志，竟一个人在林中坚持一百多天，受尽苦难、边区的粮点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联络点也大部分暴露。我们的联络员，侦查员在敌人围剿区冒险穿插联络、侦察、运粮等。

基地建设给同志们带来鼓舞和希望，但却也起了消极的作用。特别在敌人进攻时，我们不但不能保卫“家园”，却在叛徒、敌兵围剿下，分批撤退，一直至 1986 年全部放弃了边区基地。

在总结经验后，同志们感觉到，从 1973 年右倾投降路线到放弃边区基地，是经历了十三年的艰难曲折斗争。我们不但不能把革命事业推向高潮，反而是形势对我们更加不利。因此党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和战士对革命成功之望感到渺茫、颓丧，而出现了离队。这就造成了我们革命内部进一步分化淘汰，革命斗争走向更低谷。

第二节　　1980 年-1985 年内部的分化

从 1973 年右倾投降路线后，党军虽不断进行总结经验，推动各项政策，期望把劣势改变为优势。可是经过十二年的努力拼搏，到了一九八五年，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和我们自己内部存在的严重弱点和缺点，已使我们无法达至目的。我们的事实是：我们只能在低潮斗争中煎熬，只能采取“保存为主”，低潮形势日趋严重。

首先，在国际上，印支三国解放后，局势演变很令人痛心。诸如中越交恶、印支人民逃奔怒海、柬共的极左路线、苏联东欧的民主改革、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其次，在我党军内部存着相对严重的缺点和弱点。诸如内部队员年龄增大、体质逐渐老化，病痛增加、单身汉爱情问题不易解决、夫妻间相互影响，有些同志革命锐气被磨损，不愿再承担更长期的斗争与个人付出……。

其三，重建边区基地失败的影响。基地重建起了正面积极作用，但也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当基地遇到敌人破坏而宣布撤退时，这使内部产生对革命前程更加悲观消极的情绪，以致加剧一部分同志的立场问题。

其四，敌之中庸政策。敌对外加强了中马外交关系，鼓吹第三世界和东盟的新兴力量，加强了国际地位。在国内，国家经济也逐渐复苏，政治局势较稳定，人民生活水准也获得提高。这也缓和了阶级、民族矛盾。群众安居乐业，不思改变。因此，大部分人民群众（除少数坚定的革命群众）对我军坚持斗争只表示尊重和同情，缺乏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这也造成新兵来源短缺、部队的队员有减无增。

最后，敌通过革命家属和有关的社会人士进一步对我军加强“和平、诚意”争取、散布“宽大”政策。即凡我放弃武装斗争，返回社会的队员采取既不严刑逼供、也可以不出卖群众、组织机密、不带兵等，逐渐恢复自由身。

因此，1980 年至 1985 年当时国内和边区等单位，出现较大的分化淘汰，包括高中级干部。特别是 1984 年和 1985 年边区离队者多达 26 位。他们虽感到走出部队不光彩，但有部份至少在内已得到党军领导批准的时间出去，对外也得到政府和家属等口头承诺的优惠条件。因此罪恶感会觉得少些。

一些回返家园者，尚可自我改变工作方式，参与社会活动，有的也确实走向另一个人生征途，继续为推动社会、民族民主，推动民族教育而尽绵力。

第三节　　靠理想和革命毅志力坚持革命斗争

对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战士的离队，我们思想虽有所准备，但同志们听到消息后，心情都不好过，大家相对无言，在一阵的沉静中，感到揪心的痛和说不出的难过。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战士有些从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经历多次高低潮斗争的煎熬和无数次战火纷飞的严峻生死考验；他们能征善战，工作能力强，本来是我军中的精英，是党未来的财富和希望，而如今却在这关键时刻决堤了。

因此，我们深深地感到十几年的革命持续低潮，确实是考验人。想想自己能否顶得住，或能否坚持多久，确实值得自己深思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经历了几次高低潮斗争考验或十几年、廿年的斗争都走过来，就自认为是个彻底的革命者。我

们只有在人生征途中坚持到最后一刻，那才说明自己是完全彻底革命的，否则你只能说，过去曾是真心实意干革命的。

低潮以来，我们坚持华区阵地，面对五彩缤纷的诱惑力和低潮斗争的煎熬，也不能说我们都是无动于衷。我们也是从旧社会出来的一分子，身上留有阶级烙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与常人般兼而有之。但我们是经受党数十年的教育和栽培，我们有很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具有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我们绝不轻言放弃，也绝不甘心就此承认失败。

当时，我们就是靠这股精神，靠这坚定的理想，不屈不饶的斗争信念，在支撑着自己不要倒下去，在激励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第廿一章　　1985 年 Sg 亚央之行

大约是 1985 年中吧！我们接到王付政委的来信。要我们全体华区工作的同志回到大营寨集结修整学习。他们是学民、铁汉、图新、立新、永真、红军、民辉和我。

一个夜晚，我们在学民同志安排下，搭掛尾车长舟，由砂廉坡整整花了五六个小时，沿江岸直抵 NG Woh。

夜晚的拉让江景色虽美，但我们无心观赏，我们要警惕江面上随时出现的敌情，而且天冷、路途遥远，我们还要憋住尿急的煎熬，我几次想尿尿在船上，反正黑乎乎的，没有人会看见，更没有人会知道，但无法成功，因为尿不出来。一直到实在忍不住了，有的同志嚷嚷，膀胱要爆炸了，这才选择一个安全地点，上岸痛痛快快“解放”之后，才又继续轻松前进。

到 NG Woh，已是凌晨时分，上岸后抵达一个保干群众住家附近休息，等待联络员的到来。这家群众很热情，他从自家的鱼塘里捉来活蹦乱跳的鱼，下锅宴请我们。我们中有的同志甚至下池塘感受捕鱼的乐趣。

第二天，风雷同志抵达，在同志们的安排下，我们乘搭木山的“冷古舍”车，一路上风尘滚滚直抵后山。据说，这可节省了至少一星期的路程。在路尾，我们在木山工友的帮助下，搞足了粮食和必需品，我们负重向 Sg Anap 河尾迈进。

王付政委的这个营寨，可算是一个较成功的国内基地了。它座落在 Sg Anap 河支流，Sg 亚央河尾小支流的一个险要地区。这也是无人烟地带，营寨方圆约有 10 几依甲，地面平坦。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较为平坦，一个岗哨布在此处。岗哨前方不远，还挖了好几个陷阱，阱内插满竹尖等利器。运粮或进出路线是在营寨后面的陡坡，顺籐捉树攀藤着上下。

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营寨。厨房设在左方，一条长长的，用邦督叶茎制成的水槽，由后山悬崖峭壁处小溪引到厨房，常年都有“自来水”供应。洗菜、煮饭、冲凉都非常方便。中间是一个会议厅，也是饭厅。右边建了一个羽球场，每天除早操、军操外，我们还在那里进行羽毛球激战决雌雄。再右边便是生产地，面积虽不是很大，但很光亮，阳光充足，适合种植木薯、蕃薯、芋头、金瓜、白蒲和蔬菜等。同志们的房子分散在营寨四方各自岗位。到了晚上，整个营寨灯光闪烁，可这灯火是用烘干的打马土造成，又天然，又实际，又好用。

由于远离群众区，搞米粮很困难。为了生存，他们提出了“杂粮为主粮，向荒山要粮”的口号。他们在营地四周（阳光较充足地方）种了很多的短期杂粮，如红毛芋、木薯、番薯、金瓜等，短短两个月左右便丰收了；在这高山峻岭的广阔河尾，也长满了很多的板督树，他们把板督树砍下，制成板督粉，储藏在各要道，以作战备粮用。

到了 Sg 亚央营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吃杂粮为主食的日子。热情的阿婆等同志手捧热气腾腾的红毛芋送到我面前，叫我快吃。桌上还排满了板督粉制成的板督饭、板督糕等。出于好奇而且肚子也确实饿得慌，我吃了很多。头几天肠胃总感到鼓鼓的、胀胀的，很不舒服，过几天就慢慢适应了。

在此，还不时会派人出去打猎。若有打到山猪、鹿、狗熊、猴子什么的，那就大长口福了。同志们把猎物弄干净、切片，无需佐料，便放在火堆架上烧烤，那香喷喷的味道，可才是真正的“山珍”味呢！同志们还在营地四周装制一些“Panjou”（捕捉小动物的机关），隔两三天去巡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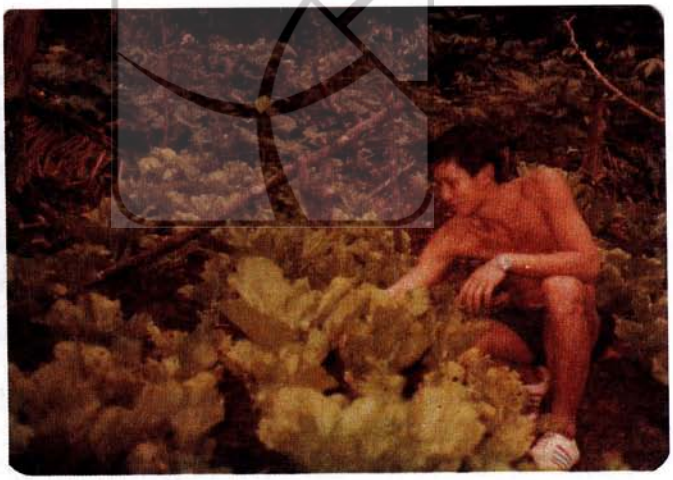
一天，一位狩猎的同志射死了一只母猿，一只嗷嗷待哺的小猿猴还紧紧抱在母亲怀里。出于怜悯之心，也是我喜爱小动物之心吧！我和民辉收养了它。它的一条腿受了枪伤，我们天天给牠上药，把省吃的食物调了白糖，一口一口的喂。日子久了，它的伤也好了，有时还抱住我的手到菜地做工。返回华区工作，我也把它带出来，交给一个好群众抚养，可惜后来患病死去。

在这个营寨，我们参加了峰云和毅红，立新和永真的结婚典礼。傍晚吃过丰盛的“喜酒”，晚上进行了多姿多彩的文娱表演，然后在同志们的祝福声中，二对新人分别进入自己的洞房。

Sg 亚央宁静的生活与斗争的环境，使我深深体验基地生活对巩固与保存革命力量的优越性。我们可以在领导同志的引导下，努力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整理工作中的千头万绪，总结一下工作经验，有利以后的工作，我们也可以松懈一下紧张的工作情绪和敌情观念。我还可以一个人持枪到附近指定的山垄去打猎。

基地生活给我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给我们学习了如何在恶劣斗争环境中求生存的能力和毅力。我们扩大了视野，增加了见识，使我们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

转眼之间，三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们又从原路返回华区，踏上自己的工作岗位。



这是 1985 年笔者来到 Sg 亚央营地的一个生产地，并与笔者养的小猿猴合照

第廿二章　　在逆境中寻找光明

从此，我们已清醒地意识到，整个国内外的大气候，对我们已非常不利，是难以抗逆扭转，要想迎接另一轮的革命斗争高潮，等待国际国内形势突变，犹如等待从天上掉下甜苹果，已不是我们所能够的了。要保住这“星星之火”可得更加深下点功夫了。

为化解这局势，党领导同志确是费尽心思，绞尽脑汁。边区基地确实给人兴奋和寄以厚望，但却以消极心情告终。如今当务之急，党决定更加认真组织队伍向东北前进，向第四、五省等新区挺进。一可支援，配合和促进旧阵地的巩固，特别是提高老区同志和群众的战斗士气。二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减轻原有阵地的战斗压力，三可以藉此推动革命武装斗争局势，创造新地区的革命形势，四可藉此为后人探索新区前进路线，总结斗争经验。

早在 1971 年国内武装斗争高潮时期，OMT 武工队就已组织队伍六次向第四省方向活动。边区基地会议后，于 1984 年 2 月 12 日，东北突击队在王连贵副政委直接指导下宣告成立，并于 18 日起程。这一次，队伍在俞诗东（怀武）、刘华荣（星火）等带领下历时三年，行程约 2400 公里，横跨足跡第四省大部分地区及第五省、汶莱部分地区，与各民族和睦沟通，为武装斗争的新战略部署，创造了条件。1987 年，王连贵政委再次受党的委托，又亲自率领一批 20 多名的队伍，向东北挺进，实施了部分战略部署和战略转移，希望藉此创造另一个“春天”。再次深入宽广的少数民族地区，获得新区境内各民族的支持，取得很好成绩，特别是吸收了四位柏南族和两位普南族新兵。

尽管东北新区形势很好，但并不是全局，亦不是主流，不能从根本上把砂捞越革命局面扭转。因此，我们还是在逆境中前进，寻找光明。

第廿三章　　我的太太——民辉同志

我的太太，名叫俞惠莲，部队名叫民辉，出生于 1953 年 2 月 5 日，家住船溪美禄。

60 年代，在人联党反帝反殖时期，她的家是个联络站，母亲贤淑，顾家有方。为了支援同志上边区，母亲主动帮忙车军衣和其他军备等，哥哥和姐姐都曾积极参与当时的革命活动。常常会有一大帮同志在家里吃饭过夜。家里常有一大箱一大箱革命连环图供她阅读，还有那百听不厌的革命歌曲和悦耳的小调；还有听大人们讲英雄人物事迹，都让她陶醉。因此，幼小的她，看到的、听到的全部是激动人心的革命事蹟。

在光民中学念书时，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念高中时，她已是校内的积极分子。1969 年响应革命组织的“隐藏”生活号召，在农村搞农运青少年工作兼学运工作。她善于团结群众，并能与青少年打成一片，因此深受群众和年青积极分子的欢迎，为当年的革命工作尽心尽力。

在部队内，除了是个好的宣传员，也是一位负责任的卫生员。不论在华区、伊班民族区，她一边宣传革命真理，一边尽力为民众解除病痛。

1973 年的“斯里阿曼”行动，她决心留下坚持斗争，愿为革命武装斗争继续贡献力量。

我们于 1978 年缔结连理，婚后生活愉快。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分开，为了北加的独立解放，为了世界的共产主义宏愿，我们都在不同地区，乐观战斗。

1984 年，我们小组坚持转战在华区农村。不久，我们进驻伊兰坡住点。她得了鼻敏感症，每天早上起床，被晨风一吹，直打喷嚏，鼻水连连，甚为难受，有时要到中午以后才会好些。虽有些便药，但也不见好转。经常与病魔作斗争。1986 年，她怀孕了。本来虚弱的体质，显得“弱不禁风”。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肚子也渐渐大起来，活动也不方便了。另外给她思想斗争最大的问题是长女在南蛮出世后，却成为一个残疾儿，因而对第二胎也存着极大的恐惧感。再加上中游高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战士的集体分化，也给她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感觉革命前程，越来越渺茫了。最后，她也坚持不了，向我提出也要出去。这使我非常犹豫，坚持还是不坚持，还是她不干我干，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抉择了。

我如实向党领导洪楚廷书记汇报了太太的情况。领导根据她的强烈要求和具体情况，尊重她的最后决定。

我也老实坦白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最后决定暂时留下来坚持斗争。要出还是不要出，一步一步走着看。至少当时我是愿意坚持斗争的，即使不幸牺牲了，我还是个彻底的革命者，党领导也尊重我的决定。

她感激党和同志们对她的关怀和处理，也十分尊重我的最后决定。

1986 年 10 月，我们来到第四军分区工作，民辉暂时住在新路的亚嫂家和英基罗的亚婶家。他们知道我太太的决定后，也通情达理，愿意收留她，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们深受感动。

1986 年 11 月 26 日，我们按计划，通过关系，把民辉送到她母亲的家里。从此，她告别了紧张艰苦的武装斗争生活，闲居家中。1987 年正月 28 日，是为农历

新年的前一晚，次女晓青出世。可爱的小精灵，活泼可爱，给她增添了无数的生活乐趣和欢笑。

我在第四军分区一切安排妥当后，取道返回第三军分区，继续坚持革命武装斗争。

第廿四章　我在武装战线上的最后时光

1987 年，我住进了 Sg Boh 后芭的“亚木村”点。此时洪楚廷书记等已从边区撤回国内到此扎寨。

Sg Boh “亚木村”点是属于 OMT 单位，民众多为广东籍，地势较高，属于山丘地带。当时的营寨便是建在山地上。我们在营地的山脚开辟了一块菜园地，种了很多蔬菜，黄瓜等农作物，颇有收获。那时，恰逢“尖必苔”果子盛产季节，我们几位同志采了很多“尖必苔”背回来当饭菜吃，生活虽苦，可也乐在其中。

后来，我们在营地的一角，有一片较平坦的地带，经过人工整理，做成了羽球场。傍晚时分，我们几个羽球爱好者，便在此争艺斗技比高下。这一能锻炼身体，二能增加生活乐趣，因此同志们都很喜欢打。

白天，我们都是利用这个较安定的时期，自我学习、提高理论、加强知识、总结经验做笔记等。

革命斗争发展至今，已是非常现实，也是很残酷的了。此时，要坚持斗争主要是要靠自己的思想过硬和革命信念的坚定了，而大多数同志对看待事物的是与非，对与错都相对固执，而一个同志要革命或不革命也不是靠某个领导同志或谁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了。也可说是思想和战斗生活的阅历进一步成熟和老练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87 年已过半年了。记得是在一次群众工作中得到消息，民辉出去后，思想压力很重，首先是她个人无法承担这复杂的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其二是次女的出生纸不能做，除非做单亲用母姓。其三来自政治部，家庭和亲人的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在我思想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说句心里话，我当时确实是不甘心从此放弃自己的信念、理想而就此放弃斗争，更不想背叛党组织成为叛徒或逃兵。但想到家，我又不得不衡量当时的形势等利害关系。因此心中暗下决心，尝试更换一种斗争形式，继续坚持工作。

当我向党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决定后，领导上要我等到一心同志产期完毕后才返回四分区，处理接收工作问题。我遵从党领导的决定与安排。

我很感激党和同志们对自己的信任，被安排在扬帆同志一组，一边搞群众工作，一边负责一心同志的分娩问题。在工作问题上，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同志们也不避忌许多保干群众、地形、敌情等状况。该商量的一起商量，该做的一起去完成。我也保持诚恳态度，积极做好工作或提出意见。

1987 年 9 月 29 日凌晨，我在同德港与扬帆等同志告别并乘搭快艇离开。10 月 1 日，我与陈广德同志在四分区接了头，并与他详细交代接手工作问题。

基于陈广德同志本来就是住在四分区英基罗远东船坞一带的。参军后，我们在四分区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战斗、一起生活。因此不用几天的功夫，他就“得心应手”了。

最后，我在陈广德的安排下，到某地见到了洪楚廷书记。我毫无保留交待了自己的思想活动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并要求党不要开除我。洪书记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也说明了今后斗争的艰险性，并表示最后必露曙光的坚定信念。我很受感动。末了，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告别。时年 35 岁。

我屈指一算，从 1969 年 10 月到 1987 年 10 月返回家园，我整整进行了 18 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从 17 岁参军到今天已是 35 岁，还是风华正茂，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一边搞好家庭经济，一边也要了解社会、调查社会、关心政治，尽量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

第廿五章　　非常时期，特殊生活

我回到家园，政府算是特殊优待了。因我一回来便与妻儿同住在妻姨家，即文雅路 20E，岳母也在同一排屋住，彼此还方便互相照应。一星期后，拉士贡政治部主任刘锦成才载我到南兰路上段“政府屋”，在朱传容先生引导下，很快便完成录“口供”，于是当天又载我回家。

在这段过渡期生活，初时，他们不给我到处跑，说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也乐于偷闲在家，帮忙做点家务事，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情绪，生活习惯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等。

我们也乘着这个机会，去申请与考取驾驶电单车和汽车执照。有了交通工具，才能更方便于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在生活上，政府每天津贴 3.5 元，每个月约有 105 元左右，加上太太的生活费，每个月平均有 210 元左右的生活津贴，加上亲友的相助，大家省吃俭用，还能勉强糊口过活。州警察总监林应良先生和拉士贡政治部主任刘锦成先生还答应说，我们每人还会有 2000 元的赏金，等钱一到就会给我们。可这笔钱至今，分文未收到。据后来刘锦成先生说，是给有关方面“分掉”了。他也大骂有关方面的贪污腐败。我们当时也不十分在意，也并不想一定要拿到这笔钱。一个很执着的观点，不断在激发着自我，“我一定要靠自己，要挺起腰杆，靠自己的努力”。

当时林应良先生和刘锦成主任曾答应 6 个月适应期过后，只要我们“奉公守法”，我们可以自由去寻找工作，但每个月必须来警察局报到。

第廿六章　向新生活挑战

第一节　《诗华日报》工作

公元 1988 年是我们人生第一回坐飞机去古晋 22 哩大富村与家人过农历新年。当时还需特地到古晋西连 17 哩新生村的警察局报到。说是正常的手续而非限制，我们也不计较这些鸡毛蒜皮小事，按章行事。

回诗巫后，我们就为自己寻找日后的工作奔波。人说“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这是古人累积的千古真言，确实是很有道理。

一天，我找到吴仲城老友，希望他能帮忙找份适合我的工作。他提议我到《诗华日报》任职，而他与《诗华日报》总经理刘会湘先生有业务上的往来，且有深厚的交情，可给我做介绍人。

很快，我便找到刘会湘先生，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说报业工作是很富于挑战性的，只要我们不怕苦、不怕难，是一定会干得好，他希望我能为《诗华日报》做些贡献。当时新华晚报刚开张，刚好缺乏人手，他叫我到应征部找人事部经理，要求先做晚报的营业员，有经验后慢慢提升上去。

我寻思，自己社会、人生经验浅薄，确实是很需要借此机会广交商场老板，提升自己经商业务经验，多了解社会、人生的千奇百态，丰富自己对事物判断的能力。1988 年 3 月，我依邀当上了新华晚报营业员，底薪 400 元。要想赚更多钱，就要靠

自己的努力和赚外快了。因此，我除了积极找商场老板招印件、广告外，更重要的是每天跑酒楼，特别是招喜丧事的现金广告，这里有现扣 20%的回酬，若能努力，每天都有可观佣金进口袋。

《诗华日报》总经理刘会湘先生的亲力亲为工作，确实令人敬佩不已，他每天一定准时在会场（除非公干在外），主持每日会议（早上 8.00AM 到 9.00PM），捉住每一条广告，每一条新闻，严厉责问："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为什么会登错，为什么……，"他虽每天在骂人，批评这批评那，但那才确实是他的特有优点，他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员工，要严以待己，认真负责本职工作，要成为报业的急先锋和尖兵。很多诗华员工在他严格培训下，收益不浅，日后都成为成功人士，为社会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第二节　　7 年派报生涯

当时，德洛邦河和顺溪美禄地区，民众只看《马来西亚日报》而无《诗华日报》。我诚邀《诗华日报》诗巫区经理林功忠先生一起到该区逐户拜访并免费赠阅半个月，我为义务派报员。经过我们的努力，仅数月时间，从 20 多份到 100 多份，确实是一个飞跃。后来因各种因素，我的派报范围扩展远到马拉山地区，《诗华日报》最高峰记录已达 300 多份。从此，我每天凌晨 3 点多便从家门出发到船溪安都诗华报馆整理报份，然后用电单车不分晴天、雨季、涨潮或病痛，日复一日，从不间断，把一份份报纸送到阅户手上。

整整 7 年的时光（从 1988 年到 1995 年 8 月），我风里来、雨里去、涨水、病痛从不退却。派报生活虽艰苦，但也乐在其中，因为我每天还能与民众在一起，特别是收报费时，都能与老群众，老朋友乘机谈政治、说经济、话未来。平时聚头还能叙叙情、谈谈天、说说地、收益不少。

第三节　　回农村——我可爱的故乡

从我踏进《诗华日报》工作的那一天，我就决定要搬回农村住，那才是我向往的地方。因为那是我的故乡，也是我一路走来深值留恋、回忆的、也更能发挥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能节省开支，又能搞些副业，增加收入；也方便与老乡、老友一起，生活也更加有趣味。熟人嘛，大家更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把这方面的想法与好友林志强提出，他满口答应给予帮助。

林志强，福州籍，1952 年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割胶邻友，我们情同兄弟。年青时的他，就非常有正义感，乐于助人。他念书不多，但头脑灵活，做事非常有办法，坡里年青人都乐意与他交朋友。由于是家里长子，必须承担家庭经济。停学

后，他便进军蛋鸡业。把住家周围全建起了蛋鸡厂。由于经营有方、讲信用、为人诚实，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农场搬到德洛山后，他更放手开拓蛋鸡业。从手工型转为半机械化、全机械化。蛋鸡从数百只到30万只。为扩充业务，又建起了饲料厂，除供应自用外，也分销给友好同行，互惠互利。他的鸡蛋广销诗巫中区一带，并逐步朝向国外发展。由于聘请劳工难，现在又策划朝向全电脑化机械操作，这必然大大减低成本，增加盈利。到时更多民众将享购经济蛋。

就是他，给了我安定温暖的屋子，充满温馨的家。那是1988年初，林志强找到顺溪美禄的几位木匠朋友，把老屋进行维修。由于是低芭木屋，且年久失修，屋身倾斜，屋顶漏水，已不适合居住了。后来，把屋顶的瓦锌全部换新，木板、门板、大柱等该修的就修，该换的都换了，屋身也洗刷一新，花费了约2万余元，焕然一新的屋子，免费叫我搬进去住。

1988年3月，我们选了一天良辰吉日，在亲友的协助下，搬进了林志强友刚修好的住家。后来我利用林志强的旧旦鸡场改建为肉鸡场，为家庭经济增加不少盈余。在此，我对林志强老友的慷慨解囊相助和生活上、物质上的亲切帮助，表示万二分的感激，并祝他们全家幸福、安康、愉快。

林志强与太太陈兰梅留影

第四节　　在大强公司工作

在这五花八门的社会里，虽然黑暗、丑态百出，自身也深受一些居心叵测人的从中打扰、陷害，但好人毕竟还是有的。他们默默地、诚恳地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给予帮忙，使我能从容在社会上大展拳脚，放手去干。

任职于大强有限公司的王春举老友，就是一个大好人，他是个忠义侠胆、肝胆相照的男子汉。他对我那时的生活、工作看在眼里，关心在心上。为了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他在大强老板范培尧先生、范利坚先生等面前，帮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好话。一天，范利坚先生找我，说大强业务蒸蒸日上，需要一批肯求上进、忠诚老实、真才实学的人才，并鼓励我到他公司任职。月薪为 1000 元，还享有其他福利补贴。

我在范先生的真诚邀请下，于 1989 年正月任职于大强饲料部，帮助他打理门市和饲料的进出等。当时吴万钦老友也任职于大强饲料推销员兼负责收账工作。工作单位几位职工也志同道合，几位老友齐聚一起，工作、生活都很欢畅。

1990 年 8 月，不知不觉之间，我在大强饲料部工作了两年，使我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丰富了养鸡的知识和市场需求量，确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于是，决定要自己出来创一番事业。

大强老板范培尧先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的辞职，有意自创个人事业表示支持和祝贺，并希望有空多到他的办公室闲聊、喝茶。我非常感激。

辞职后，我花了一笔资金和时间把林志强的旧蛋鸡场改为肉鸡场。从此，天天与鸡为伍。

当时的生活非常充实、踏实、紧凑。我凌晨 3 点多到午时 12 点为派报工作。午饭后，来个小午睡。下午 2 点不是在菜园，就是在鸡寮。傍晚把一笼笼的鸡用电单车载到市场雇主处，准备第二天售卖。晚上便是逐户登门收报费，亦是车大炮的时间。晚上九点半、十点熄灯睡觉。凌晨三点多，新的一天工作又开始了。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1993 年的一次鸡瘟，让我损失惨重。我在田地里，挖个深洞，每天都要把死鸡丢到洞里。3000 多只鸡，才一星期，全部死个精光。消毒一个月后，我尝试再养，还是不成功。只好暂停，另图他业。

第五节　　种菇行业

1994 年我在王春斗先生推荐下，从事种菇行业。但种菇行业并不好做，它是一项冷门生意，少人问津，不像青菜，每人天天都要吃、都想吃。

菇业难做的原因有：（一）鲜菇藏在冰箱里只能耐一星期左右，久了会发黄，有异味，（二）产量不稳定。我的菇场，多时一天能出十几蓝，约 30 多公斤，少时一天只能采 1 公斤左右，（三）销路、销量不稳定。若逢酒席多，还可推出。若逢淡季，那就要靠自己一点一点的逐户推销了，（四）大间的酒楼已被大间的菇场包了，我们小间的，根本不能进去。

约一年的时间，我便宣布关闭，不再生产鲜菇了，失业在家。

这是我的菇厂。长女晓青在採菇

第六节　　进金林车厂做工

1995 年 6 月，前战友高孔海来我家拜访，得知我的难处后，便邀我去民都鲁，在其公司属下做工。当时，高孔海等一批老朋友经营的金林木业有限公司正处于旺盛黄金时期，全体职工都在为金林上市而繁忙、紧张的工作。

我于 1995 年 7 月 1 日，被委为金林车厂的经理，月薪 2300 元，还享有伙食、住、用、交通工具等其他福利津贴。对汽车机械一窍不通的我，却能升为经理，实乃我人生的奇事，此乃拜托高孔海老友，高抬贵手所赐。我也绝不能辜负他的期望，要认真负责管理好工作，并从机械的每一粒螺丝到整部的机械结构，花费相当的时间，学习研讨，并在高孔海老友和同事们的帮助与鼓励下，我确实学有所成。

1999 年，达斗金林板厂要向三夹板行业进军。厂建好后，我被调到达斗板厂伙食部，负责工人的伙食兼做小店生意。

2000 年，基于各种原因，公司以每月租金 4000 元，把小店兼伙食部的工作脱手给我个人自己管理。2000 年是全球经济风暴年，银行银根紧缩。金林也在这经济风暴中惨遭其害。银行本已答应的贷款，中途中断了，不贷了，甚至把外面辛苦筹到的钱汇进户口后，也被有关银行卡住了。银行钱不要出，一切预期要开销的经费也陷入危机中。我的小店生意也在这风暴下，惨淡经营，苦苦撑住。

高孔海老友是金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敢于向困难做斗争，勇敢机智，在极端困难时刻，从不逃避；他天天都来办公室，想方设法去解决危机。身虽处于危难之中，但从他的言论、行动中，总让人感到放心，看到前面的曙光。

就是靠这种精神，再加上其他董事、同事等通力合作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 2003 年成功上市，真正是在漫长黑夜的煎熬下，见到了黎明的曙光。全体职工为此雀跃欢呼。

高孔海

第七节　　参与华教工作

1992 年，我在何道仁同学、黄海莲同学的介绍下，参加了光民中学校友会的工作，先后任职委员、副教育、副秘书、秘书等职。在校友会的推荐下，很快进入光民中学校董会，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个旅途，为华教献棉力。

我们参与了光民中学扩建新校舍的多项筹款活动（如艺人义演、卖画、义卖会等），我们参与了校方的每年招生活动，也参加学校举办的教师节、毕业典礼等活动。1993 年，学校举办双庆（扩建新校舍落成暨创校 40 周年纪念），我获校友会委托任校友返校日筹备会主席。由于这些工作多了、久了，有时会感觉有点忙，但大家都忙得很开心、愉快。

我感到佩服、欣赏当年共事的吴重平、黄海莲、余泽延、王春斗等同学，他们都为当年的校友会付出了努力，为母校做出了贡献。从他们身上，我获益良多，他们当时是我学习的榜样。

基于工作、生活关系，我于 1999 年离开校友会，来到民都鲁、达岛做工。

2006 年，我加入达斗福州公会，并于 2007 年参与达斗福州公会工作，任理事、副秘书等职。2008 年，在达斗福州公会推荐下，进入达岛中华幼儿园任秘书、达岛中华公学任董事。2010 年任达岛羽球俱乐部华文秘书。在新的地方，认识了新的朋友，使我增长了见识。由于达岛县民风淳朴，人民和善、友爱，我们大家都能团结合作，因此工作也很开心、愉快。因为大家都在努力为民族、为华教工作。

籌備會主席賴子銓致詞。

从此左至右：达岛羽协顾问刘恭敦、本固鲁林正峰、甲必丹林正辉、福州公会主席张孟光、署理主席龙宝驹、笔者、主席黄贤彬、顾问甲必丹江长润

第廿七章　后语

第一节　1990 年全面结束武装斗争

1990 年的和平谈判，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是顺着时势而相应改变的斗争策略。

这种策略的改变，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我们党发动的这场革命武装斗争是失败了。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不管是谁，都必须承认、接受。

我的理由是：

① 我们的武装斗争是在 60 年代初，中国解放，在印尼苏卡诺“抗马”的大好形势下，高举反大马争取北加独立的旗帜，而动员华伊同胞开展起来的。当时发动武装斗争是适时的、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对抗，捍卫人民的利益。但因我们当时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特别是党组织建制不健全、经验不足、印尼政局很快发生突变、有利形势遭到严重破坏。国内武装斗争虽曾轰轰烈烈发展壮大，但 1973 年的“斯里阿曼”行动，使武装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当时虽有第一省和第三省的少数精英分子在坚持武装斗争，延续斗争“香火”。但基于敌人猖獗的军政进攻，西部的北加人民游击队经过 12 年的坚持斗争，由当初的 52 位，经过牺牲，被捕，分化后只剩下 19 位，于 1986 年结束了武装斗争。东部的北加人民军，从一开始的 122 个，几经遭折，到了 1990 年结束斗争时，只剩下 52 名。按当时的局势发展，这些少数人要继续和保存下去还是能够的，但面对革命的成功，已是遥遥无期了。

② 在国际上，中国于 1980 年对外政策的极大调整，重视加强了东南亚各国的联盟与建交，并公开表示不再支援该区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我们的精神靠山没有了，反马斗争更孤立无援。再加上苏联的解体，印支三国解放后自相残杀、中越交恶，都显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健康发展趋势。国内消极因素不断在加强，斗争情绪更加低落。

反观马来西亚政府，在 70 年代后，在外交上主张东南亚中立化，把自己置身于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之中。中马建交，国际上更多国家承认“马来西亚”。“大马”已成为事实，并走向国际历史舞台。对内加强怀柔政策，走中庸路线，获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接受。从眼前看，一些地方，搭桥做路，送石头，装电进水，给人民一定的方便与满足，人民生活相对安

定。因此，普通群众对以武装斗争，以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显得不能接受。

③ 从北加革命 40 年来（1950 年——1990 年），我们确实在伊班民族工作上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功夫，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唤醒了一定数量的伊班民族的觉醒，甚至有一些精英参加了武装斗争行列上来。但基于他们文化水平、政治觉悟不够。因此，无法广泛动员他们的绝大多数，坚定的参与或支持我们的党、我们的武装斗争。北加革命斗争仅靠我们少数华族的支持与参与，就决定了我们的武装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在我国历史上，达雅同胞的反抗布律克拉者的统治，马来族的反让渡斗争，刘善邦的华工武装起义，都是在动员单一种族起来抗争，结果很快遭到镇压而失败。

④ 北加里曼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是个很富裕的国家。长期来，虽遭有心人的掠夺，制造了许多大资本家，但普通人民尚能安居乐业。伊班族、普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虽在偏远山区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安于现状、习惯林中生活、与世无争、不思改变。我国当时的阶级矛盾斗争还不够尖锐，还没有到“极点”。因此，无法带动他们进行长期艰苦残酷的武装斗争，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在当时，即使是华族同胞也只有少数采取坚决拥护和相当部分表示欢迎和接受，给予同情支持。而绝大多数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当然与我们敌对的是少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自 1973 年重挫后，新兵来源少，而内部的病痛老弱加剧，分化增多。

1984 年，东北突击队，经过几年的努力，宣传带动了一定的民族兄弟觉醒，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力，而且也吸收了数位新兵。但那是新区，未经敌人镇压，而且是偏远山区，对敌暂不构成太大威胁，对全国全局也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⑤ 虽然斗争是如此尖锐艰难，但我们的同志却能坚持抱定崇高的理想、坚定的革命信念，以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强大的精神支柱，顽强不屈的坚持战斗下去。但到了 1989 年 12 月 2 日马共、泰国政府、大马政府在泰国合艾签署了和平协议，大家化解了对抗的局势，马共全面结束了武装斗争，实现了和平。时局发展至此，我们若不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我们也无法挽回革命斗争失败的厄运，根本无法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

北加是个多元民族组成的。只有各个民族，不分彼此，共同联合，共同思变，斗争才能胜利。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只要我们保持冷静、智慧的头脑，不管局势如何演变，历史永远是向前发展的，一个真正公正、民主、进步的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

第二节　　我的感言——追忆往事，无怨无悔

每当我谈起过去的往事，很多朋友都会用好奇、惊讶的眼光看着我，并问我："你花这十几年的时间，值得吗？会感到后悔吗？"

我很坦诚地告诉大家，我们绝不后悔。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政治抱负、我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我们坚持努力学习、认真寻找实践经验，因此，我们头脑清醒、绝不盲目。我们清醒地看到前面的灯塔，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我们抱定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决心。我们视死如归，不怕牺牲坐牢，我们明知前面是刀山火海、波涛巨浪、枪林弹雨，我们也仍然一步一步向前进。

我们同志之间就像亲兄弟姐妹般，相依为命、情同手足；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我们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与共，……。

我们有时也争吵、闹矛盾意见、也自私、也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们勇于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认真检讨错误，敢于承认缺点，勇于承担责任，诚心所至，金石为开。

以上的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五花八门的社会里，是很难见了。美好的往事只能沉醉在回忆中。

虽然我们这场战斗是失败了，但这场战斗坚持时间之长，所涉及的范围、影响之广，动员各民族兄弟的数量，是砂拉越史上罕见的。我们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我们打击了英国殖民民主义者对砂拉越的殖民统治，迫使他们放弃或提早放弃对砂拉越的殖民统治。

我有幸，能真正参与了这场伟大斗争达 18 年之久。在我 18 年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征途中，确实历经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经历了各种磨练和惊险。但也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不少光彩的往事回忆。这不是用金钱所能买到的。因此，追忆过去，我感到无怨无悔。

唯一使我悲伤难过的是在这场战斗中，许多一起战斗的同志流血牺牲。他们用年轻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灌溉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确实无愧于人生。每当夜深人静，往往会想起他们。想起同班的吴珍香老同学、想起一起患难与共的黄华道、

詹赛琼、陈干共、还有卢永发、林友基、俞贤团、袁锦香、张宫女、……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一幅幅难忘的画面，一片片刻骨铭心的阶级情、同志爱，一串串令人回味的生活趣事，……无奈，如今已阴阳相隔。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也坚信，历史车轮，永远是向前进的。一个美好、幸福、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一定要实现的。

让我们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以愉快的心情迎接前面的曙光吧！

“战风斗雨十八载，鞠躬尽瘁浩正气

功过成败公自论，无怨无悔度此生”

書名：**並肩風雨行**

Side by side wind and rain on the road

作者：成安 Chen Ann

出版：余清禄 Yu Chin Liik

736B Taman Ecorich, Jalan T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Tel: 013-834 8055, Fax: 086- 336603

Email: yuchinliik@ gmail.com

發行：砂拉越中區友誼協會

Sarawak Central Regio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Tel: 084- 344886, Fax: 084- 313024

印刷：Mirajin Sdn Bhd

Lot 49 & 50 Hiong Tiong Industrial Centre,

Lorong Buah Salak 5,

11.2 KM Jalan Tualan 88450, K K Sabah

TeL: 088-420210, Fax: 088-432455

書號：ISBN

定價：RM 15@ book

出版：2012 年 3 月

友谊丛书系列

1. 往事
2. 林中猎奇
3. 悠悠岁月话当年
4. 风雨年代
5. 砂印边界风云
6. 回忆1990年和平谈判
7. 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
8. 追寻民族区的踪迹
9.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人
10. 燃烧的岁月
11. 斯里阿曼行动始末
12. 林海遗珠

ISBN 978-967-10611-1-4